

序

乌云在无声的静寂中汇合。忽然，闪电用它尖利的手撕裂天空；霹雳用它粗壮的声音的锤震撼大地；狂风扰动起一切空间。大自然在这紧张的喧嚣中显出蓬勃的活力。万物被暴雨猛烈地、彻底地冲刷之后，涤尽了污垢，无一不呈现出本色。汹涌的洪流使旧日沉默下来的长江大河重新变得生气十足，然而，它不可抑制地冲决堤坝，泛滥开来……

回溯一下吧，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生活中骤起的无比剧烈的风暴！

这是光明赢得了胜利之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一次大反复。

一下子，无形潜在的对立，变得具体可见，尖锐地冲突起来，殊死地搏斗着。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日常的事物上移开，凝望着—件抽象的最庄严的大事：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命运，也思考着自身。几万万入，不管是投进，还是被卷进，都在这疾转的斗争旋涡中跃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在发生转折。

刹时间，界限没了，准绳没了，秩序没了。更多的是怀疑而不是信任，更多的是废除而不是保留。存在的一切，都需要重新甄别、判断和划分。一切人都要重新站队。一些人过了时的面具揭去了，另一些人悄悄蒙上更应时的面纱。敌我友、真与假、忠与奸、是非和曲直全纠缠一起。赤诚的战士、政治的赌徒、利欲熏心的冒险家、化了妆的魔鬼，一时混杂不清。拔剑相向的双方有时恰恰是阶级的手足；并肩的伙伴很快又化为仇敌。

这是空前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不拿枪的大混战。

斗争渴望行动，行动需要精神。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巨大的标语，显示着—种空前激烈的情绪。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社会空气搅得异常紧张。当—系列暴烈的行为被奉为“革命行动”，而风行于世的时候，它的矛头所向，即刻化为灾难。检验它的代价无法计算。另一边，权威在被窃用，真理在被偷换。冒牌货总有它更为炫目的外表。隐身的骗子们在蜜果四边撒下拌了糖的毒粉，在征途两旁布下铺了花的歧路。分辨它，不单需要时间，还免不了经受痛苦的磨难、上当、受害，留下深深的创伤。这也是成就—身钢筋铁骨前真正的锤炼。历史即便在重复，也以—种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形式开始的。革命是开天辟地，不是精雕细刻。它要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它把它的教训留给后人。

现在呢？炽烈的气氛象热空气注入人们的大脑。脑袋里的细胞发了酵似地膨胀起来……

—

白慧，十七岁的姑娘，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穿—身绿色的军衣，和她的同学们站成—排，横穿马路，象占领城市的队伍那样把—条街的街口封锁住。

身后是他们的学校。今天，另几个学校在这里联合开批斗大会。白慧

他们执行保卫会场的任务。

他们的左臂上套着一色鲜红的臂章。在那过去的、使人不能忘怀的、可歌可泣的时代，红军、工人纠察队、农会，都戴过它。这是正义、光荣和神圣的标志。她感到今天戴上它，不单很神气，还意味着过去那严酷的斗争又回到身边，红色的天职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每人手里端一支军事操练用的模拟的木枪，并不觉得是一种象征。感觉是真枪，是讨伐旧世界残余的逼真的武器。

愤怒的火在白慧心里猛烈地烧着。心里没有杂质，火烧得那样纯，还有两朵炽热的小火苗跳到她细长的眼睛里。在挑起来的黑眉毛下边，闪出逼人的利剑似的光芒。这张白晰、清秀、少女的脸儿冷若冰霜。她抬着细俏的下巴，凸着微微隆起的胸膛，双手象拚刺那样端着木枪。自我的正义感在她身上塑造了一副感人的姿态。

她和所有的女同学一样，把辫子塞进军帽里。军裤簇新而碧绿；军衣褪了色，是爸爸当年的战服，曾在漫长的征途上雨淋日晒发了白，有硝烟熏黄和子弹擦过的痕迹。袖子上还有一个枪洞，正是爸爸当年负伤的地方。这个洞眼已经给一块略新些的绿布补上了。细细的针脚是死去的妈妈留下的纪念。爸爸一直珍藏着它。白慧非要不可，因为穿上这件褂子会感到充实，增添许多力量和勇气。

褂子大。她个儿不高，还没有长饱满。帆布腰带紧紧一扎，下边的衣襟象短裙一样张开。

后面有人喊她。她回过身。

一个瘦高、穿绿军衣绿胶鞋的小伙子跑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小伙子长得端正，脸盘瘦削，轮廓象刀刻那样清晰有力。一双眼大而亮，显得很精明，只是两眼的距离近了些，挤在隆起的笔直的鼻梁两旁。他叫郝建国，现在改名叫做“郝永革”，是白慧的同班同学。原先，郝建国是学校团总支副书记，白慧是总支委员。目前，共青团不再工作；学校、教师、同学这些概念也不存在了。他们一切都是军事化了，“红卫兵”这个极端的组织取缔并代替了一切。郝建国做了连长，白慧是排长。噢，对了！连排长的胸前还都悬挂一只亮晶晶的金属哨子。

“白慧，批斗会马上开完了，各校押走的那些坏家伙都要从这儿经过。咱们拉开阵势，等他们来了，再狠狠压压他们的气焰！”

白慧嘴唇抿得紧紧的。在微微张开的唇缝里吐出了三个字；

“我知道！”

白慧吹响哨子，下了命令。她的一排人立即向后转。一排木枪头向着学校的大门。

大铁门漆成红色。一长方形的洋灰门垛上挂着校牌。在迅急扑来的新思潮中，校名改了，来不及重新剧写，就在牌子上贴一张刺目的黄纸，写上“红岩中学”四个墨笔字。

大门两旁的高墙全被大字报盖住。这些大字报揭发、谴责、控诉昨天站在讲台上的所谓“有罪”的人。无数粗大的惊叹号和狂怒的词句混成一片。“我校必须大乱！”“坚决砸烂校党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大幅横标穿插其间。远处，教室大楼、办公楼、图书馆、实验楼，从下面墙根到三楼的陡壁也都给大字报和标语包严。看不见砖，象一个写满了字的大纸盒子。屋顶上插着红旗，站着几个绿色的小人影。那些小得勉强能看见的胳膊激烈

地挥动着。

校园里的批斗大会进行最后一项：呼口号。一阵阵接连不断的声讨敌人的怒吼，如同重炮阵地在打炮。巨大的声浪越过院墙，象擂动战鼓一样擂动白慧的心。她的脸颊火辣辣的，烧得通红通红。紧攥着枪杆的手背上的血管，象秋海棠的叶脉那样鼓胀起来。

郝建国大步跑到一排人面前，仰起头高喊：“同学们！敌人就要来到咱们面前。对敌人应该怎样？”他的声音很嘹亮，金属一般，象吹铜号。

“狠！”一排人整齐地呼答同一个字。

郝建国满意又振奋。他看了白慧一眼。

白慧没喊出声。她心里有更激荡的字眼。

大门开了。

被斗争的“罪人”排成竖行走出来了。按规定，他们穿蓝或黑的褂子和裤子。一律低头，垂着胳膊，慢腾腾地走来。两旁是持枪的学生，象押解俘虏那样。

这些人在白慧的眼里逐渐清楚了。高的、矮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白头发的、花白头发和黑头发的；还有的被剪成秃头的。他们一概失去了素日的神气。狼狈、灰溜溜、服服帖帖。一大群学生在后面呼口号。

郝建国在她耳边说：

“中间开个口。叫他们一个个通过。认罪、态度老实的，放过去；不老实的，打垮他的气焰！”

封锁线中间开一个小口。

白慧端着光溜溜的木枪站在一边，郝建国倒背手威严地站在另一边。第一个俘虏走到通过口。他在白慧硬梆梆的枪头前停住了。郝建国用审问的口气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这是个瘦瘦的人，头发很长。他略微扬起头说，“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

历史上当过……当过中统特务……可是早已结案了。”

“放屁！”郝建国立即怒叫起来，“什么结案？！以前结的案，今天都不算了！你那是给修正主义路线、给走资派包庇下来的！走资派搞招降纳叛，就是想用你这种人向无产阶级进攻，搞破坏！要不是走资派包庇，你早该给砸得粉碎了！你还不服罪吗？”

“我是有罪！罪孽深重！我做过特务。我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被郝建国和这场面吓得赶忙顺应地回答，不敢再做半点申辩，然后抬起眼皮窥探着白慧的态度。白慧见他长着一副可憎的容貌，没有血色的干黄的脸，拉得很长，形状象鞋底；松弛的向往下垂，面颊上都是垂直的深沟；嘴角向下撇，带一种霸道惯了的样子。只看这样子就知道准不是个好人！但此刻他眼里却放出恭敬、殷勤和乞怜的神情。

他是特务——白慧想——反革命的暗箭。手上沾着革命先烈的鲜血，灵魂是一摊乌黑的臭泥。白慧曾经在银幕和图画上看过的特务可憎的形象与眼前这个人重迭在一起了。

她气忿得声音都颤抖了：

“你……你认罪吗？！”

特务埋下头。“认，认罪。我接受监督改造，重新做人，赎自己的罪恶！”他做得太服帖了。软软的，象一团破絮；不管他真的也罢，装出来的也罢，反正对他使不出劲儿来。白慧的脸然白。

郝建国不想为他耽误时间，朝他大吼一声：

“滚！”

特务走过去。第二个人停在这里。这是个白发、方肩膀、结实的男人。他嘴唇发黑，穿一双矮(革幼)的绿球鞋。

“你是干什么的？”郝建国喝问。

“当权派！”

“你认罪吗？”

“认罪。我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我接受革命同学的批判！”他诚恳地低声说。

“滚！”郝建国吼着。

跟着第三个、第四个……十几个。随后是最末的一个。

这是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胖胖的，蓬乱的花白短发，黑黄脸儿，穿一身抓皱了的旧蓝制服，裤腿和胳膊沾了土。她和前面通过的人不一样，没有低头，眼睛瞧着前方，慢慢地走来，站在白慧的枪头前。

郝建国的目光忽然象聚了焦似的，炯炯放光。他敏锐地从这女人身上发现了一种顽固的迹象。他叫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下头？”

这女人抬起她一双眼，又黑又大，相当沉静，直视着郝建国和面前持枪的女孩子清秀、却冷若冰霜的脸。

“你为什么不上答？”郝建国威吓地叫着，“你是当权派吗？你不认罪吗？”

“不，同学们，我是人民教师。我，没有罪！”她一字一句平和又执拗地说。

女教师的回答大胆到了极点。学生们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先例，先是感到意外、惊讶，跟着被激怒了。在这种场合，反抗是一种刺激剂，马上引起一片不可遏止的吼声：

“她不老实，不认罪！”

“这是向咱们挑战，是反扑！”

“好顽固！打垮她！打垮她的反动气焰！”

女教师的态度依然那样沉静。她的做法可以认做是失去理智了。她对着四周愤怒地叫喊着的人群，固执地说：“不，过错我有，愿意接受同学们的批判；罪，我没有。我一切都为了党，为了祖国……”她居然眼泪汪汪了。

郝建国一把抓住这个顽固而死硬的女教师的衣领，用力摇着，冲她喊道：“你放屁，你毒害青年、腐蚀青年；你妄想把我们培养成修正主义分子！不准你的臭嘴玷污我们伟大的党！你为的是国民党，为了复辟你失去的天堂！”然后猛地搯开她。

“我？为了国民党？天堂？你们怎么知道……”她说不下去，流泪了，嘴角痉挛般地抽动着，使干裂的嘴唇渗出血来。

郝建国踮起脚对同学们大叫：

“同学们！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是顽固不化的！她不服输！变相地和无产阶级拚刺刀！咱们怎么办？”

跟着响起一片喊打之声。

押解女教师的一个瘦小的男学生对白慧和郝建国说：“她是我们学校里最顽固、最反动的。怎么斗，怎么打也不认罪。要不今天弄到这儿来！就是想打垮她的气焰，她还是不服！”

白慧听着，狠狠咬着下唇，死盯住面前这个顽石一般的敌人。

女教师黑黄的脸上满是汗污，油腻腻的。失去光泽的象鬃麻似的花发粘在上边，显得狼狈。痛苦的表情使这张脸变得更加难看。在白慧仇视的眼里，简直丑恶极了！白慧心中的怒火，已经猛烈燃烧起来。

郝建国忽从身旁一个学生的手里夺过木枪，叫着：“今天非叫你老实不可！”他的动作很大，疯狂一般抡起木枪。左右的人要不是急忙躲闪，很可能被枪头扫上。木枪带着一股有声的迅风，“蹦”地打在女教师的双腿上。

女教师猛摔在地上。剧疼使她来回打了两个滚儿，双腿抽搐似地一直弯曲到胸前，两只手胡乱抓着腿上挨打的地方。她没叫喊，而是偏着脸对郝建国哆哆嗦嗦、愤怒地说：

“你们、你们这么做，不是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的怒火爆发了。她的脸象喝醉酒那么红。脖子、耳朵都红了。她大叫：

“反动，反动，你诬蔑革命，对抗革命！”

郝建国喊着：

“打，打，打，打死阶级敌人！”

学生们怒不可遏。有几个学生拥上去，手中的木枪在头上闪着，在狂乱的冲动中砸下去。没有选择，一支枪的枪头击在路面上，折断了；郝建国不停地把他砸下去的枪棒再举起来。白慧挤在这几个人中间，朝敌人狠狠一砸。这一刹那，她感到身后有人拉了一下她的胳膊，但没起作用。木枪头打在女教师的头上，位置在左耳朵上，靠近太阳穴的地方。几乎同时，一股红色的刺眼的鲜血从头发里涌出来，沿面颊疾流而下……这之后的一瞬，女教师的肩部还挨了另一支枪重重一击。

女教师从胸腔里哼出沉闷的一声。她黑黑的眼睛睁得特别大，最后的目光停留在白慧的脸上。这目光好象没有任何含意，象井里的水，黑亮亮，冰凉的，随后闭上眼。脖子失去了支撑力，脑袋象个鼓鼓的布袋子撞在地上。

白慧身旁一个矮小的女学生，不由自主地叫出声：

“死了？！”

这声音如一股电流从白慧全身流过。她控制不住自己，惊栗地一抖，不自觉收回了木枪。刹那间，好象一切都停止了，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可怕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耳听郝建国依然怒气冲冲地喊着：

“装死！她装死来对抗运动！先把她押回去！”

白慧一动不动地立着，眼瞧女教师被几个学生拖走。女教师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压在那几个学生的胳膊上。那一群人挤在一起，晃晃悠悠地走去。好象一架行进艰难的笨重的耕地机。后面伸出两只耙，那是女教师的双腿，软软地拖着。脚尖在地上擦出吱吱(口丑)(口丑)刺耳的尖音，在给伏日晒得快融化了的柏油路面上，划出两条歪歪曲曲、断断续续、漆黑发亮的线。

白慧的目光无意中碰到自己的木枪头。那里粘着一块鲜血，蚕豆一般大小，湿的，粘稠的。她看呆了。

郝建国正在她身旁，敏锐地看了她一眼。说：“看什么？这是光荣的，

我们就是要和敌人血战到底！”说着，他跑到同学们的前面，举起手里的木枪，用嘹亮的声音叫道：“同学们，战友们！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敌人并没有全部缴械投降，他们还在疯狂地进行反扑。用狡猾的伎俩和我们较量。我们要鼓足勇气，不能退缩。在敌人面前退缩是可耻的！为了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就是要和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血战到底 3 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血战到底！对顽抗之敌，必须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格杀勿论！”他给自己的话冲得满脸通红；脖子伸长，使枣儿大小的喉结整个凸出来。他使着全身的力气，两条瘦长的胳膊激烈地比划着，好象在空中胡乱划着圈儿。挂在胸前的哨子象秋千那样摆动跳荡。他用喉咙里最高的一个音节，鼓舞他的同学，“敌人在磨刀。我们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我们什么也不怕，为革命敢做敢当，敢于冲锋陷阵，浴血奋战。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的！”他把拳头用力举到可能的最高点。

勇气又回到所有人的身上。热血重新沸腾起来；在口号声中，一齐庄严地举起手里的枪。白慧也举起枪。在她白白的脸上，自我的正义感赶跑了刹那间的惊慌，恢复了先前那种冷若冰霜的容颜和坚定的神情。刚才给疑虑弯曲了的眉毛，此刻又昂然扬了起来。

然而，枪头上还粘着那块血，看上去有种肮脏和腌(月赞)的感觉。她转过枪头，使那块血看不见，但这杆枪拿在手中仍觉得不舒服。她急于抹掉它。在回到连部时，她乘别人不注意，装做无意那样，将枪头在门框上用力一蹭。她再没敢看，谁知那块血留在什么地方了。

二

她做了整整一夜恶梦。

一大堆破碎的、可怕的形象纠缠着她。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背朝她站着，就是不回过头来。她恐惧得使劲喊叫，但怎么也叫不出声来；跑也跑不掉。

爬到窗前的火一般的骄阳，用热辣辣的针芒把她刺醒了。她探开眼睛，看见一面雪白的墙壁，显得特别干净、纯亮。随后是柜子、门、发光的玻璃杯、衣架；衣架上挂着一件套红臂章的绿上衣和哨子。爸爸坐在过道的方桌前吃早饭。

她起来梳洗过，在爸爸对面坐下，拿起大饼和腌菜卷成个卷儿，闷闷地吃。爸爸戴着一副普普通通的黑边的花镜埋头看报纸。他象编辑看稿子，逐字逐句，唯恐失漏什么似的；嘴唇轻轻蠕动，无声地念着报纸上的话。他满头花发正对着白慧。白慧的目光忽然惊跳一下，这花发使她又仿佛看见昨天那个同样花了头发而不知死活的女教师。她心里还残留着方才梦中的感觉。

“你昨天干什么去了？”爸爸问，眼睛没离开报纸。

“我？”--难道爸爸知道了什么？

“当然是你。昨夜你又喊又叫。我叫醒了你。不一会儿又喊起来……”

爸爸的目光仍滞留在报纸上。

“……我喊些什么？”

爸爸抬起头，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脸自得象梨花瓣儿，目光惊疑不定。

“我一句也没听清楚。你怎么啦？小慧。”

“没什么。我们……昨天开了整整一天会。太累了！”她好象急于要把什么秘密掩盖住，又怕脸上露出破绽而扭向一边。

爸爸注意又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看报纸。

爸爸近来沉默了。

本来他也不爱说话。整天忙他的工作，很少对女儿讲话。要是白慧回忆起爸爸说过的话，差不多每句都能记得，因为他说得实在太少了。有时，爸爸那张方方的、红润、皱纹很深的脸显出高兴的样子时，会多说两句什么“好家伙，这回提前一个季度零两天！”或者“这回可好了。来了一台新式铣床！小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好象……好象当年弄到手的一挺机枪！来，爸爸今天高兴，出去请你！”于是，父女俩就出去吃一顿丰盛的饭。

爸爸的话顶多如此。也许因为那时她是个小孩子，对她说有什么意思？后来她大了，老习惯也延续下来了。她所知道的爸爸的一些情况，还是从爸爸单位来串门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呢！连爸爸由办公室主任提升为厂长、兼任书记的事，也是从旁听来的。爸爸的单位是个机床制造厂。原先有五百人，后来听说发展到七百人、八百人、一千多人了。她去找过爸爸。那儿有六七层楼高的大烟囱，机声震耳的大厂房。开会和演电影的礼堂又漂亮又气派。在厂里找人办事，常常要骑自行车才行。她从爸爸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感到爸爸是个宽和、正派和值得尊敬的人。

爸爸常把女儿从自己的日程表上挤出去，很晚回来才想到女儿没吃饭，他挽起袖子动手来做。这时，他会女儿歉意地笑一笑，还要骂她“小累赘！”他就这样爱自己的女儿。多年来，白慧没过几次生日。大多是因爸爸忙得安排不了；或者忘了，也是因为忙。但妈妈牺牲的日子，年年都要纪念。每逢此日，父女俩的神情都分外庄重。在悬挂在墙上的妈妈的遗像下，摆一个用白纱、丝带和花纸自制的精致的小花圈。父女俩面对遗像并排肃立。年年此时，爸爸都要对白慧说这么一句：

“别忘了你妈妈。”

妈妈小时在一个开烟馆的人家里当童养媳。她带着满身紫色的鞭痕冲出樊笼。在扫荡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和爸爸相识、相知、相爱，结了婚。部队南下过长江时，妈妈怀着孕还在野战医院里坚持工作。一次战斗结束后，爸爸去找妈妈。野战医院的同志们眼里噙着热泪，交给爸爸一个刚生下来两个月、哇哇哭的婴儿和一个小小的绿布包袱。妈妈在前四天被敌机炸死，尸体已经掩埋。这个婴儿就是小白慧。

包袱里装着妈妈的遗物，包括几件旧褂子，一把蓖发用的、掉了几个齿、粘着头发的小竹梳子和一本识字课本。那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物，也不需要它。遗物中顶珍贵的是一张妈妈本人的照片，夹在课本里。这是她参军后的第三年，一位随军记者照了送给她的。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回忆便失去了可以附着的轴。白慧也不知道谁是她的妈妈。

爸爸把这张照片翻拍放大，装在一个朴素的镜框里。原片太旧，本来拍照和冲洗就不大好，磨损得厉害，还有折痕。放大后模模糊糊，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烟雾。妈妈那双与白慧一模一样的细长清秀的黑眼睛，就象透过漫长岁月的烟尘似的冷静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与骨肉。白慧不会忘却妈妈。她自信深深了解死去的、差不多没见过的妈妈。知道妈妈的生命为谁贡献出来和被谁夺去的！她应当有一个多么美好和圆满的家庭，有一个多好的妈妈呀！万恶的旧世界和阶级敌人呵！

爸爸和妈妈的过去成了她的精神财富，何况这中间还包括她自己呢！

妈妈的遗像最早挂在爸爸的房间里，自她懂事那天起，就亲手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的爱和恨分明而强烈，从来没在这方面怀疑过自己。爸爸对她这方面也深信不疑，因为她一直是班级和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一年级就戴上红领巾，上了中学就加入了共青团。她能力强、肯干、办事果断，在团组织做总支委员。每年两次，她都把一张填满红“五分”的成绩单拿回来给爸爸过目，再拿到妈妈的遗像前给妈妈过目。她做得真诚和纯洁极了；

爸爸满意女儿的一切。以他的习惯，他对女儿的全部慈爱，都装在一个缄默、甚至有些严肃的套子里。白慧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不自觉地学会了。她和爸爸象一大一小两滴水珠儿那样相似。不过大水珠里含着许多酸甜苦辣，浓重而混浊；小水珠纯净透叽，晶莹闪光，象一颗水晶珠儿。

她非常自信，感情坚强而不外露。她从来不要别人帮助，一切都希望自己来做，自己解决。因此在同学中间显得有些落落寡合。由于自小就不象一般女孩子那样爱唱爱跳，因此带点僵硬气，脸上缺乏表情。爸爸也习惯了她。在这个仅仅两口人的家庭中，有时近似是无声的，各忙各自的事，很少交谈，却不寂寞，充满安静又和谐的气氛。

大革命来了！家里的气氛变了，虽然还是沉默，但是另一种沉默。

爸爸只要回到家，就跑进自己的房间，不是看报纸、读文件、翻看毛主席的著作，就是独自思考着。他抽烟抽得挺凶，以致夜晚睡觉时咳嗽得很响。

外边开始揭发当权派。爸爸是当权派，他究竟怎样呢？近来很少有同事来找爸爸，旁听也听不到了。白慧只问过爸爸一次：

“你单位怎么样？有你的大字报吗？”

爸爸脸上的皱纹反而舒展开了，现出少有的宽和的表情。

“大字报？它是去掉身上灰尘最好的扫帚，没有可不好。有！”

白慧的心也舒展了。她多么相信爸爸！他真行！一个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胸怀必定是豁达的，必定欢迎各种形式的批评，必定不会在个人得失上打转转儿，必定痛恨自己的缺点而希望快快除掉它！还用自己来给爸爸说教吗！

最近，外边斗起当权派，斗得很厉害。白慧他们在学校里也这么做。她不敢再问爸爸而留神察看爸爸的神情。她常常看不见爸爸。爸爸有时回来得很晚，一声不吭地吃过饭，回到屋里，给抽得浓浓的烟裹在中间。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凑巧。她去革人家的命，人家来革她爸爸的命。但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对的，尽管在感情上接受起来有些困难。

现在，她在想：爸爸是不是也挨打了呢？他不该挨打，因为他和那个女教师不一样。

爸爸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女教师是敌人。难道敌人还要受保护吗

她吃着东西，没滋没味。那件事象只小甲虫总在她心里爬，轰也轰不走，真有点折磨她了！从来没有一件事象这样，说又不能说，不说真难受。

“爸爸，你说应该怎样对待敌人？”

爸爸的眼球在镜片后面显得特别大。女儿的问题并不成问题。难道生活中早有了答案、非常明瞭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也有了新的含义吗？爸爸没吭声。

“爸爸，你们过去捉到敌人的俘虏怎么办？”

“你都知道，孩子。党有一贯的政策！”

“如果他顽固怎么办？应该打吗？”

“打？！那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政策！”爸爸忽然激动了，这也是少有的。

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这个问题刺激得又痛苦又气忿，好象已经超出了问题本身之外。他把眼镜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站起来向一边走出三四步，停住猛回过头，脸涨得很红。

“敌人才打俘虏呢！因为他们虚弱，理亏，无理可讲，不敢讲理，不能以理服人！我……曾经在战场上抓到一个敌兵。连长从别的俘虏的口中听说他也是个穷庄稼汉，就叫我给他做工作。我找他，他挺硬，不服我。我气极了，给他一个耳光。连长批评我一顿，说我犯了纪律，叫我向他道歉。我想不通，但还是眼从了命令，憋着火向他道了歉；再和他谈，谈呀，谈呀，谁知居然谈到一块儿去了。最后真把他教育过来了。那时，我才真正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单要在战场上杀敌，还要消灭反动阶级的思想，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反动阶级的思想不都在反动派身上。不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吗？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个道理是后来才听到的。那个被我教育过来的人，参加了人民军队，编进了我们排。他懂得了谁是他真正的敌人，所以在战斗中很勇敢，立了功。我还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当然，为了这件事，现在有人说我把敌人拉进党。他们还

……”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一股怒气从胸膛涌上来，又给他压下去。然后他好象空过半句话，一下子跳到他的结论上，“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还要分清是非。敌和我，是和非……都要分清，迟早要分清。嗯，迟早要分清！”

这是爸爸有史以来头一次对她说的成本大套的话。显然他心里的话也是拥塞得太满了。爸爸抬起手腕看看表，赶忙收抬起眼镜，戴上那顶檐儿店毛、晒得发白的旧军帽。

近来这顶帽子在爸爸头上显得大了些。

“我走了，该上班去了。”

爸爸走了。他的一番话，把白慧思维机器的开关全拧开了。

阳光从明亮的卧室向幽暗的过道迈进了两步，又渐渐退去。

问号有时有很强的繁殖力，成倍地增加。

她面前放着一堆无意识中撕碎了的小饼块。

有人敲门。她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胖胖的、圆眼睛的姑娘。她左眼有点微微向外斜视；整齐的短发又黑又亮，梳着一条小歪辫儿；穿一件崭新的绿军衣，缩着袖子；斜背个军用挎包，包儿贴在后腰上。这姑娘笑着说：

“怎么？不认得啦！你还做着梦吧！”

“噢，莹莹，进来……”

她叫杜莹莹，和白慧同年级，不同班。所以目前她们在一个连，但不在一个排里。

她父亲在军队里，是个团政委。四年前她随爸爸到这个城市来的。开始上初中时，她插班插在白慧班里，两人同座，家住得又近，很要好。后来升到高中分了班，两人依然常来常往。杜莹莹是个无忧无虑、不爱动脑子、性情温顺的姑娘。从小因为患上心脏病，受父母的照顾和关心太多了，自己的主见反而不多。她无论有什么事总要告诉白慧，请白慧替她出主意，做主。白慧自己的事也告诉她，却不听她的意见。白慧是把事情连同自己的决断一同讲给她听。

杜莹莹告诉白慧，郝建国催她快去学校，今天上午又开批斗大会。白慧方才想起，她已经把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忘掉了。

白慧今天说话有气无力，心里的事从脸上透出来。杜莹莹根本没注意到，只管催促白慧快走，一边在怨怪父亲送给自己的军上衣的袖子太长。

她们走在街上。白慧闭着薄薄的小嘴。杜莹莹只管张开扁长的嘴巴，饶有兴致地谈论郝建国。她对郝建国的口才很欣赏，还埋怨自己没长这样一张嘴，以致在辩论中说不出一句带劲儿的话来；有时明明有理，就是表达不出来；还有时，自己所占的理总是事后才想起来……

“莹莹！”这招呼，好象要阻止住对方喋喋不休的议论。

“嗯？”

“你说，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打？该吧！你说呢？”

“该不该打死呢？”

“怎么会打死呢？”杜莹莹笑呵呵回答，根本没认真去想。

白慧顺手一巴掌“啪”地拍在杜莹莹的手背上，气恼地说：

“哎！你真是所答非所问！”

杜莹莹这才发现她的好友今天有些反常。她略感惊讶又莫名其妙。昨天，她俩没在一起活动，她连白慧那块心病的边缘也摸不到呵！

她俩来到学校。校园的广场做为会场，主席台设在一个洋灰和砖石砌成的方形的高台上，这原是上课间操时体育教师领操用的。台上一切都已布置好，一大片绸制的红旗在阳光下缓缓翻卷，两三丈长的巨幅横标扯在中间，写着“红岩中学红卫兵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罪行大会”一行大字。台下已聚满学生。学生们都穿军衣。绿色连成一片铺满会场，很是壮观。还有些队伍在场外集合，整顿好的陆续开进来。尖利的哨子到处响着。很少有人说话。会场四周站了一圈戴红臂章、持木枪的学生……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人人脸上都很严肃，紧绷绷的，没一个人面带笑容。犹如战前摆列阵容，一种闻不到的火药味混在空气里。一段时间以来，白慧已经很熟悉这种气氛了，但置身其间，心里仍免不了象潮涌一般一阵阵激动着。

她找到了自己的排。副排长马英--一个矮小、黑瘦的姑娘已把队伍列好。白慧站在队伍后面和马英等几个同学小声说了些话。那些同学谁也没提到昨天的事。

郝建国大步从人群中走来。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白慧。

“白慧，你来主持今天的大会吧！”

郝建国和白慧都是学生的中坚人物。

“不，不，还是你来吧！”白慧推辞说。

郝建国明亮的目光在白慧不舒展的脸上停留片刻。

“你不舒服吗？”

“嗯？嗯！”

郝建国立即判断出，这不是白慧的原因。她另外有事。郝建国便说：

“好吧，我来主持！”

主席台上很快地出现郝建国瘦长的身影。他用嘹亮的、金属般的声音，象吹起进攻号角似的宣布大会开始。被批斗的对象，拘楼身子，由一对对学生用木枪头顶着后腰，在口号声中押上台。他们在台边面向群众密密站了一排，向台下弯下腰、低头，垂着胳膊和头发，好象河边一排弯弯的垂柳。此后便是一连串控诉、揭发和批判。这情景凡是从六十年代末期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并恍如昨日。

一个少年架着木制的单拐，一瘸一拐上了台。他的控诉使这场战斗上升到沸点。

这少年曾是全市中学生知名的、最优秀的跳高选手。他控诉一名叫李冬的体育教师，用“运动健将”、“第一名”、“奖杯”诱惑他，使他对锦标的荣誉痴迷了。他说李冬象“恶魔”一样，每天天刚亮就到他家门口招呼他去训练。他太疲乏了，摔坏了胯骨。

一条腿完了，成了终身残疾。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现在还不如一个老人。他哭了，哭得伤心而痛苦！

“他，就是他——”这少年倚着单拐，伸出一只手指着站在台前的一个高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愤恨地说，“事后，他还假惺惺地跑到我家来看我，还掉眼泪。当时真把我骗住了。现在我才把他看透。呸！这是鳄鱼的眼泪！他用资产阶级的功名利禄腐蚀毒害我。他使的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乎要了我的命阿！他害了我，夺去了我的一条腿，夺去了我的青春，他必须偿还！”

一条腿、一条腿呵！

义愤填满所有学生昂然凸起的胸膛。广场爆发起愤怒的吼声，一只只拳头不断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翻腾的绿色的怒海上掀起的浪花！

愤怒犹如一只无形的手，狂扯着所有人的心弦。

白慧挥着她攥得坚硬的、白白的小拳头。她喊着，一时恨不得自己能象炮弹一样飞过去，打在那罪人的身上。她喊着喊着，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这时身旁有个男学生猛叫了一声！

“打死他！”

白慧一惊。扭头正和这男学生面对面。这男生脸上洋溢着的高涨的激情，热烘烘地感染了她。

“真应该打死他！”白慧对那男学生说。

“对，他太可恨！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白慧随着喊起来，周围的人也跟着喊起来。似乎这三个字，此刻最能倾泄出他们的情感。她喊得嗓子都哑了。然而，一天来一直挂在心里边那个沉甸甸的东西，仿佛随着喊声甩出来了。她觉得分外轻松、兴奋，痛快淋漓，

浑身轻快而舒服地流着热血。

会散了。她刚走出大门。

“白慧！”

郝建国追上来。他显得精神十足，皮肤上泛着激动过后尚未消失的血色。瘦长的手抓着一个白色的纸卷，哨子在胸前跳动。

“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好！”白慧流露出的心情比嘴里表达出来的更强烈。

“你身体觉得怎样？”郝建国问，同时留意白慧的表情。郝建国的目光有种穿透力，好象能看进别人的心里。

白慧头一次怕他的目光，赶忙低下头：

“郝永革……，

“什么事？”

“我并不是因为什么不舒服……”

“我知道。”

白慧怔住了。他俩目光相遇，跟着白慧的目光就象兔子遇到了鹰那样，滴溜溜地乱跑，不知躲闪到哪里才好。她惭愧地嘟囔着：

“我动摇了！”

“为了昨天那个挨揍的牛鬼蛇神？”

白慧惊异地看了郝建国一眼，诚实地点了点头，并默默佩服郝建国的敏感和观察力。

“你同情她吗？”郝建国问。

“没有。她是阶级敌人。我恨她！”她肯定地说。

“你害怕了？因为看见血了？”

“我想不是……”她说，同时也在探索一天来自己产生那些心理的根由。

“你认为我们不对吗？”

“我……我不知道。”

“不，白慧，我必须提醒你！你可要警惕右倾保守思想，警惕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侵袭呵！这些思想毒素，正是那群乌龟王八蛋多年来拚命向咱们灌输的！以此麻痹咱们的斗志，瓦解咱们的队伍。把咱们变成一群小绵羊，好任他们宰割！刚才对李冬的控诉你听到了吧！说明什么？说明阶级敌人的凶狠。他们虽然不拿刀，不拿枪，却和拿刀拿枪的敌人一样狠毒！咱们文质彬彬、客客气气和他们斗争行吗？不行！革命就是大杀大砍，就要流血，就要掉脑袋！”这时，他明显冲动起来，面对白慧，两条瘦长的胳膊上上下下比划着，好象在轰赶蚊蝇，并且不自觉地吧嗓音放得很大，和喊一样，“革命是非常时期，什么条条框框、规章制度？叫它们见鬼去吧！在非常时期，连法律也可以保护敌人，成为敌人防止冲击的挡箭牌。你爸爸当年在战场和敌人用的是法律还是暴力？很明显，是用革命暴力击垮反革命暴力。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必须高喊‘红色暴力万岁’！‘红色恐怖万岁’！你不要一听‘恐怖’两个字也感到恐怖；感到恐怖的应当是敌人。如果他们真感到恐怖了，那很好，就表明他们感到革命威力了！你应当高兴，应当欢迎！一个革命者应当使用和发挥这种威力！”

当下，他俩是站在大街上说话，但谁也没觉得。好象两只船在激荡的波涛上兴奋地颠簸着。白慧心想，郝建国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演说从

来不打腹稿。可是每次演说记录下来都是一篇有头有尾、非常精彩的文章。他又富于激情和号召力，真能把素不相识的路人过客也号召起来，把石头也点起火苗。当郝建国讲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革命，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时，他的理论就叫白慧完全拜倒和心悦诚服了。因为这个姑娘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可以拿她的生命来做考验。

“可你呢？白慧……”他把到了嘴边要责怪白慧的话收回去，抬抬略尖的下巴说：“看你的了！”

他没再要求白慧表达看法。因为他从白慧眼睛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燃烧的思想，还有对他的感激。他对这姑娘感激的目光有一种朦胧的快感。

白慧象一个气球，给他打足了气，鼓鼓的，饱满又充实，似乎再一碰就要弹起来。

那看不见的创伤，仿佛涂上一层颜色漂亮、油烘烘的止疼膏，不再作疼。

她好了。

三

公园的大门早被一群大学生用大字报封死。他们谴责这里是“少爷小姐消闲享乐的乐园，是阶级敌人逃避革命的避风港，是培养资产阶级情调的温床”……大字报白纸上的墨笔字，个个都有椅子面一般大，拉开一种不可侵犯和违抗的架势。此外，还贴了一张学生们自撰的要“永远”禁园的通令。

几个月来一直是这种样子。公园的工作人员改从一个窄小的旁门进出。园内的野草都快长疯了。

昨天是国庆节。大批学生和工人群众组织来这里搞庆祝活动。人们喊着：

“放屁！谁说无产阶级不准进公园？”

大门就被轻易地冲开了。那张禁国令的有效期只好截止到昨天。

今天是十月二日。天气好。无论阳光照在脸上，还是风吹在脸上，都柔和而舒服。

郝建国的连队在这里庆祝国庆，随后就分散活动。白慧和六七个女同学分开上了两条船。

她们都不会使桨，几个人的胳膊全累酸了，船离岸并不远。

两条船上的姑娘们互相打闹着。使力撞船头，往对方的身上撩水。杜莹莹满脸水珠。

她肥胖的手指合拢起来没有缝隙，象只勺儿，把对方一个姑娘的上衣泼得湿淋淋的。长时间来，她们一直严肃地板着脸，头一遭儿这样开心打闹，笑得也那么尽情。

唯有白慧没笑，孤零零坐在船尾，身于朝外，光脚丫拨着清凉的、滑溜溜的秋水。

船儿摇晃，撩起的水珠儿溅在脸上，她一点也不觉得，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处出神了。

爸爸的景况愈来愈不佳。他在厂里认真做了十多次检查。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严肃的自我批判。工人们认为他的话实在，没有虚假和藏藏掖掖的地方，态度坦白诚恳，历史又清白，可以通过了。但总有不多的几个人和爸爸纠缠不休，抓住爸爸的缺点错误不放，在爸爸的检查里挑毛病，说爸爸是工厂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死心塌地的黑帮分子”，非把他打倒不可。好象他们几个是和爸爸有私仇的冤家。他们甚至说爸爸是“反革命”，并把这样的大字报贴满工厂内外，也贴到家门口。白慧又气忿一又害怕。她怕不明真相的邻居、朋友、同学、路人真把爸爸当做“反革命”看待。她不敢到别人家串门，连学校也不常去了。爸爸明明是老革命，为什么偏说他是反革命？她气极之下，写了一张支持爸爸的声明。声明上面向外人公开了爸爸和妈妈光荣的历史。她要把这张声明盖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还要找那些人去辩论。爸爸火了，和她吵得厉害极了，骂她“帮倒忙！”爸爸向来没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好象要把心里憋着的闷火全泄给她似的。她委屈又赌气地把声明撕了，哭了一夜

这期间，白慧的同学们发生了分歧。那个矮个子的副排长马英认为郝建国前一段时间的做法“打击面太宽”、“动手打人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等等，在连部里与郝建国吵翻了。运动前郝建国做团总支副书记时，马英担任过支委，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他俩和白慧关系都不错。郝建国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强，又一直非常肯干，把学校当做家似的，因而深受马英的钦佩和信服。这一点，郝建国都曾愉快地感到了。现在马英这样指责他，他受不了，便骂马英“攻击革命小将”和“替牛鬼蛇神翻案”。

两人分裂了。马英不再到学校活动。白慧站在郝建国一边，因为郝建国在她眼里一直是个充满激情、虔诚的革命青年。然而马英的观点无形中碰到了白慧心里的那件事。

伤快结痂了，此刻又在药膏下隐隐作疼。

现在她脑袋里象打仗那样太混乱，没能力给那件事作出结论。

她在摇摆的船上。同学们笑得那么响，她一点儿也没听见。白得刺眼的阳光在坦荡的湖心闪耀一片迷乱的亮点。

杜莹莹打败了邻船的女友。对方笑嘻嘻地投降了。杜莹莹要跳到邻船上，慰问那几个湿淋淋的败兵。她站在船边刚要跳出去的一刹那，眼底下漾动的水波使她害怕了。但重心已经出去，慌乱中她使劲一蹬船舷，人扑过去。只听“噗通”一声！杜莹莹没有落水，她蹿到了邻船上；这边的船猛烈摇晃着，船上的两个姑娘站不住，都蹲下了。但船尾白慧坐着的地方却是空空的了。

“哎呀，白慧掉下去了！”

“哎呀：哎呀--”

“快救人呀！”

只见水面上忽然涌出白慧的黑头发和一只白白的手，胡乱抓着；跟着又象水底下有人拉她似的，沉下去不见了。白慧不会游泳。船上的几个姑娘也都不会游泳，急得向四外大声呼救，声调都变了。杜莹莹又哭又叫……

岸边有人跳下水，奋勇游过来。幸好船离岸不太远，来人飞快赶到。翻身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留下两个漩涡。跟着咕噜咕噜漂上来一串气泡。很快，人浮上来了。一个蓝色的，一个绿色的。白慧得救了！

这人把白慧托出水面，姑娘们抓住白慧的胳膊拉上船。这人也上了船。

在船上，这人帮助白慧吐出两口水。白慧没有昏迷。她满身是水，倚着一个同学的身子，伸开腿坐在船板上。她扬起了挂着水珠的眼睫毛，直视着救了她的人。同学们也才注意到这个见义勇为的人。

原来是个青年，高个子，模样普普通通，却显得挺淳朴；黑黄的脸儿，厚厚的嘴唇；唇上生着稀疏的软髭，眼睛非常黑，不象郝建国那样光芒外露，而是含蓄又幽深。他下水前没来得及脱衣服，全都湿透了；湿衣贴在身上，显示结实的身形。他面对白慧站着。

从裤腿淌下的水在脚周围汪了一摊。

“你怎么样？”他问白慧。

白慧摇摇头说：“没事。”

“你回去多喝点热姜糖水就好了。哎--”他对姑娘们说，“你们把船靠岸吧！我走了。”

姑娘们向岸边摇船，一边对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白慧没说。她觉得无论说些什么都显得多余，没份量。人家救了自己呵！

姑娘们还问这青年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青年无声地笑了笑，作为回答，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做什么事。完全没有施恩求报，乃至接受谢意的意思。

他脱了鞋，把鞋子里的水倒入湖中。又脱下褂子拧下许多水来。姑娘们争着要把自己的外衣借给他穿。他不要，但穿这件湿衣怎好回去？他只得答应了。杜莹莹把自己外边的军上衣脱下来，摘掉臂章，给他穿上。这件上衣穿在杜莹莹身上显得肥大，穿在他身上却非常合适。杜莹莹说：

“你穿去吧！你住在哪儿？怎么称呼？过几天我去取好了！”

“河口道三十六号，我叫常鸣。”他说完马上又改口说，

“你别来了。还是我给你送去吧！”

“不，不，我去取！”杜莹莹客气地说。

“不！”常鸣以坚持使对方服从自己的口气说，“我明朝下了夜班就给你送去。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红岩中学。以前的五十五中学。我叫杜莹莹，她叫白慧。”

常鸣看了白慧一眼。白慧一直在静静地瞧着他。那张白白的脸习惯地没有笑容，一双给水泡得发红的眼睛里却温和地闪着深深感激的光。

船靠岸了。常鸣缩起裤腿跳上岸坡。他摇了摇手中的湿衣服说：“再见吧！明天我给你们送褂子去。”就转身走了。

姑娘们和他道“再见！”白慧站起来目送他。大家全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他走进一片给秋风吹得疏落了的小树林子。

她们也上了岸，岸上围过来几个人。这几个人刚才都目睹到白慧落水又被那个青年奋勇救起的一幕。一个上了年纪、胡茬挺密的人对白慧说：

“你好险呀！这湖是个锅底坑。你懂得什么叫做锅底坑吗？和锅底一样。人掉进去，一碰到底儿就往中间滑。中间有四五丈深，满水草。要是陷进那里边，甭说你，就是水性好的人也没命了！多亏那小伙子救了一命呀！”

另几个人也这么说。听他们的口气，显然都被那个青年的行为感动了。

他确确实实救了白慧的命呵！

白慧扬起头，追索般地往大堤那边望去。在那边夹杂着茶褐色的绿柳堤上，走着那高个子青年渐渐远去的身影。

转天上午。白慧来到河口道三十六号的门前。她还是穿一身绿，但没

戴帽子，一双梳得光溜溜的短辫垂在后肩上。

这是所旧房子，三层楼的大杂院。残缺不全、满是红锈的铁门大敞四开。门轴已经锈死，固定住了，再开大点或关上都不行了。

楼房的东侧大墙给爬墙虎浓绿色、巴掌状的叶子盖得严严实实。秋风把一些老叶子染红了，瞧上去斑斑驳驳。窗口处的枝叶都被剪掉，露出一个个方形的洞，当下窗玻璃在幽黑的洞里反着晨光。院里几棵枝叶繁茂的洋槐长得和楼顶一般高。

院子挺大，安静。由于房身遮翳，大部分躺在凉爽的阴影里。靠墙根停着几辆自行车。扫过的地面又落了许多干卷了的槐树叶子。一个蓬头发的老大娘在门口生炉子，从长筒的拔火罐冒出来的浓白色的烟升到半空中，在阳光里化成一片透明的蓝雾。

“老奶奶，您这儿有个姓常的吗？”

“姓常……”她偏过耳朵，干哑着嗓子说，“是姓常吗？没有。”

“这不是河口道三十六号吗？他说住在这儿呀！姓常，叫常鸣。”

“没有，没有。我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过姓常的。是不是姓藏？姓藏的那家十年前也搬走了呵：没有。你准是把地名弄错了。”

白慧觉得奇怪。这时，院里跑过来一个十来岁、模样挺伶俐的小女孩。她刚才在院里玩，听见这位老大娘的话，她叫着：

“呀，张奶奶，您真糊涂。前些天刚搬来的那个人不是姓常嘛！”

“唷！对呀！您瞧瞧，您瞧瞧！连小丫头都说我糊涂了，可不是吗？！”

老大娘皱巴巴的脸带着窘笑说，“对，是姓常。一个单身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对吧！人家天天上班下班碰见我，还和我打招呼，叫我‘奶奶’，我倒把人家忘了。来，您就进楼吧，见了楼梯一直往上走，上到顶头。他就住在顶上边的一间。”

从这儿看得见那间屋子的窗户，是扁长的，快被爬墙虎的叶子吞没了。大概是间亭子间。

在楼梯的尽头是个两米见方的小过道。迎面是扇低矮的门，早先涂着白垩漆，已经发黄。门两旁堆着破木头、炉子和炉具、花盆等物。还有一盆玉树没有死，绿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尘。这儿的房顶抬手就能摸到，的确是间亭子间。她敲门。

“谁？”房里有人问。声音微弱。

“我，我找常鸣同志。”

“请进吧：门没锁。”

白慧转动门把，门开了。她走进去。屋里光线昏暗，空气窒息，如同进了山洞一般。

迎面的窗子透着厚窗帘，却有一长条的地方没这严，射进一道强烈的阳光，恰好拦在白慧面前，好象一堵固体的墙，反而前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噢，是你。我应当给你把褂子送去。不巧发烧了，叫你跑一趟。衣服在柜子上，你自己拿吧！”常鸣的声音在对面发出。

白慧向前走了两步，穿过阳光，看见常鸣躺在床上，盖着薄被和一条毯子。

“你坐吧！这有椅子。”

白慧坐下。椅子和床之间是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水杯、药瓶、破报纸、书和一只竹壳的旧暖瓶。

这个还挺陌生的青年面颊烧得很红，白眼球也红了，目光浑浊而黯淡，一些头发贴在汗津津的脑门上。他好象烧得很难受，连打起点精神应酬一下来客的念头都没有了。

白慧见桌上有一支温度计。她提着玻璃杆儿横在眼前。银色的水银柱指示数字的一端，停在40度刻度的边缘上。

“哟，你烧得这么厉害！我，我给你请医生去！”

“不，不用了……我刚吃了药。”

“不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

“不，没关系。我只是有点感冒，没别的病，退了烧就好了。”他从被窝里伸出手用力又无力地来回摇着。他仿佛也有一种拒绝别人帮助的固执的个性。

白慧拿起桌上的药瓶，是安痛定。

“你还有别的药吗？”

“这药很好。有它就足行了！”

白慧听了，忽然站起身说。“我走一会儿就来。”跟着出去带上了门。

“你去哪儿？”常鸣在屋里叫着。

白慧跑回家拿了钱，到了药店急匆匆地问：“有哪种药治感冒、退烧退得快点的？”她扶着玻璃柜台头向里探着，好象要跳进去似的。

药店的售货员见她这副样子，很觉好笑，但知道她很急，立即说了一长串对症的中西药的药名。

“一样来点儿吧！安痛定不要了。”她说。

售货员便一边把各种药的眼法告诉她，一边把几种药按剂量包好放在一个小盒子里交给她。她拿了药付过钱，转身就走。售货员惊奇地看着这个姑娘匆匆离去的背影，对另一个售货员说：“真稀奇！买糕点倒是有一样来一点儿的，买药还没见过。头一遭遇见！”说完，他笑了起来。

白慧真去买糕点了。还买了一大包鸭梨和苹果，都要最好的。随后她回到河口道三十六号，把这些东西往常鸣床旁的小圆桌上放。

“你……”常鸣非常不安。

“先吃药！”白慧说着一拿暖瓶，份量极轻，“哪儿有热水？”

“我每次都找邻居要。”

白慧没说话。下楼找门口那位姓张的老大娘要了一瓶热水。拿回来给常鸣斟了一杯。

然后把药片从撕开的药盒和纸袋里挖了出来。“先吃阿斯匹灵，快！”

常鸣对她笑了。笑里含着被对方的真情感动了的意思。他吃了药，把一双胳膊交叉在脑袋下边枕着。

“你昨天下水着凉了。”白慧说。

“不是。我夜里没关窗户着了凉。”

白慧想到他说的不是真情，因为照他昨天在船上说的，他昨天上夜班，夜里不会在家睡觉，显然是下水救她时着的凉，回来就发烧了。

随后两人无话可说。他俩还很陌生。白慧拿起水果找水来洗。

“要不要给你家里人送个信？”

“我家里没旁人，只我自己。”

白慧一怔，看着他。

“我是孤儿，早没了父母。”他停顿了一下说：“是叔叔养大的。他前两

年也病死了。”

白慧把水果洗好擦干净，放在一个碟子里，又反复交了两遍药的眼法，便要返回家去。“再见！”白慧站在门口说。

“你不用再来了。我明天好了就上班去。”

白慧没吭声，低头走出去了。她走后，常鸣发现那件借穿的军上衣依然放在柜子上。

屋里静静的，只有常鸣自己。阳光移到身边的小圆桌上。洗过的、擦得发亮的红苹果，颜色非常鲜亮，散着香气；纯白色的小圆药片一对对排在一一张干净的纸上。这个刚走的、脸上没什么表情而话又很少的姑娘，在他心里留下一个最初的、却有份量的印象。

四

事情的开头往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接连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如果白慧第二次来看常鸣，常鸣的病好了，她取走了杜莹莹的衣服，也许下面的波澜不会产生。偏偏白慧再来时，常鸣的病情加重，感冒转成肺炎，她请医生来给常鸣打针，还必须天天来照顾这个无亲无故的青年。

她一接触到这个青年的生活，才发现单身无靠的人的生活处处都有困难；这种人的生活得不到照顾，没有分工。生活机器上每一个部件照例一样也不能少。如果没能力多照顾一下自己，很多地方只能将就将就。于是，凡白慧见到的都默默帮他做了；做得认真，细心，又诚心诚意。常鸣阻拦她。当他对付不了这个姑娘的执拗时，只能报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任她去做。

白慧感到了常鸣有种古怪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甚至怕对方因为受恩于己而来感恩报德；不愿做那种施恩求报的庸人。白慧呢？尽管深深感激常鸣的救命之恩，但一直没对常鸣提起过那天自己被救的事。这不单是为了迁就常鸣古怪的自尊心。她的嘴向来是挺硬的，即使由衷钦佩、强烈感激哪个人，嘴里也吐不出轻飘飘的漂亮话。

在这一点，他们还挺相象呢！

常鸣病了十多天。两人天天在一起，虽然不大说话，渐渐不陌生了。爱说话的人碰到不好说话的场合会感到尴尬；习惯于缄默的人则不然。无言中，一样可以相互了解和熟悉。白慧从常鸣对待病的态度上看出他是个坚强的人，极有克制力。虽然年轻（他说他二十二岁），却没有一般年轻人的浮嫩。他比较成熟，连模样也显得比年龄大几岁。

这一切恐怕都是他长期孤儿生活中养成的。白慧很想知道他的孤儿生活是怎样的，常鸣一字没提到过。他只说自己是红旗拖拉机厂的技术工人，喜欢跳高、游泳、滑冰和看足球比赛，这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不是故意告诉白慧的。白慧不好问旁的，她有什么权利打听别人的私事呢？她偶然间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提到自己从小也没有妈妈，但没讲过妈妈的事。妈妈的历史是神圣的，她从来不随随便便讲给别人听。不肯让人家误以为她拿父母的光荣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她总坐在椅子上，和他只隔着那张小圆桌。

常鸣在同病魔进行艰苦的斗争。他使劲皱着眉头，紧闭的眼皮微微颤抖。脸颊一阵烧得通红，一阵变得纸那样白，牙齿咯咯打战，但喉咙里没发出过一丝叫苦的声音。只有一天，他烧得最厉害的时候，昏昏沉沉中忽然叫了一声“妈妈”，眼角里溢出一颗明亮的淡青色的泪珠，沉甸甸滚落到枕头上……这情景在白慧心中唤起了同情。白慧没有妈妈，在病痛中也希求过母性的温存和慈祥的爱抚。况且常鸣是个孤儿，还没有爸爸。

她见他痛苦，自己也感到痛苦了。每天来到这儿之前，都盼望能够见到常鸣康复的面容。

过了十多天，白慧盼到了。这天，常鸣击败了病魔，面颊上病态的红晕褪去了，眉头舒展开，好象风暴喧闹的湖面，终于在一个早晨恢复了风平浪静。他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笑的涟漪，黑黑的眼睛闪出清明的柔辉，一眨一眨看着白慧。白慧忽觉得这双眼睛里仿佛含着一种东西，使她感到一阵慌乱，心儿象受惊的小鹿，腾腾地蹦跳起来。她不由自主躲开常鸣的月光。

“我好了！”常鸣说。

“呵，是吗？”白慧抬起头说。

常鸣没再出声。白慧大胆地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眼看着自己放在胸前的手，手指无意识地动着。他好象也没有勇气来瞧白慧了。突然之间，他们重新变得陌生了。有人说：熟悉中也会感到陌生，大概就是说这种时刻吧！

白慧慌忙提起暖瓶，转身往外走。

“我去打点热水。”

“不，你不用去了。”常鸣说。

“怎么？”她问。没回头，脸朝着门。

“早晨张奶奶上来给我灌了一壶，还满的呢！”

白慧这才感觉到手里提的是装满了水的暖瓶。刹那间好象有什么秘密叫对方发现了似的，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脸上热辣辣的，大概很红呢！

她象一只舵杆出了毛病的小船，顷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乱了，驾驭不住自己，做事颠倒，连最平常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回到家，对着镜子好奇地打量自己，镜子里那个人好象不是自己。然后她朝自己的脑袋击了两拳，悔恨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失常的举动。

第二天，她来看常鸣，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神情、举止、做事、言谈都很镇静。

她努力收拾起慌乱中所失落的。

船尾上的舵杆修好了，小船平稳不摇，好象抛了锚。

她见常鸣的目光不含那种意思了，神态很自如，自己就故意做得更自如一些，说话也随便一些，无意间招致一场冲突，这原是想不到的。

常鸣下床了，还很虚弱，走了几步摇摇晃晃，和他结实的身形很不调和，只得坐在椅子上。白慧替他收拾床头，发现有几本旧书。她拿起一本翻了翻，皮儿残破，纸又黄。

她扔在桌上，随口说：

“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还不烧了？！”

这是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译本。常鸣看了她一眼：

“乌七八糟？你看过？”

“我不看，这是资产阶级的！”白慧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见解。

“如果列宁也看过呢？”

“他看？”白慧怔了一下，马上找到一种按照自己的想象假设出来的理由，“那是为了批判！”

“仅仅为了批判？谁说的？”

“我这么想，肯定是为了批判！”

“如果列宁挺喜欢这本书呢？”常鸣微笑着问。但辩论中的笑，容易被对方误解为一种讥消和挖苦。

“我，我不知道。可能把它当做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吧

……”她迷惘了，停顿了片刻，跟着想急于摆脱这种迷惘似的，急躁地一摆手，“反正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应该看，所有旧的东西都不应该保留，因为……”她不得不又停顿下来。因为她一向认为不值得推敲，非常充分的道理，却没有充分的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甚至没有更多的话来为自己辩解。她有种自我的贫乏感。“反正不应该……”

“不应该？谁规定的？”常鸣也认真起来。

“革命！”她说出这个词儿，立刻感到自己理直气壮了。单凭这个词儿，谁也不能反对，拿它足可以压倒对方，她便以一种胜利者的神态反问常鸣：“不对吗？”

“听起来很完美。”

“什么意思？”

“什么叫反革命教师？”常鸣紧锁眉头，说话的口气很本平静了！

“利用讲台宣传封资修，宣传白专道路，毒害青年，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革命！”她叫着。细长的眼睛里有股激情，象翻涌的水浪在湖中冲荡。

“也该消灭吗？”

“该！”她不知不觉重复起郝建国的话，“革命就要大杀大砍，用革命的铁拳砸烂他们！就是要用红色恐怖埋葬敌人！”

常鸣猛站起身，两条胳膊激动地抖着。那病愈之后略显消瘦的脸白得非常难看。他给白慧的印象是成熟而有涵养的，此刻不知为什么他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冲着白慧喊道：

“你这不叫革命！是法西斯！”

白慧惊呆了。这句话竟和那个女教师说过的话完全一样。但现在用这句话指责她的，不是敌人，而是救了她生命的人，自己的人。

旧伤口崩裂了。她痛苦地垂下了头……

常鸣一声喊过，自己也呆住了。他好象站立不住那样：一只手撑在小圆桌的桌边上，另一只手捂住了脸。额前乌黑的头发直垂下来。这样一动不动地沉默了多时，才离开桌旁，慢慢走到屋角那边。

“白慧！”这个声音好象在喉咙里打了两个转儿之后爬出来的，低沉极了。又停了片刻，似乎平静了下来，才接着说：“请原谅……我太冲动了，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你的话刺激了我……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但请你相信，我仍然相信你是个好。你有革命激情、信念和勇气，可是你过于单纯。请原谅我的直率：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革命领袖不是教孩子做事的大人，而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斗争的导师。

革命总不象消灭老鼠那样容易。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就会盲从那些口号而误入歧途……白慧，我不想教训你。

因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儿，他象吃米饭吃到砂子那样，活动着的嘴巴忽然停住了；随后又说：“我的话太多了。照目前某些人的判断，我这些话应当算反动言论呢！水平线给他们拔高了，原来水面上的东西倒成了水下边的了。正常的变成反常的了。噢，我的话实在多了……你总不会拿我也当做敌人吧！”

白慧一直低着头，两条短辫的辫梢压在肩头。她的头发软，辫梢象穗子那样散开。

她摆弄自己的衣角。

后来她站起身，说声“再见！”就走了，始终没看常鸣一眼。昨天她也是这样走的，但情况和心情完全两样。

昨天她象一只快活的小鸭，今天却象只受伤的鹰。

五

大约一二百名学生象一群惊马，从红岩中学的街口乱哄哄地飞跑而来。后边是一倍以上的学生拿着木枪、呐喊着追上来。一边追一边抛出砖头瓦片，如同飞蝗一般落进前面奔逃的人群里，噼噼啪啪摔得粉碎。被击中的抱着脑袋奋力奔跑。岁数小的女学生吓哭了，跑慢了的做了俘虏。

两群学生大多穿绿衣服，戴红臂章。败逃学生的臂章一律写着“红革军”。追击者的臂章上印着“浴血”两个黄色的大字，还打着一面这样字号的红布大旗。

近来，运动和前一段时间不一样了。它往深处发展，人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进入表面，不同的观点就产生出来。辩论到处激烈地进行着。在大动荡时期，辩论不是平心静气的，火气、自尊心、妒嫉心理、人与人之间旧的成见与新的看法，都难免加了进去。误解和误会也不可避免。斗争更加难解难分。各种奇怪的论调又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敌我和是非一时分辨不出。分歧就演化为分裂。对立演化成敌对。红卫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各个单位、工厂、学校，都分化出许多大小团体。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象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斗争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这期间，坚持己见的马英从郝建国那里拉出一部分观点一致的学生，在校外组织一支队伍，叫做“红革军”。他们刊行了一种油印的四开纸对折的小报纸，专门批判修正主义，还配上生动的漫画，在社会上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欢迎。他们还在市中心自发而有组织地值勤站岗，维护治安。别看他们人不多，但联系面甚广，颇有影响。郝建国感到对他是一种压力，他骂红革军“吆买人心”，骂马英“有野心”。自己也成立一个造反总部，叫做“浴血”兵团，和马英针锋相对，还用了不少办法想搞垮红革军，但没能成功。一月份以来，各地掀起夺权的热潮。各个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都纷纷从当权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其实，这些权力实际上早不在被打倒的当权派手中，它却意味着造反派掌权获得公开的承认和合理化。按当时“夺权”的规矩，夺权应由该单位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一齐干。但郝建国事先没通知红革军就单方面夺了权。今天，郝建国派人把红革军请来，说要开庆祝夺权胜利

大会。红革军来了，在会上才知道郝建国已经把权夺到手，请他们来无非是想叫他们承认这一行动和夺去的权力。红革军当然不干，会场顿时大哗，两个组织约数百人面对面展开集体的舌头大混战。郝建国早有准备，使用了武力……红革军猝不及防，被打出了学校。他们跑出一个路口，忽被一个声音叫住了：

“别跑，同学们！咱们跟他们讲理，他们为什么打人？”

败逃的红革军停住了。前面站着一个矮小、黑瘦而爽利的姑娘，梳一双小短辫，绿棉袄，脸儿冻得挺红。她是马英。红革军转过身，面对追上来的“浴血”的人。马英勇敢地站在最前头，朝“浴血”呼道：

“你们找我们来开会，有分歧可以辩论，为什么打我们人？为什么搞武斗？！”

她的喊声并不能制止猛冲上来“浴血”的人。“浴血”中有人用金属般嘹亮的嗓子叫：

“你们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车，就该打！好人打坏人--应该！”

这声音在他们中间搅动起更凶猛的狂潮，他们呼喊。声音中有嘶哑的怪调。又一批砖头象雨点一般飞过来。大半块砖“嘣”地打在马英的胸脯上，马英双手捂住胸，一锅腰，坐在马路中央。

“活捉马英！活捉红革军的坏头头！”

跑在最前头的几个“浴血”的人，蛮横、勇猛，直朝卧在池、上的马英奔来！

红革军中的几个男学生迎上去和他们混战一团。马英被救走，可是大批“浴血”的人赶来，又一些红革军的人被捉住。

红革军的学生们发怒了，拾起打来的砖头抛回去。“浴血”受到阻击，停止了攻击。

红革军的残部撤下来，有的人头破血流。他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便道边站着一个人，立即从她白白的脸认出是白慧。白慧围着一一条驼色头巾，胳膊戴着“浴血”的臂章。

红革军的一些人发出叫喊声。

“‘浴血’镇压群众，罪责难逃！”

“‘浴血’搞武斗，决没有好下场！”

“打倒‘浴血’一小撮！”

这些人刚挨了打，此刻都把满腔怒气朝她发泄出来。尤其那些被打伤的，喊得更凶。

白慧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短发的女学生朝她叫着：

“真不要脸！你老子是走资派，你还混在群众组织里！”

“回家教育教育你的反动老子去吧！”又一个人叫道。

白慧听了，气得浑身直抖，她不准别人侮辱她的爸爸，跺着脚朝他们喊：

“你们住口！放屁！”

于是红革军和她对骂起来。此时，马英从人群里站出来。她双手捂着胸口，那样子似乎在忍着疼痛，忿恨地说：

“白慧，你还不醒悟？郝建国都搞些什么？他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你充当他的帮凶、打手，还不及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你诬蔑！我们打的是阶级敌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

她的话被一片口号和起哄声压住。她使劲喊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耳朵里灌满了红革军的哄喊。

“打人凶手快快低头认罪！”

“捉住她。拿她和‘浴血’换咱们的人！”

这时已有几个红革军朝她跑来。

情况不妙！她转身朝学校那边拚命地跑，渐渐把追赶者队脚步声甩在后边。跟随着她的只是一片愤怒的呼喊，还有几块砖头从她身边飞过，并有一块重重地打在小腿上。

她不觉得疼，一直跑到学校门口。

学校大门紧闭。门两旁的墙上站着自己的人，手持木枪。脚跟旁还放着一堆堆砖头瓦片和空瓶子，以及原先上体育课用的铁头的假手榴弹。他们见白慧来了，开了一道门缝放她进去。

广场上的人极少。主席台那边挂一幅大红布的横标，写着“庆祝红岩中学革命造反派夺权胜利大会”。空荡荡、平光光的广场上，给斜阳印着十数面拉成几丈长的飘动的旗影。中间满是大大小小的砖头。还有军帽、废纸、一两支折断的木枪头；砖块在地上砸成许多小坑儿。显然，刚才红革军和她的“浴血”在这里发生过武斗。眼前的景象表明这场恶斗有多么激烈。

“白慧！”

她搜寻叫她的人。远处跑来一个姑娘，原来是杜莹莹。小歪辫在头上一扬一扬，挎包“啪、啪”拍着圆圆的后腰。杜莹莹跑到白慧的跟前，一边喘气一边说：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

“呵，是你呀！还有谁？最近郝建国叫我找了你三趟，每次都碰到你的大门锁，要不就叫不开门。你出门了吗？”

“找我什么事？”

“什么事？刚才还出大事了哪！”杜莹莹睁圆了眼睛说。左眼的斜视较平时更明显一些。

“怎么回事？”

“这些天，咱‘浴血’的人分化出去不少，都叫马英的红革军拉过去了。郝建国急坏了，还以为你也跑过去了呢！我说你不会，他倒是挺相信你的。马英真不是东西，她剜心眼想把咱搞垮、吞掉。”

“咱的人怎么会去加入红革军？”

“还不是相信了马英那套鬼话。马英很会造舆论。她说郝建国搞资产阶级专政，打人，镇压群众；还有什么‘打击一大片’啦！破坏党的政策啦！纯粹胡说八道。居然有人相信她那套。人家郝建国为了革命，从运动开始就天天住在学校里。说他搞资产阶级专政，哼！他为什么搞资产阶级专政？难道为资本家吗？纯粹放屁！我看马英不单单恨郝建国、嫉妒郝建国，她有野心！你说对吗？”

白慧怔着，没说话。杜莹莹接着说：

“刚才又发生一场武斗。可吓死人了！大砖头来回飞，差点出人命。前两天咱夺了学校的权，今儿请红革军来开会，红革军说咱单方面夺权，不承认。随即就大打起来。

事先，郝建国布置好，马英要是反对就把她扣起来。咱人多，不怕他们闹事。几座大楼都布下埋伏。谁知马英很鬼，她本人没来开会。你没瞧见刚才那场面呢！好家伙，可把我吓死了！照这样下去，我心脏准出毛病。”

“郝建国呢？”

“在办公楼，二楼总部办公室里。你去吧！他见了你保管高兴。我回去了，还得给弟弟妹妹做饭呢！我爹支左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下班又晚。家里的事缠得我分不开身。我可走啦，过两天到你家玩去！”

两人分手，白慧进了办公楼。

楼道里挤了许多人，一片吵闹声，而且吵得相当厉害。这里光线暗，白晃晃的日光从楼道另一端的玻璃窗射进来，从这边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人影。白慧挤上去看，原来是些红革军的俘虏被围在中间。这些人大多和白慧不是同年级的，面熟但不认识。“浴血”的人正在用硬梆梆的拳头教训他们。他们不服，发出被激怒的抗议声。

“你们凭什么单方面夺权？我们就是不承认！你们用拳头棒子也不能使我们屈服！”

“去你的！你们破坏会场，想保走资派的权，妄想！印把子在我们手里了！”一个“浴血”的人叫着。

“我们宣布：夺权无效！”被俘的红革军气咻咻地喊道。

“呵--你宣布无效，是吗？”另一个“浴血”的人用一种含着戏谑意味的怪腔调说，“你不过在这儿放了一个屁！”

人群中爆发一阵开心、胡闹和讥消的笑声，并夹杂着辱骂红革军的话和起哄声。有人把红革军的帽子摘下来扔在半空中。还有人上去动手动脚。这些红革军大叫：

“你们这是耍流氓，有理可以辩论嘛！”

看来，这种场合毫无辨明是非的可能。

白慧一声没出，看了一会儿，从喧闹和扭打着的人群中挤过，上楼找到了郝建国。

他在总部办公室，正与另一个学生研究大字报和标语的内容。

郝建国见白慧进来，只说一声“你坐！”然后扭过头继续对那学生摆着瘦长的胳膊说：“再加上一条‘红革军的坏头头马英是制造 2·27 反革命反夺权事件的罪魁祸首！’”

那学生的目光一亮，兴奋又赞赏地说：

“好！这就带劲了！”

“就是嘛！擒贼先擒王，箭头要对着靶心，目标要找准，打得还要狠！”

郝建国一拍那同学的肩膀，用一种老练的指挥者干练的口气说：“你快去写。必须不出今天把这条标语贴到他们总部门口的大墙上。”

“好！”那同学兴冲冲地走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郝建国没说话，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低着头，两只手玩弄着胸前的哨子。他对白慧的态度完全不象杜莹莹说的那样。他相当冷淡，明显表示出对白慧的不满。

屋角戳着几杆卷起来的旗子和一大堆木枪。靠墙排列几个档案柜，柜上的暗锁都撬去了，露着洞眼，却贴了交叉成十字形的封条；还有两张黄木桌，放着一架油印机和大堆白纸与印好的传单。墙上涂满毛笔写的各种各样的口号、漫画人头像和辱骂当权派的字句。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话。这儿原是

校长办公室。郝建国坐在这里确实很神气。屋里没生炉火，空气很凉，依然飘着一股挺浓的油墨和墨汁的气味。

“你的政治态度如何？”

郝建国终于说话了。他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几乎是一种审问的口气--问白慧。他没听见对方回答，便抬起头用他敏锐的目光瞥了白慧一眼。这张白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是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好象有种莫解的、又确定了的含意。他刚要说话，白军已经站起来，走到桌前摘下了臂章，又折成两折放在桌面上。郝建国突然象被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椅子撞在身后的墙上。他双手按着桌面，朝她咆哮着；

“叛徒！你果然向马英投降了！”

白慧从细巧的鼻孔里发出一声冷笑，板着面孔说：

“不许你诬蔑我！谁是叛徒？”

郝建国抓起桌上的红臂章，在她面前用力地摇着，吼着：

“你这是为了什么？”

白慧什么也没说，转身把小辫儿从胸前甩到背后，跟着在总部的门口消失了。

转天，杜莹莹来找白慧。她同白慧扯闲天，表面上没什么事，可是表情不大自然，显得挺费劲。然后，她好象把背着的一件什么重东西扔在地上似的，松了口气说：

“算了，我不和你绕脖子了。郝永革不让我说是他叫我来找你的。我不费这份心思，照直对你说吧！他叫我来打听你为什么退出‘浴血’总部。”

“不知道。”白慧说，眼睛一动不动盯着窗玻璃上闪烁的冰花。那是寒风奇妙的杰作。

“瞧你！还不说。是不是郝永革冷淡你了？你犯不上跟他生气。他这些日子心情不大好，脾气还见长了呢！这也不怪他。斗争太激烈，咱的人愈来愈少，马英那边愈来愈多，谁也沉不住气。郝永革说……我都告诉你吧！他昨天已经派人了解到你并没去参加红革军。他猜想你是因为你爸爸的事，怕人家揪你的辫子，对不对？”

“我爸爸有什么事。现在我爸爸工厂里有一大半人支持他。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谁揪他我跟谁拚！揪我的辫子？哼，敢？！”她扭头对杜莹莹气冲冲地说。

“那为了什么？”杜莹莹见她火了，怕再刺激她而小声地问。

“不知道。”白慧仍面对冰窗。从那里透进来的银色的阳光，把她的脸映得雪白，象白雪。

“哎呀，白慧，你怎么有话还瞒着我？”

“我真不知道……”

她好象确实有种说不清楚、不明确的原因。杜莹莹感到困惑了。

“莹莹，你说谁是咱们的敌人？”白慧转过脸，严肃地问。

“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弄明白？反革命呗！”

“教师是不是都是反革命？”

“当然不全是了。”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把他们一概横扫了！”

“触一触有什么不好？”杜莹莹轻松地反问道。

“我们是把他们当做敌人搞的，还是当做犯错误的同志搞的？”

“哎呀！白慧，你真是没事找事。管它呢！革命一搞起来，谁还分这些？”

“不对！毛主席说，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好，我再问你，《十六条》上明明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怎么做的？”

“那可不好说。搞阶级斗争哪能客客气气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动嘴不管事，还不动武？”

“不对！”白慧声音响亮地反驳道，“你好好看看那些书，你的说法不对！”

杜莹莹这才发现白慧床旁的小书桌上放着一堆书。她过去翻了翻，有马思选集、列宁和毛主席的书、党史，几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小册子，还有一些文学书籍。她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本来看。这是本很旧的书。不灰不蓝的封面上印着“热爱生命”四个字，已经磨得漫漶不清。书名下边有一行清晰的钢笔字，是白慧的字迹。“请注意，这不是坏书，是列宁爱看的书”。桌上还放着一个日记本，翻开的那页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杜莹莹毫无兴趣地把书放在书堆上，慢声慢气开着玩笑说：

“你简直是个学者呀！要写什么文章吧：我看倒是你自己要成立一个总部，另拿出一种观点来。我猜得差不多吧！”

白慧黯然地：

“不，我没有资格。我是有罪的人……”

“你这是怎么了？阴阳怪气儿的！跟我捉什么迷藏呀！怎么说来说去又是个有罪的人了？你犯神经病了吧！”

白慧不说，杜莹莹偏想知道。后来白慧终于把打人那件事吐露出来。并非杜莹莹追得太紧，却因为此时此刻唯有杜莹莹是可以说话的人；而且这件事对于她说来，又大又沉，心里实在容纳不下，说出来或许好受些。她讲了那次打人的过程。

“我当时只是出于愤恨，不想真打在要害上了！我……”

杜莹莹略感吃惊。但她见白慧身上好象压了一块死重的大石板，快支持不住了，便安慰白慧说：

“打牛鬼蛇神算什么错？郝永革他们审问当权派哪次不狠接一顿。不打，他们哪肯服气，哪肯承认呢？”

“不，我准把那人打死了！”白慧缓缓地摇着脑袋说。她愁苦地闭上眼，白白的脸上好似蒙了一层灰色的阴云。

杜莹莹看着她，脑子里好象突然悟到了什么，圆圆的双眼象一对小灯那样闪出光亮。

她问：

“白慧，你说那挨打的女的是哪个学校的？”

“不知道。我也没打听。那天一共十多个学校在咱校开联合批斗会，谁知是哪个学校的。”

“你怎么事后也不打听打听呢？”

白慧没回答。她的原因只是一种心理：怕打听来的消息太坏就会更受不了。

“你们打完她，她给拖着往哪个方向去了？”

“花园路。怎么？”

杜莹莹抿着嘴神秘地笑了笑，说：

“你等会儿。我先问你，那人长得什么样？”

白慧不假思索就说出来：“短发，花白头发，中等个，胖胖的。大眼睛

挺黑，黑黄脸儿。嘴好象比较大。”她只要一闭眼，这个形象就能出现眼前。画家如果有这样好的形象记忆力，便是求之不得的呢！

“噢，是她听！她哪里死了，还活着哪！”杜莹莹说。

“怎么，你认识她。”

“她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哎呀，我忘了。马英准知道，她初中是在第四中学上的。”

“你怎么知道我打的就是她呢？”

“那天开批判会，我在场呀！虽然没和你们在一起，可一直坐在台下。那人就站在台前。就是你所说的那长相。”

“哎呀，对呀！你怎么知道她没死？”她连呼吸都停住了，期待着杜莹莹的回答。

“人冬后的一天，我还看见她在大街上走，后面跟着两个学生。”

“真的？”白慧的眼睫毛象扇子一样张开，喜悦地震颤着。

“我亲眼看见的嘛！那还有错！”

白慧的双眼顿时亮晶晶地包满了泪水。好象是她的什么亲人死而复活了似的。杜莹莹给她的好友失常的、近似于神经质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她不明白这件事怎么会如此严重，值得这样悲喜。白慧抹了一下眼，问她：

“莹莹，你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吗？你那天在会场上，会上揭发她的问你准听到了。”

“她？”杜莹莹盯着屋顶一块地方，在记忆中寻找回答对方的内容，“她可能当过圣母军……还净讲些外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什么牛奶面包的，毒害学生。”

“真是圣母军？”

“唉，你不知道我记性不好。这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又开了多少次批斗会。哪还都记得。反正她不是好人！说不定你打她一下，教训了她，促使她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呢！”

白慧请杜莹莹好好回忆一下，杜莹莹再说的话就不大牢靠了。显然她为了安慰白慧而东拉西扯一些靠不住的情况。于是白慧请杜莹莹帮她再去打听一下。杜莹莹微笑地看看她。答应下来。随后杜莹莹起身告辞，答应明天打听到情况就来告诉她。杜莹莹走到门口站住了，问白慧：“怎么样？你还坚持退出‘浴血’吗？算了吧！你知道郝永革为了你这么做，急成什么样子？他昨晚到家找我。垂头丧气，眼圈还是红的呢！我还没见他红过眼圈呢！他求我来说服你，还后悔当时他太急躁了。样子也挺可怜的！都是老战友了，何苦闹翻了昵？再说你和马英也不是一个心气儿。”她完全是个和事佬。

“回头再说吧！我得和他谈谈。”白慧的话缓和了，脸上如解冻的大地那样舒朗。

杜莹莹因为完成了郝永革给她的使命，又帮助好友排难解纷，除却烦恼，心里也象扔掉小累赘那样轻松和高兴。她开着玩笑嗔怪地骂了白慧一句：“神经病！”同时拉着门把儿将自己关在门外。

自从白慧与常鸣发生了那场冲突之后，多少天来，她如同失足掉进了思想斗争的漩涡里。

几个月里深深印在她脑袋里的那些事物：激昂的、庄严的、亢奋的、奇异和怪诞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观点、见解、豪言壮语、奇谈怪论，一下子都聚拥而来，锵锵锵锵碰撞一起，迸溅出光怪陆离的火花。弄得她头

昏目眩。这些事物在突如其来的时候，来不及思考，全凭对它的表面印象确认它。现在不同了，事物愈来愈复杂。它分化，演变，不是清一色了。某些事物的表里也不是同一种颜色。需要认真辨一辨了。

她成了雄辩中的双方。争辩的中心就是启己。具体地说，也就是自己做的那件事情。

她设法肯定了自己，又不由自主地驳倒自己、否定自己。她是自己顽强的辩护士，又是无情的抨击者。反复地否定，否定了又否定。以致由于铁面无私地推翻了自己而陷入痛苦的漩涡之底……

漩涡是疾转的。转得透不过气来。时而她不能自己，四肢张开随着某一个想法旋转而沉浮。一股汹涌的热流把她掀上来，又一个寒冷的浪头把她压下去……在深夜，她常常由于这种思想搏斗而彻夜不眠。有时，她光着脚丫下了床，走到妈妈的遗像前站住了；忽然她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因为她受不了妈妈冷静的目光；那目光似乎含着一种深深的谴责。

“妈妈，我对不起您，不配做您的女儿……”

常鸣的话那么有力地反复在她耳边响着：

“你的思想是拿口号连缀成的，你却自信有了这些口号就足够了；而对你所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并不多。……如果你不善于学习和思索，单凭热情和勇气，就会认为那些叫得愈响的口号愈革命……”

于是，她对爸爸说：

“你把书柜的钥匙给我。”

“没有什么可烧的了。都是经典著作。”爸爸说。

“我就是要看这些书！”

她把书抱到自己的房间，贪婪地读着，思考着。在大雾弥漫的海上的航船，会更感到罗盘的珍贵。书上的思想如同一把梳子，梳理着她那些纷乱的、纠缠绞结的思绪。当然，她不可能象大梦初醒那样，一下子明白了整个世界。但是她碰到了一些教给她认识周围事物和自己的、令人信眼而十分明晰的格

她朦胧地感觉到；郝建国曾经给她涂在伤口上的仅仅是一种麻醉剂，现在失效了，伤口剧烈地疼起来。颜色漂亮的油膏剥落下来，伤口暴露在眼前。她宁肯把那些油膏全刮得干干净净，看一看这伤口究竟有多深，有多么可怕和难看……

在这期间，她见过常鸣几次；希望还能听到常鸣的见解，但见了面竟无话可说。两人都尽量躲闪着思想上的东西不谈，仿佛怕再加深分歧。她更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隐痛告诉常鸣。如‘果常鸣知道了那件事会怎样看她呢？其实，她从上次两人的冲突中已经清楚地感到了。为此，她发愁和苦恼，似乎担心因此失去了常鸣……

两人见面，好象关系变得冷淡的两国使者的会见，渐渐没什么内容了。她顶多是向常鸣借本书。常鸣连书也不谈，一般只说一句“别转借别人”而已。

两人都没多大必要见面了。不知为何还要见。

今天事情意外地发生变化。当杜莹莹告诉她有关那个一直误以为死掉了的女教师依然活着的情况之后，她就象从一个幽闭得密不透风、毫无希望的大铁罐子里突然蹦出来一样。一下子从漆黑的漩涡里浮到光明的水面上来；身上的重赘全都卸掉了。她感到自己如同一只倘佯天空中的鸟儿那样自

由。

原来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糟糕，完全可以挽救。一切都可以重新好好开始呢！

她站在屋子中间，双手抱在胸前转着圈儿。由于她从小不会跳舞，转圈的姿态不美，很生硬，却完全可以把心中的喜悦表达出来。

她转着圈儿，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的画像，口中喃喃地说。“毛主席，我要好好学习，一切照您的话做。”她又看见了镜框中妈妈的照片，喃喃地说：“妈妈，您可以原谅我吗？”她还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忽然对着镜子停住了，简直不认识自己了。

晚上，爸爸推门进来。花白的眉毛顿时惊讶地扬起来。他看见，放在过道的饭桌上摆满了丰富的饭菜，都是自己爱吃的；女儿容光焕发地坐在桌旁等着他。多少日子来。

家里清锅冷灶，常常到外边买着吃。女儿不是紧锁眉头，就是咬着下嘴唇，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他几次想和女儿谈谈，但女儿只报之以沉默。今天到底有什么变化？一时显得屋子都亮了。

“小慧，今天是什么日子……噢！”他恍然大悟似的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对女儿歉意地笑了笑说，“我又差点儿忘了。今天是二十八日，你过生日，对吧？”

“您真糊涂，爸爸！我的生日是上月二十八日，早过去了！”

六

痛苦是一种秘密，高兴希望公开。无论谁有了高兴的事，都想叫亲人和知己快快知道。

白慧吃过饭就出来了，急匆匆奔往河口道。她走到新兴路和光荣大街的交口处，突然站住了。常鸣就站在对面。他穿一件深色的棉大衣，戴一顶灰兔皮帽。帽子在夜色里微微发白。他笑吟吟看着白慧，好象一直在这里等候她似的。

“你上哪儿去？”常鸣问。

“我？我……上前边买点东西。你呢？”

“我要到那边找个人。”常鸣指着白慧走过来的方向，“不过，不是非去不可的。”

于是，不知从哪里伸来两只无形的手，扯着他俩的衣襟，轻轻拉进横着的一条小街。

别看这条街很窄，几乎没有便道，象宽胡同，却又直又长，通向很远的地方。

刮了一天的寒风，傍晚时无声无息地停了下来，空气反而有些暖意。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十分清晰。路灯下慢慢行走着的一对影子，一会儿变长了，一直拉成几丈长。一会儿缩小了，渐渐缩小了，缩到脚尖里，然后跑到身后去。当走过一盏灯下，影子重新从脚尖双双钻了出来……白慧看见他们的影子，心跳得象敲小鼓那么响。她不敢看，又忍不住偷看一眼

她本想把自己的秘密全部向他坦露出来。那件事也可以原原本本告诉

他了。还有爸爸的情况，妈妈的历史，以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想法、疑问和这些天来精神上某些宝贵的收获。可是，不知是何原因，她现在一点儿也说不出来了。好象一只瓶子刚刚倒竖过来，又堵上一个塞子。她看了常鸣一眼，常鸣低头不语，脸这在黑影里。忽然她感到一种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悄悄来到身边。她害怕了，有如从冬眠中初醒的小树，在春潮将临时颤瑟了……她反而什么也不想说了，生怕打破这奇妙、不安又温馨的沉默。

他们走呵、走呵，一直沉默着。

一道大堤似的黑影横在面前，白慧才知道他们已经走到火车道旁了。喧闹的市声从耳边消失了。这儿有一片小槐树林，当下树叶尽脱，林间给月光照得雪亮。周围太静了，只有远处一家工厂的汽锤声，一下一下清楚地传来。一片灯光在那边闪烁。这里是月光世界。铁轨象两条银色、夺目的抛物线，伸进漆黑的夜雾里。头顶上充满寒气的淡绿色的天空，澄澈而透明。大圆月亮，散碎的星星都挂在上边……

他们走进小树林，躲着月光。天空的月亮却死跟着他们。

白慧靠着一棵最粗的槐树干背光的一面，抬起眼睛看着常鸣。常鸣的脸浴着月光，朦胧而柔和。幽深的黑眼睛里把一切都表达得非常明确了。白慧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但她努力不使自己低下头，大胆地望着常鸣。常鸣对她说：

“白慧，尽管我们在看法上有分歧，但……但我相信，我能理解你……”

这正是她需要和渴望的话呀！

她突然离开粗糙的、冷冰冰的树干，投进常鸣温暖而有力的怀抱里。脑袋斜倚着常鸣的肩头，脸儿朝外，身子微微颤抖，一滴滴映着月光、永银似的泪珠儿，从眼角落下来。

她听见两颗心猛烈地跳动的声音，但分不出哪个声音是自己的了。常鸣抚弄她的小辫儿，嗫嚅着说：

“你是好人……”

并且还说了一些象孩子感到幸福时说出来的那种傻话。

白慧什么也没说，一直流着泪……

夜深了，他们往回走。走了许久，又回到刚才两人相遇的那个路口。当下四外没有一个人，只有远处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声音。路灯显得分外明亮。他俩该分手了。

“白慧，你能对我说一句话吗？你一句话还没说呢！”

“说什么……”

“我最想听的。”常鸣期待着。

白慧没张嘴，却给了他一个难忘的、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目光，常鸣充满幸福地笑了。

“咱们该回去了，特别是你。你爸爸准不放心了，说不定还以为你参加武斗去了呢！”

“明天见吗？明天正好是我的公休日。”

“明天见！”她忽对常鸣说，“我明天再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一切。”

“好。明天我也要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

白慧把手伸给常鸣。两人握住手。常鸣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拥抱在一

起。

“常鸣，如果我做过错事呢？”

常鸣陶醉在幸福里，他滚烫的嘴唇贴着她光滑而冰凉的前额上。

“只要是你，我一切都可以原谅……”

白慧无限感动地扬起她在爱的冲动中显得美丽动人的白白的脸儿。他要吻她。她使劲一推常鸣，摆脱了，随即蹦蹦跳跳地跑了。她甩动的小手在灯光下闪了一闪，整个身影便在夜的蓝色中隐没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白慧去找常鸣。

今儿，她穿一件轧了坚条子的绿棉袄，虽然很旧，颜色发白了，却洗得干干净净，又很合身，显出她苗条的身形。她脚上套一双黑条线面的肥头棉鞋，鞋面用棕刷刷过，乌黑如新。鞋带扎成一对一般大小的黑色的蝴蝶结。头发梳得光溜溜，辫子编得又紧又利落。不知因为天气好，还是怕弄乱头发，她没戴头巾。白慧向来不为博得旁人的好感而打扮自己。现在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她白晰的脸微微透出一些红晕，眼睛里仿佛藏着许多感受。这时，如果一个看惯了她往常那种缺乏表情的面孔的人，碰到了她，准会大吃一惊的。

她进了常鸣所住的大杂院。上了楼，敲敲门，没人应答。一推门，原来门是开着的，屋里没人，不知常鸣做什么去了。炉火暖烘烘地烧着，地面刚洒了水扫过；空气中有股湿尘和燃烧木柴的气味。屋内收拾得挺整洁。床上罩一条天蓝色的新床单，象无风的水面那么平整和柔和。床上的小圆桌上放了几本书，还有一盆玉树，就是先前扔在屋门外边的那盆，积上已被冲洗掉，那肥厚、光滑、饱含汁水的叶子，给窗外射进的阳光照得湛绿湛绿，仿佛是翡翠微的；叶面上喷挂的水珠，象亮晶晶的露珠。

她第一次发现这间低矮的非正式的房间竟如此可爱与舒适，连竖在屋子中间几棵方柱子也显得挺别致。老槐树的枝丫在窗洞口交织成一幅美丽又生动的图案……

门儿吱呀一声，她扭过头。眼睫毛扬起来，心也跟着提了起来。没见人进来。哟，原来是只小猫。小猫从下边的门角探进来一个白色的、毛茸茸而可爱的小脸。用它蓝玻璃球似的一双眼睛陌生又好奇地打量着白慧。白慧知道常鸣没养猫，多半是邻居家的。

她朝小猫友善地打招呼。小猫走进来，通身雪白，后面翘起一条长长的非常好看的大尾巴。尾巴一卷一舒。

“你来找谁呀？”她小声、象逗弄孩子那样亲昵地对小猫说：“常鸣同志没在家。”

你怎么自己跑进来啦……”她说，忽想到她也是自己跑进来的，感到挺不好意思，幸好对方是只猫。

小猫走到跟前，傻头傻脑地看着她，朝她柔声柔气地叫，随之用下巴蹭着她柔软的鞋面，表示友好。她弯下腰抱起小猫，轻轻抚摩小猫的光滑而蓬松的毛。白慧向来是不大喜欢动物的。前半年，她和郝建国去搜查一个被揪斗的教师的家，这教师爱养金鱼。

他们曾把这种嗜好当做剥削者的闲情逸致，甚至当做逃避革命和厌恶革命的行为。对那教师狠批一顿，并亲手将一缸金鱼都倒进地沟里了。

小猫卧在她怀里，撒娇似地扭着身子，和她亲热地打着呼噜，又朝着小圆桌那边咪咪地叫。

“你是要吃的？噢，不是。你想看书，是吧？好，咱一齐看。”

她抱着小猫走到桌前拿起一本硬皮书。这是鲁迅的一本集子。她翻着，忽然不知从哪页里跑出一块硬纸片飘忽忽、打着旋儿掉落在地。她弯腰拾起来。原来是张四寸大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女人。穿制眼，略胖的一张脸儿，黑黑一双眼睛温和又慈祥。

深陷的嘴角里含着舒心的笑意。白慧觉得这女人特别面熟，尤其是这双黑眼睛。突然！

照片上这双眼好象对她睁大了，睁得非常大。跟着额角涌出一股刺目的鲜血，顺面颊急流而下。双眼闭上了，目光在最后一瞬分外明亮，仿佛不甘于消失似的……紧接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白慧耳边连续不断地响起来：

“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这声音象一只大锤，一下一下猛击着她；她摇晃着，简直站不住了。光唧一声，怀里的猫和手中的书一齐掉在地上。猫被砸在脊背上的书吓跑了。

白慧手里捏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还是那温和慈祥的样子。时间再一次在她身边停止了，她已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楼梯响了，有人走上来，并传来常鸣的声音：

“你怎么这样惊慌张张？遇见生人了吗？那不是生人，是咱的老相识。她名叫白慧。”

显然，常鸣在和受了惊吓、逃下楼的小猫说话。他刚在楼下的盥洗室漱洗过，手端着脸盆走上来。他身穿一件褐色的粗线毛衣，饱满的胸脯把毛线编织的竖条图案全撑开了，里边的白衬衫领翻出来；才洗过的脸湿漉漉地散发着一股朝气，显得清爽又精神。

他早听见白慧上楼的声音，知道白慧就在屋里。

“可以进来吗？”他站在门口开着玩笑说。

里边没有回答。他把屋里的白慧想象得幸福又腼腆。

“噢，原来有气派的将军都是这样默许他的部下的。”他笑着说，推开门走进来。

白慧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他一看见她，立刻惊愕住了。白慧的脸白得可怕，只有眉毛显得分外黑；表情难以形容，好象各种最难受、最痛苦的心情都混在一起，从这张脸上表现出来。

“怎么？”他放下脸盆，问白慧：“你不舒服了？”

白慧直怔怔地看着常鸣。

“你怎么了，白慧。”

白慧依然直盯着常鸣，目光呆滞。她没有力量站起来了，坐在那里把手中的照片举到常鸣面前，问：

“这是谁？”

常鸣的神色立刻变了。他把照片拿过去看着，痛苦的阴云顿时跑到脸上，眼里涌出泪水。他声音低沉地说：

“这正是昨晚咱们分手时，我说准备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她是我的妈妈！”

白慧挨了致命的一击。她声音颤抖地：

“她是做什么的……”

“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

没错了，就是她！白慧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了：

“她现在在哪儿？”

“死了，活活被那些极左分子折磨死、打死了！”常鸣身子一歪，一屁股重重坐在淡蓝色、铺得平平的床单上。床单的皱折向四边张开。他好象坐碎了一块玻璃。

一刹那，白慧心中的伤口猛烈地撕开了。她的心碎了！她觉得，命运偏偏在这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大陷阱：落进去了！没顶了！然而凭着生命的本能，她在绝望中挣扎，好似溺水的人拚命去抓漂在水面上的破碎的小木板。

“她一定有罪！”

陷入痛苦中的常鸣完全没有去注意白慧和她的话。常鸣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号着：

“她哪里有罪？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生活、青年一代和她自己的事业……她哪里做过半点危害人民的事？有罪的不是她，是折磨死、打死她的那些人，那些凶手！”

“不，不！”白慧拦住常鸣，生怕他说下去似的，“你了解她只是表面的。你不知道她的历史。她在旧社会难道没做过坏事？没当过圣母军？”

“什么‘圣母军’，你胡说什么。她的过去我全都知道。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受感情的激使，冲动地叫着：“你听，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不能告诉那些打人凶手！他们也不想知道，不想承认。如果他们承认这一切，还有什么理由毒打人？他们必须否定一切……我妈妈和爸爸都是原北师大的学生，是穷学生。毕业后，每人只有一张文凭，两手空空地失业了！爸爸给一个报馆抄写稿子--对，现在他们会说这是抄写反动文章；妈妈给一个有钱人家洗衣服，看孩子--对，他们会说这是给资本家当奴才，为资本家服务。后来，爸爸和妈妈把积攒的不多的钱全花了，才托人谋到一个中学教书的差事做。妈妈教外语，爸爸教中文。爸爸痛恨旧社会。上课时宣传了进步思想，被人告了密，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给当做‘赤化分子’弄到警察局蹲了一年的监狱。在狱里挨打挨饿，受尽折磨，得了胃穿孔，差点死在狱里。出来后不成人样了。工作也丢了。那时我才两岁多，妈妈怎么能养活得了一家三口人。多亏解放了，救了我们一家。爸爸和妈妈一直没离开讲台，因为他俩都热爱教育工作，更因为热爱青年一代。妈妈说过‘总跟青年在一起，心也总是年轻的’。爸爸带病坚持工作。后来两人都先后评为‘一级教师’。

妈妈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照的。五九年爸爸旧病复发，大吐血死了。爸爸临终时，手指着我就是不合眼。妈妈说她一定把我培养成材。爸爸摇头，表示妈妈错会了他的意思。妈妈明白了，哭了，说‘我一定为党、为祖国把象鸣鸣这样一代代的孩子们培养成材’。

爸爸才含笑闹上眼……妈妈她……整天象牛一样工作着。下了课，就和同学们谈思想、谈学习和工作，做个别辅导，常常忘了吃饭，很晚才回家。吃过饭，又带着身上的粉笔末子趴在书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到深夜……当然，现在他们会说这是‘不遗余力地毒害青年’，那就由他们说去吧！反正历史不是靠他们做结论的。妈妈是个多么忠诚、勤恳、善良的人呵！年复一年，她把多少批学生送上了大学，或者送到工农业战线上去。

年年春节、我家都聚满了妈妈历年教出来的学生们，有的看上去和妈妈年龄差不多了。

他们在哪儿工作的都有。有的已经很有成绩了。但他们依然还是那样

尊敬和热爱妈妈……你看，你看吧——”他跳起来，拉开柜子的抽屉拿出一包报纸裹的挺大的包儿，两只激动得颤抖的手从中撕开纸包。把一、二百张照片撒在圆桌上。照片上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三三五五在一起照的。还有和常鸣的妈妈一同合影的。常鸣大把大把抓着这些照片，“看吧，这些就是所谓的妈妈毒害的人！难道这就是她的反革命罪证？凭这个来要她的命吗？妈妈的身体原来并不坏呀，她还能革命做多少年工作呀！但被那些凶手关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活活折磨死了，冤屈死了！一次次的毒打、酷刑、人格侮辱。

他们揶揄人的尊严还不够，还要象法西斯一样，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那些自称为革命派、喊得最响最凶最漂亮的家伙们，他们的所做所为正是摧残革命的本身！我就是因为妈妈，给他们赶出家，到这里来的！不，不，不，白慧，你不要捂着耳朵，你不要怕听这些悲惨和残忍的事情。你应当了解我的妈妈……她临死的时候，两条腿全被打坏了，站不起来。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她肯定不满运动，仇恨运动！”白慧双手捂着耳朵大叫。

“不！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强大！她所恨的是那些背离党的政策而胡作非为的人，恨那些破坏运动的人！恨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妈妈临终时对我说……‘呜呜，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相信是非早晚会分明，到那一天，别忘了到我灵前告诉我一声……’一个人临终的话，往往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

白慧，你不要摆手，你听我说下去……”

“不，你不要说了。这不是真的！”白慧紧闭着眼，激烈地摇着双手。

“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你听我说呀！”

“不！”白慧突然睁开眼睛，眼球通红，带着泪水，强硬而发狠似地说：“她不是这样一个人！”

常鸣呆了。他从迷乱的痛苦中惊醒过来，奇怪又困惑地望着白慧。白慧忽然站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下楼去。她的模样完全象个疯子。常鸣大叫：

“白慧，白慧！你这是怎么回事？”

常鸣一夜没睡。天亮时疲乏极了，昏昏沉沉刚合上眼，忽听门那边嚓嚓地响。他睁开眼，问：

“谁？”

没有回答。只见从门缝底下一点点地塞进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谁？”

他下了床。这时他听到一个人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开了门，从地上抬起那东西，原来是一张信纸，折成一个交叉成十字花儿的菱形小纸块。他急忙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楼下看去，只见一个围着头巾、穿浅绿色棉外衣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门去。那正是白慧。他想喊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开信笺看，顿时呆住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下面是信的原文。

常鸣：

你恨我吧！我打过你的妈妈，而且是狠狠地打的，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仇人！

我昨天本想告诉你的正是这件事。谁知事情这么巧。这么残酷。她恰恰是你的妈妈。

但我觉得这种巧合很好：它是对我最公道、最有力的惩罚。比我自己恨自己、自己打自己解气得多！

虽然不见得是我把你妈妈打死的（这决不是为自己辩解。也决不想求得你的宽恕！）尽管你说过你能原谅我的一切（我知道，这里边决不包括这件事）。但我想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因此我想见你一面。今晚八点钟，我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等你。

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再见到我，我却请求你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

我等你。

你的仇人和罪人

白慧

常鸣捏着这张信纸，地面好象在脚底下液化了。周围一切可视的都虚幻了，化做无声的烟……

当晚，阴了天。下了大雪，又起了大风。

大湾渡口平日人就不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又是夜晚，几乎渺无人迹。渡船不知停在岸哪边了。漆黑而空阔的河口上，大风雪好象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披发魔鬼，在远近发出一片凄厉的怪调的 ao 叫。开始时，不知哪儿还传来呼喊渡船的声音，跟着就消失了。

透过一阵阵飞卷而过、白茫茫的雪雾，隐约可见渡口处堤坡上的灯光大钟前，孤零零立着一个人影。钟上那根短粗的时针指着八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白慧。

雪花给风吹得有了力量，沙沙打在她的衣服上。大钟圆形的玻璃面上有大字报贴上又撕下来的痕迹。红色的秒针飞快地转动，时针渐渐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她还是孤零零地站着。风雪愈来愈大，她却象一段锯断了的树干，一动不动地立着。浑身挂满雪，快变成白色的了。积雪已经盖住脚面，但她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着绝望而依然坚定的期待的光。

—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

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

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傻瓜……”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杜莹莹觉得不大好意思，站起身说。

“您歇歇吧，我没事。”

郝建国是背对杜莹莹站着的。他用背在屁股后面的手摇了摇，示意给杜莹莹，叫杜莹莹别再跟这人客气；同时对这位老张平淡地说：

“好，你回去吧，回去好好歇一歇。”

老张非常知趣，转身已到门口，又回过头伸长脖子如杜莹莹使劲点点头，表示再见，随即被郝建国送出大门。

郝建国回来，向崭新的椅子高兴地膘了两眼，转而对杜莹莹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噢，说到‘傻瓜’了。究竟何谓‘傻瓜’，何谓‘聪明人’呢？”他好象来了灵感似的，目光一闪，“我先问问你，你说，刚才送椅子这个人--他是原来咱学校财务组的会计老张。你还记得他吗？好，gA 就让他吧：你说他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费了很大劲给我买来椅子，还向我献

殷勤，你准认为他是傻瓜吧！不，也许你还不知道老张的情况。他贪污过一千元。定为坏分子，已经调到后勤组监改去了。我呢？校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他拍我的马屁还算傻吗？当然，这只是想讨些好，早点给他摘去帽子。小聪明，算不得什么。但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聪明还是傻瓜，先要看看他所处的地位，再看他怎么去做。聪明人善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能够发现和抓住他周围的有利因素、有利时机，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傻瓜则恰恰相反。尤其在处于逆境和劣势时，傻瓜总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聪明人却要调动起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脑细胞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中。现在，该轮到评价白慧了。她表面挺聪明，在运动初期积极能干，可是她老子一出问题，她就象蜗牛一样缩回去了，不敢干了。其实那时也有人给我爸爸贴大字报，攻得也挺凶。当然他的职位比不上白慧的爸爸，也比不上你爸爸，仅仅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根本没对别人讲过。自己顶着干，比谁干得都猛。怎么样？杀出来了！现在我的职位反比我爸爸的高。我可不是夸耀自己。有些道理，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运动开始时，我还有些简单、幼稚、狂热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挺可笑。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动私人感情；所谓的‘正义感’也轻易不能用。你单纯，就容易被利用。你只有好心，那你准倒霉。没有权，你的好心又顶个屁用？权又是怎么来的？人家白送给你吗？不……哎，这些话你可别跑出去乱说。我从来还没对别人讲过，仅对你。当然不单因为你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明白……”他用目光表达着另一种语言。

杜莹莹低下头，圆胖的脸蛋涨得鲜红。郝建国正在追求她。近半年，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和明朗化了。郝建国又敏锐地、不大放心地瞅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地说：

“你可别出卖我呀！出卖我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马英怎么样？闹了一通也没留校。

滚蛋了，和白慧一块儿耍锄头去了！”

“去你的！谁出卖你？我不懂你那些什么聪明呀，傻瓜呀。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傻瓜，听其自然，束手无策；我没你那么大能耐，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了！我只想快点把病养好，早点工作。至于白慧，你说的还是不对。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当时退出‘浴血’并不是因为她爸爸；她去支边，一是她愿意去，二是她非去不可的！”

杜莹莹给郝建国刚才那几句话气急了，一不留神把一件秘密暴露出来。这件秘密正是郝建国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到底白慧当初为什么退出“浴血”？到底她为什么那么坚决地要去支边，而且还要求“愈远愈好”？现在，郝建国好象忽然从杜莹莹身上发现了一根拴着这秘密的绳头。他要牢牢抓住绳头，把那件百思不解的秘密拉出来。

“莹莹，这些话你以前从没对我说过。我反正把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了。要是有一点隐瞒，你查出来，可以把我弄死！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毫无保留，原来并不是这样。”郝建国看了看杜莹莹迟疑的神色，改换一种不满的口气说，“告不告由你吧，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现在想加入‘浴血’也没地方加入去了。‘浴血’对于我，也早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你以后要是有话不想告诉我，就一点儿也别露；别露半句、留半句的。我就怕人这样，好象不信任我，我自尊心受不了！”

“你真能逼人。她不过因为打了人！”杜莹莹说。

“打人？打谁？”

“她说是一个女教师。在校门口打的，还是运动初期的事呢。那个女教师姓徐……”

郝建国恍然大悟。他想起五六年前的那件事。他的记忆力极好。

“噢！我还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其实这件事发生时我也在场。当时我就察觉到她害怕了，畏缩不前。事后她向我承认了。我还给她打了气儿哪，哪知道她还当做一回事。”

那时，哪个牛鬼蛇神没换过接！白慧不过打了一棒子，见点血，就疑神疑鬼的。我看她的神经不大健全。怕事的人更怕死，她要上战场打仗准是个逃兵。”随后，他又好笑地说，“你还说我刚才判断得不对呢。我说她不是傻瓜就是懦夫，现在看来两样全说对了！”他声音嘹亮地笑了起来。

“不，她说她打死了那个女教师，叫我去替她打听。我一打听，那女教师还确实死了！”

“哦？！”郝建国脸上的笑顿时没了。

“但不是白慧当场打死的。是后来叫第四中学的几个人折腾死的。”

“哦！”郝建国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他问：“那有白慧什么事呢？又不会有人找到她头上来。”

“是呀，我告诉了她，可是她还说自己有罪。后来我才知道……”杜莹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口，好象遇到什么障碍来个急刹车。

郝建国飞了她一眼，沉吟一下说：“你现在说的这些事，过去可都没对我说过。”这话中有责怨杜莹莹对自己不够忠实的意思。他先用这句话刺激一下杜莹莹，然后追问道：“后来你知道什么？”他的口气似乎非要知道不可。

“她，她因为和一个青年要好……”

“噢？谁？”

“就是那年十月二日咱们在公园庆祝国庆，我们在船上打闹，白慧掉进湖里，那个把白慧救上来的人。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记得听！你还借给那人一件军上衣穿。对吧！又怎么回事？”

“那人恰恰是白慧打过的那个女教师的儿子。”

郝建国呆住了。一瞬间，这意外的情况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妒嫉、恼恨、幸灾乐祸的心理，杜莹莹是根本不会知道的。他从鼻孔里冷冷哼出两声，撒着嘴挖苦地说：

“好妙，好妙！谁说生活中没有小说。这也称得上‘今古奇观’呢！那小子知道白慧打了他妈妈吗？”

“她向他承认了……”

“真混蛋！后来怎么样？你能不能痛快点儿，别这么吞吞吐吐的，要不就别告我！”

“后来两人决裂了！那青年不能原谅她。她去支边，也是为了不在这里再碰上那人。”

“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在屋中间来回踱着步，皮鞋吱扭吱扭地响着，明亮的黑眼珠在眼眶里来回游动。突然他站住了。目光闪闪地死盯着杜莹莹问：“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不大清楚。我想不会有吧！”

“那小子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杜莹莹见他的模样有些狠巴巴的，心里挺怕。

“你问这个做什么？”

“有用：这事关系到我。白慧打那女教师时，我也打了。打得比她厉害！”

“你不是说，这不算什么事吗？”

“你真糊涂！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形势吗？现在不算事，将来不见得不算事。造反派现在是大爷，没人敢碰，因为上边支持。明天将怎么样，你敢担保？你笑什么？你以为我胆小吗？我的胆才大哪。胆大不是胡来，细心不算胆小。你没看到目前有人想翻运动初期的案，在搞落实政策。那死鬼说不定也会落实。虽然她不是我们打死的，但死鬼的儿子要是恨白慧，万一说出白慧打过他母亲，事情再一追究，难免我也要受牵累。这事和学校里的事不一样。学校的事我说了算，外边的事就由不得我了。到那时，我的仇人也会借故搞我。我必须设法防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杜莹莹心里役了主意，郝建国恼火了：

“你这人真怪！告诉我怕什么，又牵扯不上白慧。要牵上她就得牵上我。在这件事上，我俩利害相关。莹莹，我明白告诉你，将来如果我要在这件事上倒霉，我本人倒没什么。就怕你受不了。我可预先都向你交代清楚了！”

杜莹莹担心地看着郝建国，说：

“我记得那人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名字，名字，记不得了……”

郝建国听了，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这就行了，有线索就好办。谢谢你呀，莹莹！”同时，他给杜莹莹一个温存的眼色，使杜莹莹害羞地埋下头来。

郝建国很快就打听到这青年叫常鸣，是红旗拖拉机厂的工人。他立即带专案组里的一个心腹，以专案调查的名义去找常鸣。

红旗拖拉机厂很大，当前正搞学大庆运动，厂内外大墙上贴满红色标语。一进大门，道旁竖着两排很大的玻璃展窗。窗内挂满先进人物的大照片，作为表彰。每张照片下都写着他们平凡而感人的事迹。

郝建国往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从这些照片上扫视而过。他眼里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的光荣，而是过错，因为后者对自己有用。但这时他的目光却在一张照片上停住了。

照片上是一张青年人喜气洋洋的脸。照片下端用红毛笔端端正正写了两个字：常鸣。他扭头对随来的人冷冷地说：“就是他！”同时，狠狠地咬了一下嘴角。

到了党委接待室，接待他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厂领导。人矮，不胖，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满头稀疏松软的头发，有一两绺总滑落到额前来。他很热情。当他看过调查介绍信，得知郝建国他们来找常鸣了解情况。便主动而情不自禁地啧啧夸赞这个青年的工作和品行；一边不住地把滑到额前的头发推到脑顶上去。郝建国厌烦地截住他的话，问道：

“他的政治表现怎么样？”

“很好。他是我们厂一连三年的厂级先进工作者。学习刻苦，能结合实际，很有成效。”

“我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是积极的，在运动中表现很好。”

“对他母亲死的问题呢？能不能正确对待？有没有抵触情绪？”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看着郝建国冷冰冰的目光，皱起眉头。他对对方问

话的内容和审问式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他把这在额前的一组头发推上去，回答得冷淡又简捷：

“他的母亲正要被平反。”

郝建国听了这消息一怔，暗中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机。他不想和这位总去弄头发、不大对味道的厂领导多费唇舌，便说：

“我见见常鸣本人吧！”

花白头发的厂领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走出去。不多时，一个高高的、结实的青年走进来，说：

“我就是常鸣。”

郝建国一眼盯住他，上上下下打量他，目光显得挺忙碌，好象要从对方身上寻找出来什么似的。他丝毫没有因为眼前这个青年曾是他凶狠棒打过的已经死去的女教师的骨肉，而有任何感触和不安，反倒非常仇视他。

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桩隐秘--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白慧，就是白慧自己也不知道。

在恋爱没发生之前，往往是单方面的钟情、痴情、或自我安慰。那时他还小，不会表白，只想接近她并引以为快慰。从校团委总支、红卫兵连部到“浴血”兵团，他一直和她在一起。他所感到的幸福唯有自己懂得。可是自从白慧突然退出“浴血”兵团到坚决奔赴“愈远愈好”的边疆，她好象一只给风卷去的风筝，愈飞愈远，拉也拉不住。他曾几次找到白慧，先是请她回到“浴血”兵团，后是请她留在城市，却遭到白慧的拒绝。他曾猜想过这里边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缘故，但无从得知。白慧和杜莹莹不一样，她不想叫你知真的，你休想知道。这也是他喜欢白慧的原因之一。

在白慧走后一段时间里，他曾给白慧写过一些很热情的信，但他一共只收到两封口信，平平淡淡地回绝了他；此后连张明信片也没再寄给他。自尊心和感情受到挫伤；爱就渐渐变成恨；这便是杜莹莹说他总是骂白慧的根由。虽然现在他不那样对待爱情了，对这种东西有了新的概念和理解，但他对这个少年时代所爱慕的人却有一定程度的例外。

直到今天他才明白，他不能求好于白慧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这个陌生的青年……

今天他来找常鸣有两个目的：一是他与杜莹莹谈过的，要设法使常鸣出证证明他不知道白慧打过他母亲，免除后患；二是要在常鸣与白慧已然破裂的关系中，再切下一刀、彻底搞散了。

他用自己事先想好的办法，先兜着圈儿问常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琐事。常鸣感到困惑，不明白这些话题对他们有何用处，尤其是郝建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同他谈他的私事。这做法把常鸣搞糊涂了，哪知郝建国在故布迷阵，麻痹他。就在这时，郝建国骤然扭转了话题，非常迅速地问道：“你认得白慧吗？”然后，一双距离很窄的黑眼睛死盯着常鸣。同时，与郝建国同来的那个人打开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常鸣的回答。

常鸣遭到意外的袭击，如同挨了一枪，全身震栗般地一颤。一瞬间，他眼中流露出的全部心理，都给郝建国敏锐的目光捕捉去了。

“我认得。”常鸣说，极力恢复平静。

“你怎么和她认得的？”郝建国要乘对方混乱之际多弄出一些实情，所以追问得很紧。

“我救过她。那次在公园，她掉进湖里……”

“不用说了，我们全知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偶然相识。”

“后来发展成什么关系？”

“熟识。”说到这里，常鸣已经平静下来，思路也清楚了。

“她找过你几次？”郝建国问。旁边一个飞快地记录着，钢笔尖在纸上嚓嚓响。

“十来次。”

“你找过她几次？”

“我没去过她家。”

“真的吗？”

“真的！我不认识她家。”

“你们什么时候中断的联系。”

“认识后的两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常鸣想了一下，说，“因为她不来找我，就中断了。”

其实，郝建国已经知道事情的底细，不是他不想揭露，而是不能揭露。他所需要的回答恰恰不该是事情的真相。他脸上没有一点反应，问话转到另一个内容上：

“你们都谈些什么？”

“很少谈话。我们的关系一直到中断的时候还是陌生的。她来找我，只是出于感激而来看望看望，因为我救了她。”

“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不详细。”

“你听说她打过人吗？”

常鸣听到这个问题，他的表情变得很难正确描述出来。大概因为他这一瞬间反映出的心理活动太复杂，他低下头沉默了，没有及时回答。郝建国怕常鸣由于憎恨白慧而说出事实，便改变了问话方式：

“她说她没打过人。”

常鸣抬起头来。他的脸色灰白而难看，终于这样回答：

“这个.....我不知道。”

郝建国露出笑容，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回答。由此他也猜到了直到现在白慧在常鸣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他要借此，把得到的回答落实得再具体一些。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被.....被打死的！”

“被谁打死的？”

“第四中学的几个人。这件事军管会和第四中学的革委会都知道，正在调查。”

“她没在别处挨过打吗？”

“我不知道。”

“白慧没打过吗？”郝建国又一次突如其来地问道。

“没，没有”

郝建国立即站起来，从同来的那人手中要过记录，逐字逐句看过一遍后交给常鸣，口气变得缓和又客气：

“你看一遍，如果属实，就请你签名并按个手印。”

常鸣看过后放在桌上，垂下头没有说话，仿佛他心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郝建国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圆形的红印盒，打开盖儿，咔嚓一声放在常鸣面前的桌上。常鸣迟疑地伸出手指，指尖微微发抖，在印盒里一个劲儿地按着，好象下不了决心把手指抬起来似的，直把整个指尖都沾满了粘糊糊的红印油。

“怎么？你的话不属实吗？你如果听说白慧有什么问题就揭发吧！”

常鸣忽然冲动地、神经质地把血红的手指猛抬起来，在记录纸上狠狠按下，又好象咬住了似的，手指按在上边停了半天才拿开，纸上便留下他清晰的指印。他做了一个违背事实的、对不起死去的妈妈却有利于白慧的证明。他扬起头来。郝建国看到他前额全是汗水，神情痛苦，泪水在眼眶里晃动。郝建国完全明白他是什么心情，只装没看见。

“请问你们，她在哪里？”常鸣沉了一会儿，问道。

“谁？”

“……白慧。”

郝建国膘了他一眼，问：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否则就不会问你们了。”

郝建国停顿片刻，眼珠移到眼角上，跟着又移回来，反问常鸣。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有目的。”

“那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屋里静了一下。常鸣又问：

“再请问你们，要我证明这个做什么？”

“对不起，这是专案工作，性质是保密的，也不能告诉你。我们只是为了澄清事实。

我们相信你的话，相信经你盖手印作证的全是事实。刚才你的领导赞扬你对党很忠诚，在我们短短的接触中已经深有所感，你是不会对党说瞎话的。希望你始终如一。至于白慧——”郝建国换了一种关心的口吻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和她接触了。”

“她……怎么了？”

“我们不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是爱护你，为了你好。”

说到这儿，郝建国从常鸣脸上表情的变化看出自己的目的和期望的效果都已经达到了，便站起身，表示常鸣可以走了。常鸣走后，他便找来那个花白头发的厂领导，办好取证的手续。在回去的路上，郝建国嘱咐同来的人不要把今天的事对任何人讲，然后跑回家，趴在桌上，给白慧写了长长的一封信。

二

在张家口正北数百里的地方，是一片干燥、平荡荡、浩茫无涯的高原。

高原上没有突兀的大山和幽深的峡谷，最多是些碟子样的浅浅的盆地。到处铺着黄橙橙的细沙，长满丰茂的绿草；大片大片乳白色的羊群在上面蠕动。晨曦中，草原是蓝色的，远看就象反映着蓝天的巨大的湖泊；羊群便是飘曳的云影。还有一群群馒头状毡房和积木似的新房舍点缀其间，充满高原草原所特有的空阔、清新和恬美的诗意。

锡林郭勒盟包括的十来个旗县就散布在这儿。盟的繁华中心叫做锡林浩特，是个有新兴气象的小城市，却也有着悠长的历史。市区正北有座三四百米高的小山，形状如毡房。因此得名叫做敖包山。它在平得象绿色的大纸板似的草原上乳头般地凸出来，非常惹目。早在远古，人们从无边际的草原上到这儿来，就以它为标志。山上有座古庙，庙院内保留着一株盘根错节、生长于唐代的古槐。凡是在草凉上生活了三四十年以上的人，没有没见过它的。

五月在这里，很象内地的阳春天气。阳光把空气晒得暖融融。到处那么透亮、干净，好象都用清水洗过、罩了一层玻璃似的；草原早就绿了。百灵鸟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鸣啭，根本看不见它们；只有一阵阵银铃般动听的鸣唱洒下来。敖包山开满了杏花与桃花。这些花香混同高原上青草的气息，给风吹得到处飘散。虽然气味变得淡薄了，但此地人对这种气味非常敏感，一当闻到它，便油然生发一种对珍贵的往事深沉的眷恋……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来登山，站在山顶放目远眺，伸向天边的草原的绿色，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得一样远。离人遥远的事情总是属于将来的，或者是过去的。连外地来的客人仁立山顶欣赏这种景色时，也会引起联想，唤起记忆或幻想中的形象而流连忘返……

常鸣在山顶上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他在暮色中走下来，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的感觉。

短外衣的袖筒里带着些草原醉人的气息。

他回到市区大街的一家招待所里，进了自己的房间。多日里对面的床一直是空的，现在却放了一个褐色的大手提包，肯定新来了一位客人。再一看，桌上摆了许多点心水果，还有一张便条裹着一张长途汽车票。他看过便条才知道本地拖拉机修配厂的同志们已经替他把明天返回去的汽车票买好，约他明天在车站上见；桌上的点心和水果是留给他吃的。

前几个月，这里的拖拉机修配厂去到常鸣的工厂请一名技术员，工作期限半年，帮助解决些技术问题。常鸣虽然不是专职的技术员，但他很刻苦钻研，对于解决非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能胜任。领导很信任他，就派他来了。他在这儿工作不到三个月，一切进行得挺顺利，问题都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他打算明天离开这里返回去。敖包山是草原上的名胜古迹，他来后工作很紧张，一直未能去玩玩。所以今天下午抽暇去一趟，又怕修配厂的同志们知道了要陪他去而耽误工作，便没有声张，自己悄悄去了。

他吃了一点东西。只听屋门“哐”地一响，走进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斜背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两步就走到常鸣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闯进来的。这人的脸通红通红，显然喝了酒。他的鼻子、眼睛、嘴、耳朵都是大号的，伸过来的一只大手紧握常鸣的手。

这手又热又肥厚又柔软，象个胶皮的热水袋。

“我叫马长春，就是长春市的‘长春’那两个字，你就叫我老马好了。我是独唱演员，在沈阳工作。”

他的嗓音明亮、圆润、柔和，底气很足，显然在发音和用气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

常鸣想起他曾经是位颇有些名气的歌唱家，不过近几年似乎销声匿迹了，听不到他的歌声了。常鸣摇了摇他握着的手，热情地说：

“我叫常鸣。听过您的歌，您唱得很好。”

马长春先是兴奋地睁大眼，接着摆摆脑袋，叹口气说：

“那是当年‘过五关’时候的事了，现在‘走麦城’了。不提那段儿啦！”他说着，把挎包摘下来扔在床上，又摘下帽子扔在一边，满头浓密的黑发立即象钢丝那样翘了起来，有几撮竖得直直的，那神气仿佛在说“你压不倒我！”他拿出烟递给常鸣一支，常鸣推回去，表示不会抽烟。

马长春极爱说话，说起来滔滔不绝。而且爱议论不平的事和谈论自己。不知是过量的酒精造成的，还是一种天性。

“我以前唱的都是抒情歌曲；现在呢？只要激情，不要抒情。歌儿不应该唱，而应当喊，拚命地喊，直嗓门，音量愈大愈好。最好是如雷贯耳，震聋观众的耳朵！因此，我来这儿，想调到这儿来工作。在草原上唱歌，你有多大音量也不够用的。哈哈，我这是笑话。我是给一群非常革命派挤得没饭吃了！哎，老弟，你说说看，凭我这几句话能定上什么？”

常鸣笑了笑。他习惯于用笑来回答生客。他并非没有主见，而是怕找麻烦。因为生活中专门有一批人靠找碴整人活着。他们善于在干净的地方发现污点。再把污点放大数百倍，乌黑一片地涂在你的脸上……

老马又来问他了：

“哎，老弟，你是极左分子吗？是靠小汇报过日子，还是靠勤劳、实干和能力生活的人？你是不是也想拿个小本子把我的话都记下来？”

“我希望咱们谈点别的。”常鸣微笑着说。

“噢！”老马张大嘴朗朗地笑了，指着常鸣说，“老弟，我头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是个正派人！你准打心眼儿里就憎恶林彪那种人，你决不会为了往上爬而陷害好人。对不对？嘿！我的眼睛可厉害呢……当然，有时我也会把人看错，那就是每天围着我转的几个非常的革命派。他们过去和我要好，我信以为真，不分彼此。后来整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们几个。他们搞我的主要罪状是十年前我在电台演唱过一些外国民歌。按照他们给我定罪的逻辑：产生那些民歌的国家。只要现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他们就说我宣传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而我也唱过不少的革命歌曲呢，嘿，他们提也不提。或者说我是为了宣传封资修故意设置的障人耳目的红色挡箭牌。然后，他们又在我身上找一些缺点，无限上纲，或者胡乱给你歪曲。比如有一次歌舞团举行庆祝新年的基会。我平时很少喝酒--你知道，歌唱演员是不适宜喝酒的。那天大家逼我喝，我喝了两盅就醉得不成样子了，这就成了我运动中的一条罪状。他们说我对现实不满，借酒滋愁。再比如，有一次我下乡演出，街上有个女人卖咸花生，我买了几角钱的吃，他们就说我支持资本主义……诸如此类，全都拉在一起。你想想，老弟，我又宣传封资修，又支持资本主义，又对社会主义不满，我成什么人了？于是他们搞我，所用的办法你根本想不到。他们知道我有说梦话的习惯，每晚在我床边安排一个人，守着我，就象守灵似的，手里还拿个小本本，专门记我的梦话。他们说，一个人的梦话最能反映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据他们说，一次我在梦里叫了一声‘火’，转天就足足审了我四个小时，问我要烧什么？他们就这么搞我！

如果有可能，他们会在我的肛门上也安装一个窃听器，连放屁的声音也要分析分析呢！老弟，你不要笑，他们办的愚蠢的事多着哪！这是革命派吗？我只能称他们做‘非常革命派’。就这样，他们‘非常革命’地挤进领导班子。

现在呢，落实政策了，当权派恢复了职务；我也被落实了。你想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怎么肯把一个关在笼里的鸟儿放了昵？他们整天什么也不干，摆弄人、折磨人已经成了一种嗜好。这也是他们用来表现自己‘非常革命’最便当、最省力气的方式。但落实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能公开对抗，就暗地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复辟行动’。我猜他们的小本子上又记得满满的了。因为他们不断抛给我的眼神等于告诉我了。谁知道，现在有些人拚命叫喊‘复辟’、‘回潮’，安什么心？自然报上也这么说，咱就不好议论了。我受不了这种精神负担，只要一激动，晚上准失眠。这纯粹是给他们记录梦话时搞的。这样下去，身体非叫他们弄垮了不可，所以我要赶快离开他们。正巧听说这里的歌舞团需要独唱演员，我就跑来联系。我要到这里来好好为牧民们唱一唱，我要让自己的歌声在草原上飘荡。多年来，我唱不了歌，喉咙里好难受呀！”老马的眼睛在灯光里亮晃晃。他好象在克制自己，泪水汪在眼眶里，没有落下来。他对常鸣说，“你那里怎么样，有没有这种‘非常革命派’呢？”

“臭虫跳蚤哪儿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否则它们就活不了。它们是靠吃人血活着的。”常鸣愤懑地说。显然他给马长春的遭遇激发起来。

马长春听了非常激动。痛苦的人受不了的往往是同情。他睁大眼，泪珠双双掉下来。

他叫着：

“说得对，老弟。我猜想你也是个受害者，对不对？不过，你年轻。不会象我这样，给他们害得这样苦！”

常鸣默然了。他和马长春不同，他从不肯把内心的苦楚对人讲，而能够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锤炼成思想。此刻他胸膛里充满有力的情感，神情刚强又凝重。他说：“受害的何止你我。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是青年一代……”他一时要说的话太多，不免停顿下来。

“对！”马长春跳起来，大手一把抓着常鸣的胳膊，连声叫：“好，好，好，说得好！”他冲动得再也说下去了。厚厚的嘴唇抖索不止，惊讶地望着这个不大熟识、貌不惊人的青年人。他觉得这青年人非同一般，感情深沉，朴实又成熟，内心的东西似乎很丰富。还有一个很开阔的精神境界，比自己显得厚重得多。“老弟，你好象比我看得开、看得远些。我……”

常鸣瞅了马长春一眼。他知道，一个大痛苦了，常常会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在这点上，他有过更深的体会，便不禁问：

“搞你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实告诉你吧！最凶的两个都是我的学生！”马长春变得怒气冲冲，嗓门大而明亮。

声音撞在四面墙上，发出嗡嗡的回音。

这里的故事想必又曲折又令人气忿和伤心。马长春抓起桌上的杯子，把半杯水两大口喝下去，又点上烟，狠狠吸了一阵子，扬起头刚刚要讲这段事，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个姑娘，一看模样就知是内地来的知识青年。一个胖胖的，另一个苗条又俊俏，年龄都不过二十四五岁。这两个姑娘一听说脸儿红红的大高个子就是她们要找的大名鼎鼎的马长春时，便笑嘻嘻又非常

热情地请他去楼上作客。经过简短的对话，才知道她们是盟里从各个旗县临时抽调上来的理论学习班的学员，就住在招待所的二楼。她们从招待所服务员那里得知歌唱家马长春今天刚到，就住在这间房子里，立即来邀请。当然是想听听马长春的演唱了。

“您只要为我们唱一支歌就成。我们要求不高，就是太想听您的歌了！”胖姑娘说。

“您要是不唱，来作客我们也同样欢迎！”俊俏的姑娘微笑着说。

她俩的态度真诚又恳切，还含着一种敬意。即令是倔犟的人也不好推辞呢！一个真正给过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的艺术家，自然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现在的马长春来说就非比寻常了。这等于是马长春的价值的一种见证，还等于告诉他，人们还记得他，没忘了他。

“你们别这么客气！”马长春顿时显得很受感动，兴奋极了。他摇着肥厚的大手，说：“你们想听我的歌，只要招呼一声‘老马，来呀，唱吧！’我就来了！”

两个姑娘都欢喜地笑起来。她们殷勤地为老马把房门打开。

老马激动地在原地转了两圈。他好象要拿什么东西又忘了似的。突然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说：“原来在这儿——”跟着蹿到桌前，抓起烟盒，又掏出一支烟递给常鸣。常鸣笑了：

“我说过，我不吸烟。”

“呵，我真是忘性比记性大。哎，老弟！你也来吧！我刚才听服务员说，你明天就走了。差一天咱们此生也许就根本不会认识了，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我应该给你留下一点歌声作为纪念，你听了我的歌会更了解我……”

常鸣也很想听到他的歌，高兴地一同去了。当他们走在走廊上，老马突然站住对常鸣说：

“老弟，我想求你点事。”

“什么事？”

“请你替我买几片安眠药、我今天太激动了，晚上肯定会失眠。药店就在大门口往右边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怕一会儿药店下班了。”

“可以。”常鸣答应他。。

马长春掏出钱，常鸣客气不要，马长春把钱使劲塞进常鸣的衣兜里。

“请你快去快回来吧！歌唱家不应该等听众请，应当主动地去邀请听众！好，我们一会儿见！”

马长春说罢，随那两个姑娘上楼。常鸣往大门口走去，耳听他们上楼的脚步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和马长春宏亮的大嗓门：

“你们向往北京吧！好，我先给你们唱一支《北京赞歌》……”

小药店已下班关门了。常鸣向一个路人打听还有哪个地方售药。这个路人倒挺有办法，他叫常鸣去医院看病，就可以买到药。

“这儿有两所大医院，晚间都有值班的。一所是盟医院，，另一所是旗医院。盟医院比较近。你看见前面那个亮着碘钨灯的地方了吧！打那儿往西拐，只过两个小路口就到了。”

常鸣找到这所医院。这是座平顶的、白色的、漂亮的建筑物，在夜色中依然能显出这些特点。院子很大，一些影影绰绰、辨认不出名目的花儿在重重暗影中散发出浓郁的芬芳。两盏蛋青色筒形的壁灯在楼门口两旁放着柔和的光。几乎没有人，静极了。

他走到楼门口，见壁灯下贴着一张大红纸的感谢信。

他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正要推开门走进去，却忽然全身微微一震，停住了。这张感谢信的题目是“感谢我的救命恩人白惠同志”。他忙看了信的内容。上边说：前不久一个夜晚，牧民布合（写这封公开的感谢信的人）从马上掉下来，被经过的一辆拖拉机把腿轧坏了，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开拖拉机的司机把他送到这儿来抢救，必须赶紧输血。

他是“O”型血，急诊室的“O”型血暂时没了。在医院值班的几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个临时在这儿学习技术的赤脚医生白惠是“O”型血。她立即给布会输了二百CC，但还不够。据说这个“白惠”很瘦弱，身子又虚。在这牧民的生死关头，她坚持又献出了一百CC。布会得救了。布会对这个赤脚医生的感激心情用了一连串“救命恩人”的字眼来表达还嫌不够……

感谢信上对白惠所用的代人称是“她”，而不是“他”，无疑这个白惠是女的。

“白惠？难道是她？会有这样巧？她难道支边到这里来了？”常鸣想着，跟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对，这上面写着的是‘白惠’，而她是‘白慧’。音同字不同，不是她！”他推开门走进急诊值班室。

值班的是个蒙古族的女医生，四十多岁，脸盘短而宽，皮肤黝黑而滋润，会说汉语，态度很和气。她听说常鸣因买不到安眠药而来看病，便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笑，给常鸣开了一张取药单。

“你直接到走廊东头的小窗回去取吧！不用挂号了。”

常鸣谢过她，走到走廊东头。这儿有个小小的玻璃窗口。玻璃是磨砂的，窗口是半圆形的，里面点着灯，窗口很明亮。常鸣把取药单递进去：“多少钱？”

他从窗口往里看，桌前坐着一位工作人员，穿白大褂，戴白布的无檐帽和挺大的纱布口罩，正在低头看报纸，看样子是个女护士。她没抬头，而伸出一只手熟练地接过药单并放在眼前铺开。忽然，她的眼睛仿佛在药单上停住了。长长的眼睫毛惊跳了一下，猛然抬起头来。

常鸣简直不能相信，在这白布帽和大口罩中间一段白白的脸上，一双非常熟悉的、细长的眼睛睁得极大，极其惊讶地直对着他。这正是白慧！太意外了的巧合使双方都惊呆了！

常鸣就象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他猛转过身，药也没取就离开了窗口。他大步走到楼门口时，只听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赶上来。他赶紧推开玻璃大门走出去。刚刚下了两磴台阶，身后边响起二个痛苦的乞求似的哀叫声：

“常鸣，你先停一下……”

常鸣在台阶中间站住了。役口头，却看见白慧的影子清晰地印在他的脚旁。

“你……你好吗？”白慧说。她站在台阶上边，两只手好象不知该放在哪儿而合抱在胸前。

“嗯。”常鸣的冷冷的声音。

“你来做什么？”

“办事。”

“你，你住在哪儿？”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随后便是沉默。这是一种尴尬、紧张和可怕的沉默。白慧见常鸣的右脚又下了一磴台阶，她就象要去抓住断了缆绳、很快就要被风浪带走的小船似的，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两条瘦瘦的胳膊伸向前，声音哀颤：

“常鸣，你真的永远也不能原谅我吗？”

常鸣给这痛彻心肺的呼声打动了，慢慢扭过头来。当转过半张脸的时候，忽然又下狠心似地重新转回头去，坚定地迈大步走了。

他走了，没听见身后发出任何声音，即便有任何声音也不会使他再回转身来。就这样，他回到招待所，没上楼，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回走着。在一个很高的空间里，响着马长春动听的、充满情感的歌声，这支歌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迎接你，美丽的朝霞，

因为你是太阳的翅膀。

你是驱逐黑暗的利剑，

你是诛灭妖魔的钢枪。

你不怕乌云遮掩你的身影，

你不怕黑夜吞没你的容光；

那是短暂的，转瞬即逝，

明天早晨，就是你的希望。

你在赢得光明的天空中，

你在争得胜利的大地上；

你还是五彩缤纷的画笔，

把人间，把生活变成瑰丽的画廊……

这歌声一忽儿变得温和又深沉，好象一条雪白的云带飞远了，一直飞到他白天在敖包山顶极目所望的地方。一忽儿又带着激昂的节奏，象飞泉落人谷底那样在耳边轰响。

在他心中激起无限的、刚毅的力量，唤起对生活饱满的信心与热望。使他一个人在屋里再也呆不住了。他打开门，跑上楼，一头闯进那充盈着歌声和笑声的房间里。

马长春惊奇地望着常鸣脸上的泪光和冲动的表情，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跟着，他大步走到常鸣面前感动地叫道：“老弟，我说你为什么半天没来呢！原来你一直在门外偷听我的歌！我知道，你受感动了！你刚刚听到的这支歌正是我自己作的。老弟你呀，原来是我的知音！”他一双大手紧紧拢着常鸣的肩膀，大颗大颗的泪珠不住涌出来……

当晚，马长春由于过分激动，又没有安眠药，怎么也睡不着了，索性滔滔不绝和常鸣大谈起来。常鸣的脑袋都快炸了，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话。马长春还总问他：

“怎么？老弟，你睡着了吗？”

直到后半夜，马长春实在太疲乏了，说着说着，字儿渐 9 咬不清楚，跟着放出鼾声。

声音在胸膛里如同拉风箱。

常鸣却通宵未曾合眼。

在夜的黑暗中反复而交替地出现两个人的面容，一个是白慧，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会儿是几个月里他和白慧相爱时的种种细节，一会儿是二十年中妈妈种种慈爱的音容。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互相不能替代，一样的牵肠挂肚。然而，当妈妈临终时遍体鳞伤的惨相浮现在眼前时，这两种情感竟化做战场上相对的刀枪，铿铿锵锵，发出嘈杂震耳的轰鸣……一会儿又是白慧的哀求：“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一会儿又是妈妈临终的遗恨：“这些法西斯！”……

“妈妈，我应该不应该原谅她呢？”他心中嘶哑地叫着这个声音。

谁来回答他？

几年前，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人，曾打过自己的妈妈，断然和她一刀两断。他没赴约去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与她会面，从此两人再没见过。然而，情感的丝缕最难切断，时时还牵扯着他的心。他冷静下来，却想不明白这样一个心地纯洁、诚挚认真的姑娘怎么会去打人？难道她给自己的印象是一种假象？不，如果这样，她就不会承认那一切……

随着政治斗争的反复与深化，随着善于思考的常鸣对这斗争的性质和本质看得愈来愈清，他渐渐认识到白慧是被某些阴谋家欺骗和利用的人，他开始从这一点上原谅她了；甚至产生一种帮助她廓清迷雾、悔过前非、摆脱痛苦的恢弘而正义的激情。他想去找她——尽管并不知白慧早已离开城市——可是每每此时，死去的妈妈便好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立刻迈不开步子了。是呵，怎么能去原谅一个打过自己妈妈的人呢？妈妈在九泉之下要恨死自己呀！

他在理智上原谅了她，感情上却做不到。

前年，那两个不明身分的人找他调查白慧，使他对白慧有了新的看法。这两个人怎么知道他与白慧的关系呢？白慧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个瘦瘦的外调人员嘱咐他“不要再和白慧接触了”呢？当时，虽然他由于感情的缘故，出证否认白慧打过自己的妈妈，但事后他对白慧发生怀疑，甚至产生一些很坏的猜想。可是这些猜想却不能与白慧曾给他那些美好的印象重迭一起，统一起来。他留恋着无限温馨的往事，尽管他猜疑这往事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骗局。

这样，今天在医院意外碰到白慧时，他便再次拒绝了她。

现在，想起刚才那一幕，想起白慧那痛彻心肺的哀求声，想起那份赞美她的感谢信，种种猜疑就象投进热水里的冰块，顷刻融化和消失。虽然那个外调人员的话仍象一个噪音干扰着他，却很微弱，给心中重新卷起来的情感的浪涛声吞没了。他又开始同情她、可怜她了！尤其是那痛苦的哀求声深深打动他，总在耳边萦回。到底他该怎么去做呢？

第二天一早，他告别了马长春，走向车站。远远见红旗拖拉机厂的几位领导和同志在等候他，汽车也停在那里。

忽然，他觉得，好象有什么东西要远远地把他拉走，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后边牵住他。

他猛然扭过身，直朝昨晚那座医院走去。他走着，走着，眼前又出现妈妈临终时悲惨的形容。这幻象太逼真了。而且十分固执地挡在他面前。他停住了，直条条地足足站了几分钟。最后他下了决心似地硬转回身，迈着大步重新奔向车站。

他上了车。拖拉机厂来送行的几位同志见他神情恍惚，以为他生了病，请他多留两天，他却执意要走。

车开了。直走出很远的地方，他还扒着车窗朝这边看，仿佛要看到什么人在这边出现。

他哪里知道，昨夜，一个姑娘孤零零在这里站了个通宵，天明时才离去，就象当年那个风雪之夜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等待过他一样。

三

这次意外的相遇象投来的一块大石头，在白慧心中激起轩然大波。给岁月沉淀到心底的沉重的东西，又都重新翻上来，混扰一起，一时难以平静下去了。

几年前，她就是带着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到这儿来的。

她要在这里好好干一番。首先她认为应当这么做，还要以此对自己证明自己是好人；更为了远避那些摆脱不开的矛盾和痛苦……这样，新生活就在她的面前展开了。壮丽的草原，辽阔的天空，弥漫着奶茶香味的小毡房，酷烈的风寒和扬起长鬃飞奔的骏马，以及这在建设中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使白慧耳目一新，宛如一股清凉的水，冲淡了拥塞在心中的那些事。原先她脑袋里好象给绳索紧紧缠着，打了许多死结，箍得很疼。在这儿一下子都松开了。

这儿也有斗争。但较多的时间里只是她一个人坐在牧场隆起的草坡上。羊群在远边吃草，除去柔和的羊叫声和悉悉索索的啃草声，草原那么静。当微风歇憩下来的时候，耳朵会静得发响……纷乱的思绪便沉落下来，静止了，得以细细分辨。即使有斗争，也是冷静的、理性的、从容不迫的。她从家里带来不少书，特别是那些经典著作叫她翻了不知多少遍。趴在有弹性的青草地上，手捧着书，嘴里咬着一朵洁白的矢车菊的花茎。

茎中苦涩的汁水流进口中，她不觉得。没人打，扰她，常常是从晨起到日暮，直把身子下的草都压平了。她懂得了某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发现了某些自己原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恰恰是荒谬的。还发现报纸上某些文章所阐述的思想非常可疑。后来，林彪事件发生了，证实了她的某些怀疑是有理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使她迫切想从书里弄明白。

真理是事物的原则与法则，不是某人某事的详尽的注解，因此它不会一下子就跳到眼前。别有企图的解释巧妙地歪曲它。在人们确认出它的真正面目之前，往往给凶气恶氛扰得忽隐忽现。

白慧在没有认清它的时候，怀疑自己；在看见它的时候，更感到一种痛苦的内疚。

这又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使她的工作做得更好，非常好。每年旗里评选先进人物时，她是不需要讨论就一致通过的当然的一名。后来，旗里由于缺乏医生，就派她到锡林郭勒盟医院学习半年，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这个工作无形中使她得到许多安慰。她到处为人治病，解除痛苦；在接生时，为别人的家庭双手捧来幸福。她看着人家病愈后康复的、感激的笑容，便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温暖的手抚慰着她的心。当一个病危的生命因她设法获得新生时，少有的笑意就出现在她的嘴角上。她仿佛在默默地黷一种罪过。

于是，她整天斜背一个鼓鼓囊囊的十字包，骑着一匹短腿的栗色蒙古马在草原奔来奔去。哪里发生病痛，哪里便是她奔往的目标。无论路途遥远，

还是风沙骤起，都不能使她退缩。她好象去消除自己的苦痛似的。冬天的草原上，雪坑隐藏在雪被下边，很少有人迹，却常常有她那匹蒙古马驰过的蹄痕。一个给她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的斯琴妈妈，送给她一件金黄色的蒙古袍子。她换上这种装束，头上缠着天蓝色的绸巾，脚上穿半高跟的软马靴，显得英俊极了。坐骑上那副漂亮的镀铝马鞍也是人家送给她的。人们用香喷喷、浓褐色的奶茶迎接她，用马头琴抑扬的琴音赞扬她……她从这崇高的工作中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获得了生活的勇气。空荡的心也一点点充实起来。

她在这里所收到的来信大多是爸爸和杜莹莹寄来的，间或还收到郝建国的来信。她通常在马背上读这些底

她从爸爸的来信中看出来，爸爸的落实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前年才落实，已不在原厂工作而调到机械工业局当一名“顾问”，没有实职。爸爸仍象往常一样，很少谈到自己。但他的落实总是令人高兴的事，为白慧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为什么不给爸爸安排实际工作，而叫他仅仅做一名有也可、没有也可的顾问呢？爸爸是怎样想的呢？她曾去信问爸爸，爸爸回信却不说。她又写信请杜莹莹帮她打听一下爸爸的情况究竟如何。杜莹莹没有认真帮她去做，多半忽视了这件事。或者由于杜莹莹非常忙，有些自顾不暇。她每天忙于家务，学习日语，其余时间在谈恋爱。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杜莹莹并没告诉白慧追求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之前，白慧经常收到郝建国的来信。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爱慕之情，要求做朋友。他称赞白慧在那“横扫一切的时代里表现出的勇敢和坚定性。”也埋怨白慧后来“莫名其妙地消沉下去了。”他说他“一直喜欢”白慧，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在其他女孩子身上少见的硬气劲儿”。他很希望“有一个坚强的生活伴侣，一起战斗而不是一起摆弄油盐酱醋。”还希望白慧“回到斗争的漩涡中来，重新体会斗争的快乐与幸福”，并在每封信里都切盼白慧“立即回信”给他。

当时白慧正处于失恋的痛苦中，好象一个叫火烫伤的人，伤这未愈，看见一棵毫无危险的燃烧的火柴杆，也赶忙躲开。再说她从没喜欢过郝建国。她对这个精明强悍、机敏健谈的青年，只有过赞佩之情，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好感而已。现在呢？郝建国在她心中的形象已经不那样完美了。虽然她还不能对郝建国做出明确判断，却好象从一件美丽的瓷器上发现一条裂纹似的，看上去已很不舒服。她口信对郝建国说自己只想在这里好好学习和锻炼，不想回城市，更不想交朋友，只想“独身”，“那样更自由”。由此而引来郝建国长篇大论的议论，表白，发问，以及各种形式的“劝降书”，她却没再给郝建国回信。

后来，杜莹莹来信透露她的追求者也是郝建国，而且流露出她对郝建国的赞佩与倾慕，并要求白慧替她“分析分析”，“出出主意”。这时，白慧偶然还会收到郝建国的信，她便对郝建国产生恶感。难道郝建国的感情是“多弹头”的吗？她猜不透郝建国是怎么想的。一方面想把这件事告诉杜莹莹；一方面又怕杜莹莹知道后难过，因为杜莹莹真的喜欢郝建国，因此她给杜莹莹的回信只说“这件事只能由你自己考虑和决定，不过应长期考验和观察，尽管是老同学、老朋友。朋友和伴侣的条件要求是决不一样的。”她下决心不再去曾理郝建国。她确实抱有“独身主义”的念头了。

杜莹莹的来信还含蓄地问到她“有没有碰到称心的人？”白慧看了这

些关心的话，不由得从鼻腔里冷冷地哼出声来，那颗受过重创的心中便翻起一个小小的、苦涩的浪头。

每当此时，她都要驱马，迎着风，在草原上尽情驰骋一番……

常鸣从未来过信。他们自从那桩可怕的事情揭开后，谁也不知道谁如何了。在她刚刚来到草原上时，还曾给常鸣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她手里捏着写好的信盼望邮递员快来；邮递员到了，她却躲开了。信留在自己手里，到现在纸都搁黄了。然后，那些沉浸在爱的甘甜中的日子，包括所有细节，她一点也不曾忘掉。经过的事就象一幅连着一幅的珍贵而迷人的图画珍藏在她心底，偶尔也会象流光一样从眼前一掠而过。那河口道三十六号的亭子间，小圆桌，爬满藤叶的窗洞，以及月光中分外恬静的小槐树林，大街上双双的影子；还有常鸣的种种形象--站在船板上湿淋淋的、病中的、侃侃而谈时的，他的声音、动作、笑貌，说过的话，都象刻在她的心上一样。特别是那充满爱和幸福的目光，常常对她一闪一闪……但这一切再不会回到她身边了，不属于她了。仿佛给一阵凶猛的风暴吹去了……

有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大大惊动了她，是郝建国寄来的。

信上提到了运动初期他们在校门口打那个女教师的事！居然还提到了常鸣！

据郝建国说，“常鸣去到学校找你，吵闹着要揪你，说你打了他母亲，要和你算账。

这小子蛮不说理，充满对你的仇恨。我呢？也不客气，否定了这件事。我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我把他驳得无话可说，他才走了。不过，你别害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必追问、打听，更不要对旁人说，反正这儿有我，谁也怎么不了你。我永远和自己的老朋友站在一起，你自管放心好了。我只是不明白，这小子怎么知道你打过他的母亲？”并嘱咐她“你如果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尽管给我来信好了。不要对旁人说，更不要对杜莹莹说。”

这封信搅得白慧整天胡思乱想，冷静思考之后，却觉得郝建国所说的这件事有些细节是不可信的。因为常鸣既不是那种人，也不会那样做，何况事隔数年，常鸣为什么当时不来揪她呢？但其中也有可信的根由，郝建国并不认识常鸣呀！后来，她想到，此事她只对杜莹莹说过，是不是杜莹莹与郝建国谈恋爱；关系密切，告诉他了。郝建国为什么不叫自己对杜莹莹说呢？她便没给郝建国回信，而去信问杜莹莹；此后她回去探亲时也找到杜莹莹问过。杜莹莹回答得含含糊糊，只说一句：“别理他，神经病……”

白慧便意识到这件事不大真实可信。

这件非真非假的事却弄得她又矛盾，又苦恼。一会儿她怀疑到郝建国的品行。一会儿又怀疑常鸣当真这样做过。此外还勾起那桩往事，叫她总去想……

岁月的尘埃层层覆盖，生活的浪潮慢慢冲刷。过去的事总会逐渐淡薄下来，但她那桩往事、那桩罪过在她心中并没淡漠，而是沉甸甸地落入心底。

日久天长，表面总算平静了，有时连条波纹也没有。

这次相遇太意外、太突然了！她重新失去平衡。无论怎样努力也稳定不住了，因为常鸣仍不能原谅自己。这表明她依旧是个不能原谅、不可饶恕的人……

往后的日子难过了。

那些沉重的东西再沉不到心底，而在中间悬晃着。偶然碰到什么有关的事，那东西就在心里边来回懂得发响。

外边在搞落实政策了。老干部、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便更深地感到一种内疚。外边又搞“反复辟”、“反回潮”了，这些张牙舞爪的理论完全可以把她那个自认为的罪过解释得合情合理。

完全可以从中找到安慰。但不知为什么，这些理论对于她愈来愈显得无力了，好象失效的药膏，于事无补。她如同一个破皮球，单靠打气是打不起来了。

有一次，知识青年的代表聚在盟里开会，她碰到了马英。马英是和她一起分配到草原上来的。但不在一个旗里，距离很远，再说两人以前有隔膜，从来没有来往。马英在牧场中的一个奶厂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出席整个自治区知识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她与白慧见面亲热极了，还象运动前在学校团委工作时那样。白慧也是一样。旧友重逢，可以享受一种温暖的情谊。谁也不想再碰一碰曾经隔在她们中间那堵看不见的、令人烦恼的墙，因此，两人都没谈到郝建国。

闭会那天，各旗代表纷纷返回去。白慧与马英骑马上了草原，并骑高高兴兴地走了一段路。将要分手时，两人激动地在马背上紧紧握了手。草原的太阳把马英黑黑的小脸儿晒得更黑了，身子却显得比以前健壮得多，简直象一只立在马背上的矫健的小鹰。马英忽然带着一股冲劲止不住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白慧，你干得这么好，我真高兴极了！以后咱俩经常通信，互相勉励；咱们就来做草原上第一代有知识的新牧民吧！这儿天地这样广阔，真能大干一气哪！白慧，说心里话，我过去确实对你有些看法。你，郝建国和一些人在运动初期有些做法太过激了。

现在看，确确实实是上了林彪他们的当！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当然，这不能说你是故意那样做的。我也犯过‘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呀！那时，咱们太单纯，只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似乎觉得干得愈过激就愈革命，幼稚地以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哪知道有些做法恰恰背离了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是复杂极了，今后咱们真得擦亮眼睛，多学习、多思考。别看草原上地大人稀，斗争也很复杂，再说，难道现在就没有林彪那种坏人？哎，白慧，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白慧听着，点着头。马英亲热地拍了一下她的胳膊说：

“你记得，运动初期在校门口你打过一个女教师吗？她叫徐爱华，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我在第四中学上初中时，她是我的老师。她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可以说，除去对我的生活照顾之外，她真比我妈妈还关心我。而且她关心的不是我一个人，所以，你当时打她那一下时，我在你后边拉了你一下，但没拉住……”

白慧完全听呆了。因为她清楚记得，那天她砸下木枪时，有人拉了一下但没拉住。

她一直不知是谁。尔后，她幻想过那只手把她拉住了，如果真是那样，一切恶果都会免除。现在她才知道，那只手竟是马英的。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事情转折时，好的可能总是有的，但没起到决定作用。它只能使人

更加惋惜，追悔不及。白慧怀着这种心情听马英接着说：

“她要是还活着就好了，可惜叫第四中学那帮极左派折腾死了。真可惜！你要是知道她是个多么好的老教师，准会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没用，应当记住教训呵！”

随后马英又说了一些话，白慧一句也没听见。马英走了，渐渐走远，一边还不住扭过身子，双手拢在嘴边喊着：

“白慧，有时间你来看我呀！听见了吗？”

白慧机械地举起一只手，和马英打招呼。她全身猛烈地打颤，以致坐下的马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她张开嘴回答不出声音来，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在喉咙里响着。

她骑马往回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她趴在了马背上，双手抱着马脖子，脸颊贴在光溜溜、长发一般的马鬃上，心中哀叫道：

“你呀，你呀，为啥你总和我没完？总找到我头上来呢！”

这之后，她的身体变得挺糟糕，脸也瘦了，颧骨明显地突出来。幸好她向来不爱说话，脸上没多少表情，别人看不出她的心事。

旗卫生部的领导见她身体不好，让她暂时不要在草原上奔波，她不干，坚持出诊。

有一次，她在马背上昏了，栽倒下来，躺卧在一大片嫩黄的贞洁花里。那匹灵通人性的栗色马用潮湿的嘴唇吻她的头发，把她弄醒。她爬上马背回来了。袍子沾满土，额角破了。领导想让她休息一段时间，却犟不过这个相当倔强的姑娘，就想个法儿，再次把她送到盟医院学习进修，以免她四出奔跑出什么事儿。她已经是第三次来盟医院学习了，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挺喜欢她。这次来，依然还是那么不言不语，工作起来带着一种忘我、甚至献身的精神。她向来不提条件，没有要求；但这次很反常，她提出两个条件，而且很古怪。一是不值夜班，二是不在小窗口售药。不值夜班情有可原，因为她身体不好。为什么要求不在小窗口售药呢？这里迪奇怪的原因，只能是永远保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问号。

一天，白慧所在旗来了个办事的人，给她捎来两封信。她猜想准是爸爸和杜莹莹的信接过一看，确实有一封是杜莹莹寄来的；另一封不是爸爸的，竟又是郝建国的。郝建国自从寄来那封有关常鸣的信之后，已经相当长的时间没给她写信了，不知又有什么事。

她先打开郝建国的信。信上首先祝贺白慧的爸爸升任为机械工业局第一把手，然后把自己不平凡的近况告诉她：他已经被结合到学校的领导班子里，做了副书记，还在区教育局党委内挂职。白慧对这些并无兴趣，而且感觉郝建国象一杯许久未动过的水，变味了。再看下面的内容，又是老调重弹，自我表白，要求做朋友。但在他前几年来信中的那股热情，却一点也没有了。他说“这几年，我遇到那么多人，最理想的还只有你。

咱们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不现实一些，搞独身主义要自讨苦吃的！”并且在这封信里，第一次告诉白慧，他与杜莹莹交过朋友，目前却正“面临‘散伙’的绝境”。他说他发觉“杜莹莹这个人软弱无能，没有思想，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既无理想也不实际，整天有口白馒头吃就能长得挺胖。在这个充满斗争的时代里，她只是个无用的人。

几年来，我因为心眼儿太软，一直将就她。但我仔细一想，十分可怕，如果真和她生活在一起，非把我毁了不可！”可是他又说杜莹莹背着他，‘和

一个地毯厂的工人关系挺不错，因此他感到自己被“甩了”，“很苦恼”，希望白慧能“同情”他，尽快答应他的要求。他保证一年之内在城里给白慧找个理想的工作，“不用再在大草原上受罪了！”并要求白慧“立即回信答复”。

信上所署的日期是今年一月份，不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寄到。

白慧把这张信纸扔在一边，再看杜莹莹的一封信。杜莹莹的信主要是骂郝建国欺骗她的感情。郝建国原先拼命追求她，向她表达得“又明确又具体”。当她一心去爱郝建国时，郝建国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教父”，她好象是个“教徒”，“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对他说”。还不准杜莹莹和别人接触。杜莹莹一切都顺从他了，他现在却象“没那回事一样”，甚至冷淡她。杜莹莹开始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郝建国正在追求另外一个名叫杨敏的女孩子。杨敏的爸爸也是部队干部，职位比杜莹莹的爸爸的职位高得多，杨敏长得“个子挺高，相当漂亮，皮肤非常白，是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挺出名，可是听说杨敏不喜欢他。”杜莹莹说，她现在才发觉郝建国并不爱她，爱的只是她爸爸的职位和名誉。而且她逐渐认清“这个人毫无感情，自私自利，是个政治上爬杆的猴子，伪君子，整天钻营，恨不得一天升一级。目前他为了甩掉我，到处给我造舆论，说我背着他交了一个朋友，抛弃了他。他多可恨！还自命什么革命者呢。呸！他不配！”“不知怎么回事，我再细细一琢磨，对他的印象就与以前完全两样了。他说话总那么单调，总是用一种吓唬人的腔调。以前我并不觉得，也许他变了。你说说，他究竟哪点可爱呢？我还听说，前一度他到处打听你有朋友没有，是否还要打你的算盘？因为你爸爸当了局领导……嘿，谁知道他是什么人，摸不透！”

在这封信上还告诉白慧说，她近日去探望过一次白慧的爸爸。“我见伯父精神并不很好。伯父是去年提升为正局长的，是不是又被当做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了？过两天我打算到伯父的单位去一趟，看看有没有轰他的大字报。好人总受欺侮，真倒霉！你要是有时间就回来看看你的老爸爸吧！你都快一年半没回来了，是不是打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

白慧掐指算算，自从去年三月份回去一趟，真有一年半没回去了。应该回去瞧瞧爸爸。爸爸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和帮助，还不断地有那么多精神压力。她每次回到家，住不上多少天就返回来了，好象她怕在那座城市里碰到什么似的……

于是，她向领导请了探亲假。

这时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初。正值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大转折的关头。

四

汽车在大道上奔驰。扬起来的灰黄色的尘沙在车身上蒙了厚厚的一层。远看象一只从干土里钻出来的大甲虫。窗玻璃也挂上一层上，污污涂涂，坐在车里看不清窗外的景物。

长途车把人搞疲乏了，可是一些坐惯了这种车的人，照样休息得很好。不管靠在椅背上的脑袋给车子颠簸得怎样摇摆晃动，也能睡熟，甚至还打出

鼾声来。

白慧坐在车上。她穿一件质地又粗又硬的劳动布的外衣，这件外衣的肩身都挺大，支楞楞的，穿在身上倒挺舒服。她敞着衣领，露出里面松软的灰羊毛衣和白衬衫。短辫依然梳得光溜溜，辫梢垂在肩上。她座位下的空档处塞了一个大帆布袋子，装满带给爸爸吃的当地出产的土豆。挎包里还塞着几袋奶粉，也是带回去给爸爸补养的。她一直没闭眼，有时望着窗外。今儿阴天，整整一路没见阳光。天空象一块大铅块压在头上，使人感到憋气，车上的人或都有此同感。人人脸上都是阴沉沉的。

一块重重的大铅块压在所有人的头上与心上。是呵，这正是那个时刻人们共同的感觉。

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失去了三位伟大的缔造者和奠基人：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而正是需要他们的权威、思想、智慧与决策的时刻失去了他们。中国未来方向的指针由谁来拨动？它的前景是光明还是黑暗的？它以五十年来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与生命赢来的革命果实，是否会断送在魔鬼的手中？数月来，发生了一连串违背人们意愿的沉重的事件。黑浊的恶浪掀起来了，漫天的狂风刮起来了，暗中作怪的妖魔在关键时刻要现出狰狞的面目了……

多灾多难的祖国又面临着一次兴亡、一次抉择和一次决定性的、严酷的斗争。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让祖国给几个倒行逆施的人拉向倒退，拉回到封建时代去的。人民在沉默中感叹着、警惕着、注视着、准备着……

二十世纪，一些小的政治变迁都攸关着人们的生活和一切。国家的命运更与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们对政治敏感得多了，即便在偏远的、人烟疏落的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们也是一样，连草原的空气也有政治了。白慧在那里就听到不少消息。那些盛传的有关江青等人丑恶行为的传说，使她听了觉得害怕，不敢相信，不敢议论，甚至不敢听，却又偏偏希望能多听到一些。这种心理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早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而引起大流血的时代里，她曾对江青产生过怀疑。但她一直不敢往深处想，似乎这种怀疑与猜想是大逆不道的。可是后来——尤其在周总理逝世后极度的悲痛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使她对这些人的怀疑不可避免地渐渐加深了

人们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在压力下又必须沉默，所以压抑得难受。难受得象车窗外阴云笼罩下的灰蒙蒙的草原。草原也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

汽车到了张家口，白慧换乘火车。火车开了一段路，忽然就象换了一个新天地似的：云破日出，大放光明，车厢里分外明亮。她对面坐着一位老者，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大约有六十余岁，清瘤的面孔上带几颗灰色的老年痣。下巴一绺银须。披一件黑大衣，戴着花镜低头正在读报。报纸给突然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雪亮。老者情不自禁地感叹一声，抬起头对白慧意味深长地说；

“李白有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都说是名句，我可不大喜欢。还是常说的那句民谚：‘乌云遮不住太阳’说得好。你瞧，太阳破云而出，有多好！来，咱们把窗子打开，让太阳照得更强烈些，晒晒这张报纸。这报纸有些怪味，潮烘烘的，很不好闻呢！”

白慧感到老者的话里有双关的意思，也略能领略一点儿。她对那老者点点头，表示同意。两人便一齐打开窗子，扶着窗框向外眺望。阳光温暖地

照在脸上；风吹纱帘，在鬓旁轻轻拂动。两人没再说话，都给窗外一片雄浑而开阔的景色吸引住了。

青森森的大山矗立眼前。起伏的山峦从眼前跑过，好象掀动着的绿色巨浪。山顶云雾弥漫，而峭拔的峰巅又钻破云雾，在明亮的天幕上显出它峻健的神姿。灰白色的长城宛如一条长龙，纵横蜿蜒，起落于谷壑，腾越于同奋，直向远处蓝蓝的群山中伸展而去（虽然它历尽铁蹄狼烟，风剥雨蚀，早已残破不整。然而它依然巍峨地屹立着……）

“它是人间的奇迹。是不是？”老者指着高处的长城，用苍哑的声音感触万千地说：“它正是咱中华民族的象征，咱们的骄傲。它是在非人能够想象的困难上建造起来的，因此它不容易被摧毁呢！”

白慧或许没有好好读过中国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正象这座长城。它包含着非凡的智慧、胆气和想象，包含着无比的勇敢、勤劳、毅力和神奇的创造力。它是人类的奇迹，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重复它。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摧垮它。那些嘲弄和无视它的小丑终究要可卑地死在它的足旁。它仿佛有大自然那种永世不竭的充沛的元气，而永存于天地之间……五千年来华夏文化中所凝结起来的民族精神，在五十年来的党的斗争中复活了，变得生气勃勃。谁想伸出肮脏的脑袋来碰一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触一触我们伟大的党，就叫他来撞一撞我们这座钢铁般的万里长城吧！

白慧没想到，在这次回家途中，会有如此激动的感受。

车到站了。白慧到家了，那老者还要继续前行。两人握手告别，白慧提着行李下车。

她很疲乏。可是一呼吸到故乡温柔的气息，精神又立刻抖擞起来。她一步一步地把帆布包从身后挪到脚前。

“要帮忙吗？”

一个胖胖的战士问她，她客气地谢绝了。她还是老脾气：一切都靠自己来做，不叫别人帮助，哪怕自己做起来很困难。这时，忽有一个金属般嘹亮的声音传到耳边。

“哎呀，白慧！”

原来是郝建国！白慧直起腰板时，郝建国已经站在她面前。郝建国依然戴着那顶绿军帽，手里提一个黑色的公事包。他眼里露出惊讶的表情，打量着白慧。一瞬间，白慧觉得他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异样和别扭的感觉。八九年间，虽然白慧回来探亲时，也曾见过他几面，但从未象这次变化这样大。他的嘴好象长了些，眼睛的距离更窄了，仿佛要合为一只。不知是他的模样变了，还是原先就这副样子，连他显露出的那种精明、世故和老练的神情都使白慧觉得不舒服；再加上那两封信引起她的恶感，少年时代他给她的那些良好的印象一点也没了，好象天亮时，曾在月光下的那些诗意毫不存在了。

“刚回来的吗？没人接站？你稍等等，我送你回家。”郝建国说。

“不用。你忙你的去吧！”

郝建国怔了一下，忽问。

“我给你那封信收到了吗？”

“没有。”白慧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回答他。

郝建国又怔了一下，敏锐的目光在白慧脸上打了一个转儿，又问：

“我请你回信，你为什么不回信？”

“我没时间。”

白慧说完这句冷淡的话，突然怔住了，因为她发觉郝建国已经狡黠地获知她收到了那封信。她很尴尬，同时心中被惹起一种反感和厌恶的情绪。郝建国感到了白慧这种情绪，立即来打破这很容易僵化的局面。

“你回来太好了！同学们都挺想你，尤其是你的老伙伴杜莹莹，她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吧。哎，你等等，我是来送一个朋友的。他的车很快就开，我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就来，还是我送你回去吧！我骑车来的，可以帮你驮东西。”

“不用：不用！”

“你等会儿吧，我还有话跟你说。”说着，他把公事包往白慧怀里一塞。

“你先替我拿着。”转身跑去了。

白慧拿着他的公事包，不得不等他。郝建国的小聪明更加引起白慧的憎厌。白慧真想把他的公事包扔了，自己走掉。

郝建国跑到那边一节车厢门前。他送的是一个女孩子，高个子，长得非常漂亮，看样子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皮肤雪白，头发乌黑而光滑，卡着一个银灰色珠光有机玻璃的发卡。她穿着式样时髦的薄黑呢外衣，背一个深红色崭新的皮包，上边电镀的卡子、锁扣、提把，熠熠闪亮。这可能就是杜莹莹信里说到的那个舞蹈演员。她和郝建国说话时，神气挺傲慢，动作姿态都很美，只是略有些做作。郝建国显得规矩而拘谨，脸上掬着笑容。他一边和那女孩子说话，还不时何白慧这边瞧两眼，看看白慧是否在注意他们。

白慧忙移开目光，装做没瞧见。

不一会儿，站台的铃响了，车开了。那边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多保重！问伯父好！”跟着，急匆匆的脚步声跑近，郝建国回来了。白慧不等他开口，把包儿塞给他，说：

“不用你送了。我坐公共汽车回去！”

“我刚送一个亲戚，叫你多等了。你别急，我路上还有话跟你说呢！”

“改天说吧！”

“不，我想摘重要的先和你简单说几句。”

“什么事？”

“就是我在信里提到的，要求和你做朋友。哎，白慧，你先别这样，听我说。我确实实渴望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在困难时互相鼓励、支持和战斗。目前的形势更加强了我这种渴望。这些天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白慧确实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她不想答理他。

“算了吧！你怎么能不知道。你别对我这样冷淡好不好？我们又没什么仇。你听我说。眼前这些事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说不定就要出乱子，打内战。白慧，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有好好谈过。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不了解我的思想，我多需要一个知音呀，我相信你是能理解我的……”他急急切切地说，好象他有足够的把握能说眼对方，只是没有充裕的时间，“一两句话没法儿说明白。你愿意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谈谈吗？、谈上半天或一天。到我家来……”

“行了。我没兴趣了解别人，我只想快回去了。”白慧不耐烦地拦住他下边的话，极其平淡地说；“你也该回去了。”

郝建国碰了钉子。他先怔了一下，跟着在白慧冷冰冰的脸上找到答案。他恼羞成怒，脸色即刻变得非常难看，鼻孔哼笑出两声，发狠地说；

“你要是不想和我好，就全说明白！--。、，；

“什么意思？”

“你的事当我不知道吗？”

“什么事，你少胡扯！”

郝建国的唇边露出一条嘲弄、恼恨、带妒意的笑痕，并用一种酸溜溜、挖苦的口气问她：

“你那位‘常先生’可好呀？”

白慧听了，呆住了。可是她立刻明白郝建国说的是谁，是什么事。郝建国却见她的表情有些异常，细长的眼睛瞪得发圆了，目光可怕。郝建国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发慌，忙说：

“我早就听说那人总缠着你。我怕你上当。你想想，你和他有私仇，他能和你好吗？他是想把你的感情全调动出来，再甩掉你，好对你施加报复。再说他是牛鬼蛇神的儿子，你要跟他在一起，有个风吹草动，连你也得跟着一起倒霉。那次杜莹莹把这件事告诉给我，我一听大吃一惊，立即写信给你，本想跟你说明白，但信里不好直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现在和他还有联系吗？”

白慧完全清楚了，郝建国那封信所说的常鸣去找她“算账”的事完全是假造的。那封信曾给她带来那么多苦恼、猜疑和不眠之夜原来都是他--他的私欲和卑鄙的手段造成的。她的脸颊气得发红，嘴唇直抖，再也抑制不住似地猛然朝他大叫一声：

“你走开！卑鄙！可耻！”

郝建国吓了一跳。他睁大眼看着白慧由于极度忿恨而涨得通红的脸。白慧的脸从来没有这么红过。他吃惊，还有几分奇怪和不解。但他觉得，如果再说下去，白慧有可能给他扇来一个耳光。他左右膘了两眼，发现附近有人投来好奇的、感兴趣的目光。他瞧了瞧地上沉重的大帆布袋子，打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装出一副平静自如的神气说：

“噢！我还有事，不能送你回去了。咱们改天见吧！”

说罢，他急匆匆地走了。白慧呆呆地站了半天，才开始往站口挪动那只帆布袋子。

六点多钟，她到了家。

这次她回来之前没有通知爸爸，也没告诉杜莹莹。在她的想象中，爸爸是愁闷的，所以她希望自己突然回来，会给爸爸带来意外的高兴。

她站在家门口。面前便是她从小天天进进出出的门。门上陈旧的油漆颜色和每一块痕迹，都是非常熟悉的。于是一股甜蜜的、带点伤感味儿的生活暖流，一下子攫住了她。

她眼睛立刻模糊了；抬起手敲了敲门，跟着听到爸爸从里边走来的脚步声、问话声和开门的声音。她心想爸爸准是那副严肃和忧虑重重的样子。这些年来，她每次回到家见到爸爸时，爸爸总是这副样子。

门开了，没想到爸爸露出惊讶表情的前一瞬竟是笑眯眯的。

她扑到爸爸的怀里哭起来。

“这是怎么啦？小慧，快进来，快进来。”爸爸说着，拉着她走进来。

她没来得及走进房间，站在过道又趴在爸爸的肩上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好象她受了多少委屈似的，当她感到爸爸结实的肩头已经露出瘦棱棱的尖儿时，哭得更伤心了。

就象小孩子那样双肩止不住地往上一抽一抽。她很少对爸爸这么哭过，况且已经是这么大的姑娘了。

爸爸的大手抚着她的头、辫子和后背。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鼻子一阵阵发酸，仿佛也要把憋在心里的一大块东西哭出来似的。但他是个坚强的男人，眼泪向来很吝啬。

“好了，好了，快去洗洗脸，歇一歇，你还没吃饭吧！”爸爸的声音压得很低，似乎只有低音才能保持声调的平稳。爸爸把白慧推到脸盆边，拿来香皂、热水和手巾给她。

“把脸上那些没用的东西洗掉。”爸爸用一种温和的教训的口气说。

白慧洗着脸，不觉之间，从镜子里发现爸爸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挺特别，而且是在偷偷地笑，这显然不是为了故意哄女儿高兴。以往每次她回来，爸爸也不是这种样子。

这次好象有件愉快的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脸上来。

“小慧，你先歇歇，我去买点吃的。”爸爸说，一边在过道把饭盒、塑料袋、小锅都塞进一个挺大的草篮子里。

白慧跑到爸爸跟前：

“爸爸，您别去。我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她哭过的两眼红红的。刷洗净的小脸湿淋淋地闪着柔和的光，散着香皂的香味。

“不，今天非吃好的不可。”爸爸花白的眉毛跳动了一下，激动地说：“有伴你想不到的好事。真的！你没听说吧！好，晚上我在饭桌上告诉你！爸爸今天又要好好请请你了！”

这句话爸爸许久没说了。白慧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她猜不着，也决不会猜到。这属于那种非得请人告诉才会明白的事情。

“爸爸，您能不能先露一点儿给我？”

爸爸摇摇手，可是有股喜悦的激情在他的嘴角上跳跃，差一点说出来，但还是闭住了嘴巴。那股喜悦的激情就从他眼里闪耀出来。保密喜讯也是一种幸福。爸爸带着这种心情和表情赶忙出去了，仿佛再不走就要泄密了。

她联想到刚才在车站上郝建国说的什么“这些天发生的事”，心想：

“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是大事……”

她一个人在两间屋里转一转。对于远方归来的人，家里的一切都是醉人的。她两只脚踩在地面上觉得软软的，好象踩在厚厚的毯子上一样，脸颊一阵阵发热，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陈设如旧，东西都放在原来的地方。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爸爸房间的墙壁上多了三张照片，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装在一个肩长的金边镜框里；框子上插了一朵洁白而精致的小花……

她自己的房间还是老样子。床上铺了一条新洗过的罩单，很平整，好象爸爸知道她要回来，特意为她收拾和布置好的。忽然，她急扭过头，妈妈的照片仍在那里。她的眼睛湿润了

“妈妈，您听见爸爸说了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似乎已经下了决心，非到晚饭桌上才能告诉她。既然爸爸高兴这么做，就依着他吧：白慧耐心等待着。

爸爸叫白慧帮他把过道的饭桌抬进自己的房间。今儿买来的菜好丰富！有肉、有鱼、有虾，花花绿绿摆满桌子。中间还放了两瓶酒，一瓶是特曲，另一瓶是通化产的葡萄酒。

这两瓶琼汁玉液配上华美的瓶签便使晚宴变得不一般了。爸爸向来是不喝酒的。看样子他今天请客。饭桌四边摆了五把椅子，桌上还配了五双红漆筷子，五个蓝色的酒盅、素白的羹勺和小圆碟儿。他简直要开一个小型的“国宴”呀！

“都谁来？”白慧问。

“你都认识。”爸爸含笑说，可是一句也不多说。

白慧在灶上煮饭，心里仍猜测着那桩不知道的事。外边有人敲门，爸爸把来客请进来。白慧一看，头一个又胖又大又结实，精神十足地挺着胸脯。那神气象摔跤场上的优胜者，右手提着一个大蓝布兜子。白慧一眼就认出是李叔叔。他是原先爸爸厂里的同事，装配车间的一个组长；爸爸叫他大老李。白慧上去和他打招呼、握手，互相问候。

后边跟着又进来两个瘦瘦的男人。一个卸了顶，高个子，细长腰，戴副银丝边的圆眼镜；衣着整洁，气质文弱，进门后就先摘下眼镜，掏出一块手绢擦镜片。另一个瘦矮，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上满是很深的皱纹，好象龟裂开的泥片片；右腿有点瘸。但他显得最活泼，进来就用哑嗓子朝爸爸喊道：

“老白，今儿非把你灌醉了，否则我们可不走！”

这两个瘦男人看见白慧，都现出惊喜神情。有点瘸的瘦男人说：

“哎呀，是小慧！长成大姑娘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白慧听出来，这人认得自己，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她回答：

“刚到”

“老白，你可是大喜临门呀，高兴的事全都一窝蜂往你身上跑呀！”

大家都爽朗又开心地笑起来。爸爸对白慧说：

“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忘了他们吗？”

白慧有些尴尬地站着。她确实记不起来了。爸爸嗔怪地对她说：

“这是张伯伯呀！那是冯总呀！你这孩子，怎么忘性这么大！才几年呀！”

白慧恍然大悟。原来有点肩的瘦男人是张伯伯，张副厂长。另一位是冯总工程师。

他俩也都是爸爸原先的同事，又是好朋友。他俩和大老李十多年前都是她家的常客。这些年象绝了交的似的，不见他们来了。真是变化太大了呀！冯总原先是满头黑发，总梳个整齐又油亮的分头。如今歇了顶呢！变化最大的是张伯伯，他的头发给时光漂得这么白，脸上的皱纹比爸爸的还要深，有的皱纹简直可以夹住小纸片儿。在白慧的记忆中他的腿并不瘸呀！大老李还是老样子，所以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她忙向张伯伯和冯总招呼。

“瞧，时光不饶人，变化真不小呀！连小慧都认不出我来了！”张伯伯感慨地说。

忽然他又振奋地说：“我人老，心可一点儿也不老呢！它象春天的花朵，又开开喽！”

大家在笑声中进了爸爸的房间。大老李说：“你们瞧，我说老白今天准

摆得琳琅满目吧！老白，你的酒可预备得不足。这点酒连我都准不醉，拿什么灌你？不过，你别着急，瞧我的

……这是一瓶、两瓶、三瓶！”他说着，一边把三大瓶亮晃晃的“芦台春”放在桌上。

“大老李，看样子，你还真想把我灌醉了！”爸爸笑着说。

“老白！”大老李说：“你可别这么说，今儿谁不喝痛快了也不行！我活了四十多年，还没见到象今天这么出奇的事呢：所有人，不管会喝不会喝，都抢着买酒，跟白给不要钱似的。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力气，才抢来这三瓶？！今儿都得尽兴，包括冯总在内！”

冯总摇着手，笑眯眯地说：

“能者多劳，能者多劳！”

张伯伯朝他嚷道：

“干什么，冯总？还没上阵就‘鸣金收兵’了？来，你要看见我今儿带来的酒菜，保管你不用灌，自己就拿起一瓶酒往嘴里倒！”

“噢，什么酒菜？”爸爸问。

张伯伯叫大家猜，谁也猜不对。冯总嘟囔着说：

“老张真行，他和我来了一道儿，居然有件什么宝贝连我也没告诉。我猜准不一般！”

张伯伯把自己带来的一个手提包放在桌边，拉开拉链，手伸进去，同时故作神秘地说：“你们可别怕。它们现在是咱的俘虏了！”说着从包里往外一种。原来是一条麻绳串绑着四个青灰色、又肥又大的活螃蟹。所有的螃蟹爪子都在空中活动着。“瞧吧，个个顶盖儿肥，不多不少，正是它们四个！”

大家都纵声大笑，呼好喊妙；冯总傻气地拍起手来。大老李叫着：

“有了它们四个下酒，今儿更痛快了！你怎么样，冯总？”

“我喝，我喝……”冯总笑得流出眼泪。他摘下镜子用手绢擦眼角。

“来，小慧，你把它们放在锅里蒸蒸，可得蒸熟了呀！”

“小心点，别叫钳子夹着。”

“没事。冯总，你还怕它们吗？早叫我挂得牢牢的啦！”

这些话里的双关意思，白慧听不出来。她拿去蒸了。不一会儿，螃蟹蒸熟，红得象四个压扁了的大柿子，冒着热气儿，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四边洒上姜末，端上来了。白慧把它摆在饭桌中间。这时酒盅里斟满了酒。酒、螃蟹和菜的味道与爸爸等几个人吐出的烟味混在一起，浓郁的香气直往大家的鼻孔里钻。大家坐好，就要开宴了！

“爸爸……”白慧等着爸爸来揭开谜底，她亮闪闪的目光期待又好奇地望着爸爸。

爸爸的表情忽然变得非常庄重又严肃。他好象没听见白慧的招呼而站起身来，端起酒盅，郑重地对大家说：

“来，咱们前三盘，敬给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的愿望实现了！”

屋里的气氛顿时好象被爸爸的神情渲染了一样，变得异常庄重。大家都起身面对着墙上三位中国革命巨人的照片端起酒盅，大老李另拿一只水碗，把酒瓶的嘴儿朝下“咕噜咕噜”地倒满，然后豪爽地端起来。随后便是饮酒、斟酒、再饮酒和撂下酒盅的声音。

白慧自小很少喝过酒，也连伙三小盅，因为这三盅是敬给她热爱、怀念和已经离开了她的人。热辣辣的酒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她扭头恰好看见

张伯伯的眼角淌出一滴热泪，在灯光下分外明亮，顺着眼角一条很深的皱纹流下来。再看爸爸、冯总、大老李的眼睛也是亮晶晶的。数月来始终保留在她心里的说不出的难过的情感，此刻被激发出来，泪水滴滴咯咯地落在地上。大家坐下来沉默着，仿佛都在想心事。突然，张伯伯叫起来：

“怎么？该高高兴兴啦！这是喜事，咱们为什么还别别扭扭的？来，先吃我的……什么我的！吃它们四个。下筷子，不！吃这个不能下筷子，动手吧：来呀，大家动手，把他们碎尸万段！”

张伯伯的话，立刻改变了屋里的气氛。

白慧觉得好象有一种由衷的喜悦和痛畅的情绪回到这几个人身上。他们的脸上满是开心和轻松的笑容了。众人一齐动手吃螃蟹，响起一阵折断螃蟹骨壳的清脆的声音。

“来，小慧，你为什么怔着，快吃呀！”大老李咬着一只螃蟹爪，心急地说。

“小慧，你说吧！你吃‘谁’？张伯伯给你拿。”

“吃‘谁’？‘谁’？”白慧不解其意。

“怎么，你不懂吗？”张伯伯奇怪地看着她。

她的确不明白。爸爸笑了，说：

“老张，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她在边远的草原上工作，这才到家。我答应在饭桌上告诉她，一直没来得及说……”

“哎呀，老白，你真沉得住气！”大老李接过话说。“来，小慧，我告诉你，那几个王八蛋……”

张伯伯伸手捂住大老李的嘴，抢着说：

“大老李，你别说，我来告诉小慧……”

“要不，我来……”冯总想插嘴，但他的嘴太慢了，插不进来。

大家都争着说，急得站起身来，几双手一齐比划着，好象要打架似的。筷子掉在汤碗里了，酒瓶碰得象醉汉那样晃来晃去。白慧惊奇地看着这几位长辈，他们兴奋得简直象小孩子一样了。

“还是我来说吧！”爸爸说。

大家想了想便一致表示赞同。这件天大的喜事还是由爸爸讲给女儿。

“他们……他们……”爸爸激动得声音直打颤，“完了，垮台了！彻底地垮台了！”

“谁？”白慧问，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他！他！他！”张伯伯指着大盘子里支离破碎的四只螃蟹。

“哎呀，这么说她还是不知道呀！”大老李给酒烧红了脸显得分外急躁。他大声、痛快、解气地叫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个王八蛋完蛋了！”

这消息真是从天而降！真好象翻天覆地那样巨大！这时，几位长辈都直盯着白慧。

尤其是冯总的亮闪闪的一双圆眼镜片一动不动地正对着她，想重新感受一下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无比惊讶和狂喜的心情。白慧完全听呆了，她直楞楞地望着爸爸。爸爸用粗糙的手背抹眼睛。说：

“是的，孩子，是真的！在咱们城市里，大概没人不知道这件事了。顶多再有两三天就要大庆祝喽！”

“庆祝，庆祝，大庆祝！”张伯伯激动地嚷着，“所有热爱党、热爱祖国

的人们都要跑上街头大庆祝喽！今儿咱们先提前庆祝庆祝。来，小慧！你吃哪个？吃江青吧！好，这个就是她！张伯伯夹给你，就这个。”同时，中点咔嚓一声，一个还剩下五只爪子、一只钳子的大螃蟹扔进白慧的碟子里。张伯伯接着说：“你知道画家齐白石吧！他在日寇侵华时期，曾画了一张。《螃蟹图》，上面画着几只大螃蟹，题道‘看尔横行到几时？’用来骂那些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横行的日寇。现在我们也借用这句话骂骂这四个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横行霸道的罪魁！‘看尔横行到几时？’到时候喽！爪子都没了，看你们还怎么横行！？”

白慧眼盯着这个怪模怪样、残缺不全的玩意儿，耳听张伯伯高兴地叫道：

“你呀，冯总，你来哪个？怎么不动手呢？你连死螃蟹也怕呀！”

“不怕，我不怕……”冯总拘谨义乐陶陶地说。

“给他个带钳子的。”大老李吃着、叫着。

“不，老张，你不能怨怪冯总。”爸爸说，“是他们的太狠、太毒、太残酷了！”

冯总要是一切都弄明白了，就不会怕了！”

张伯伯听了，沉一下，突然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指。说：

“说得对，老白！是他们太残酷了。十年来他们打击陷害了多少人？冤死、屈死、弄死多少人？老一辈革命家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里、在敌人的牢狱里没死，不少人却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都是中国革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呀！叫他们活活给折磨死了，弄死了。他们真比国民党还凶狠哪！中外反动派没做到的事，他们全做了！

可是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的。好象除他们之外，都是反革命。他们用诡辩论偷换辩证法，用野蛮代替文明。想用……”

爸爸接过话，把早已成熟的、从来没表达过的思想说出来：

“想用法西斯来改造我们的党！总理是怎么死的？是他们迫害死的。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迫害总理。还疯狂地镇压群众！他们把谎言装在刺刀上逼着人家相信和屈从。他们窃用毛主席的权威，歪曲党一贯的政策。用耸人听闻的字眼儿冒想、抱负，没有知识。有的有工作做，但没有事业心。满脑子实用主义。他们无知得可怕，无知得可怜，却又自以为是，甚至还挺狂妄！更有的少数青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标准，纯粹变成一副铁石心肠。他们打人时，一双手举起棒子砸下来，竟然毫不迟疑，就象打一块土疙瘩。瞧，你们瞧——”他站起来，离开座位往后倒了两步，捋起右腿的裤筒，露出膝盖给大家看。这膝盖变了形，中间瘪下去，一边突起个尖儿，几处皮肤鼓起了暗红色的肉棱子。看上去又可怕又叫人难受。“他们把我打成这样，还罚我站着。后来伤口化脓了，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你们猜，他们在路上对我说什么？他们说‘给你治好了，接着再打！’他们的头头儿说，‘你这可是自己摔的。你要敢诬蔑革命造反派就打碎你的狗头！

到那时，我就说你的脑袋是你自己撞墙撞碎的。’听听这话吧！他们凶狠，可他们也心虚，怕有一天找他们算账。国家有宪法、有法律，党有政策，凭什么任意打人，折磨人，杀人？再说，我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跟着党和毛主席，何罪之有？！看着吧，看他们今后有什么脸再见我，有什么脸见人！”他扭头对听得发呆了的白慧说：“你觉得我脾气变了吧！不，你张伯伯一直是这样的。好讲直理，不屈服。就是给他们押着的时候，棒子在身上飞舞的

时候，也是这样。你爸爸比我们还坚强。前几个月搞‘反右倾翻案风’时，你爸爸又差点叫他们搞下去。你爸爸跟他们斗，一点也不含糊呢！我们可不象冯总那样眼服帖帖，不过因此也招来不少皮肉之苦。他们真把你张伯伯打苦了……”他干哑的声音哽咽了。沉吟一会儿，抬起头来，显出一种顽强的神气。他瞧瞧白慧，又露出慈祥爱抚的笑颜，转而对白慧的爸爸说：“你这女儿是个好青年，绝对和那些人不一样。我相信，正派的青年是大多数的。他们经过十年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经过这次同阴谋家野心家的尖锐斗争，必然学懂不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道理，愚弄他们已经不容易了！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革命青年的大示威不是他们觉悟的最好的见证吗？我一想到那情景，就坚信祖国的将来大有希望，这些青年的前途也无限远大哪！老白，今儿应该高高兴兴嘛！”

为什么总提那些难受的事呢？应当往前看哪！来，来，来，同志们，咱们向小慧敬一杯，预祝咱们祖国的青年一代幸福，大有作为！来呀，小慧，别怔着呀！端起酒盅喝吧！你们的将来多好，我们多么羡慕你呀！”

张伯伯满脸皱纹舒展开了。他满怀着真挚的情感招呼大家，一边把蓝色的小酒盅端到白慧面前。在大家的呼唤中，白慧慢慢地、下意识地端起酒盅。忽然，她觉得这些围聚过来的酒盅在她眼前亮晃晃地旋转起来。跟着，饭桌，人，周围的一切，连同脚下的地面也旋转起来。自己的脑袋象个大铁球，控制不住地左右一摆。当地一声，她的酒盅从手里落到桌子上，酒溅得四处都是。

大家都吃一惊，见白慧的脸色刷白，非常难看。爸爸带着一点微醺说：“她没喝过酒。开始时那三盅喝下去，我都不大行了，何况她？小慧，你到屋里躺会儿去吧！”

白慧直楞楞地站起来，离开饭桌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她耳朵里响着大老李对她说话的声音，但只有声音，没有字和内容。

庆祝胜利的聚餐进行到深夜才散。

桌上还剩不少酒，留给明日再尽兴。这种兴奋是一时发泄不尽的，而且是几代人此生总也忘不了的。

除去酒，饭菜也余下不少。唯有那几只螃蟹，只剩下一堆碎屑、爪尖和四个光光的带点腥味的骨壳了。

爸爸嘱咐大老李把张伯伯和冯总分别送回家。因为他俩走起路来都象踩着球儿似的。

大老李把冯总的眼镜摘下来，放在自己的衣兜里。冯总用不着眼镜了，他就象一棵藤蔓依附在大老李粗壮的躯干上。三人走到过道。张伯伯居然还挺清醒，他把手指头竖在嘴唇前发出“嘘嘘”两声。

“轻点，别把小慧吵醒，她准睡了。”

“放心吧！吵不醒。她还不醉成一摊？”大老李好象大舌头那样，字儿咬不清楚了，“老白，你不用管她，明天早晨醒来，给她再来上小……小半盅，回口酒就好了。叫她多睡会儿吧！心里高兴，睡，睡得也踏实……”

爸爸送走客人，关上门。浑身带着美滋滋的心情和酒意，踩着不大平稳的步子，走到女儿房间。他有一肚子话想对女儿倾泄出来。如果一开口，恐怕一连三天三夜也说不尽。生活可以改变、甚至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十年来的生活把这个寡言的人几乎变成了哑巴，几天来的巨变又要把他改变成另一种闭不上嘴巴的人。当他迈进女儿房间的门坎时还拿不定主意：到底

叫女儿好好睡一睡？还是把她叫醒，先将自己那些在心里憋不住的话摘些主要的对女儿说一说……可是，他发现女儿并不在屋里。

“她到哪儿去了？”

他走到过道叫了两声。厨房和盥洗室的门都是开着的，里面没人。他诧异地想：“深更半夜，她总不会出去吧！”随后里里外外转了两圈，喊了几声，仍然听不到回答。

他觉得挺奇怪，再一次走进女儿房间，只见女儿床上的罩单十分平整，没有躺过的痕迹。

于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号开始跑进脑袋里，和酒后混沌不清的感觉乱轰轰地搅在一起。

无意间，他发现在白慧妈妈照片前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散落的水滴样的湿痕。

“这是什么？噢？泪水吗……”

他心里掠过一种朦胧的、莫名的、不祥的感觉，慌忙在屋内寻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女儿从外地带回来的提包放在墙角，那件劳动布的外衣还搭在椅子背上，看来她没有远去。可是忽然，床头小柜上放着一两张白色的信纸似的东西，蓦地闯进了他的眼帘。他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两张信纸，一张是打开的，写满了字；另一张折好的。他抓起来，先看那张打开的。正是女儿写给他的。刹那间，脑袋里酒的迷惑力全部消失——他万万想不到是这样一封信。

爸爸！亲爱的爸爸！

我只能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了！说实话，我还不配这样称呼您呢：我不配做您的女儿，我辜负了您和妈妈对我的希望，辜负了党，我是个有罪的人！

这一切您是不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对您说过。我在运动初期亲手打过一个人，一个好人，一个为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的女教师。她已经死了。虽然不是我亲手致死的，但我曾经那么狠地打了她。她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不能宽恕我的。我是有罪的！

然而，我那时确实真心为了革命，把自己这种做法当做真诚的革命行动来做的。我心里没有半点瑕疵。

（我只请求您在这一点上理解我）此后，我后悔！我痛苦！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是现实并不否定我。没有人找到我头上来，好象这件事并没那么严重，只要不当作一回事，照样可以过得挺好的。我可不行！如果现实不叫我负责，法律不叫我负责，我却负有心理上、道义上的责任！我是有罪的！然而我又一直不明白：一个人为革命怎么会做出损害革命的事？他一颗纯洁而真诚的心怎么会跌入罪恶的深渊，无以自拔？虽然我也想到过，我可能上了某些政治骗子的当，但我没有能力彻底弄明白这一切。现在我才全都明白了。原来我做了那几个最卑鄙、最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炮灰。吃了他们的迷魂药，被他们引入歧途。我受了利用的愚弄，而且给他们利用过后，丢弃一旁，不理不睬，我叫他们害得好苦呀！

我还悔恨自己。我想过怎样洗清那罪过、那耻辱和肮脏的污点。我想了整整十年，但没有办法！当今天一切都真相大白时，那污点就变得更清楚、更脏、甚至更大了！我有什么脸再见您、张伯伯这些好人？！您、张伯伯知道了这件事，肯定会憎恨我、骂我、看不起我！我所痛苦的，正因为我不想当这种人，而我做这件事时，也不是为了要做这种人呀……到底我该怎么向人们表白自己：一个黑色的污点我也不想要，但偏偏沾上它又洗刷不掉，我到底该怎么办呀！到底应该怨谁？怨我吗？还是怨那些骗子？怨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完了！

我走了……我决定了。

至于我去哪里，我不愿意告诉您，您也不必再找我，就只当您没有这个女儿吧！妈妈白生了我，您白白哺养了我！

您恨我吧！您可千万别想我呀……

如果人有两条生命多好！我情愿死掉以前那耻辱的一条。让另一条生命重新开始，好好开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条生命……

再见，我的好爸爸！我多想做您和妈妈的名副其实的好女儿呀！

小慧

下边注着一行字：

另有一封信，是给常鸣同志的。他住在河口道三十六号。请您叫杜莹莹给他送去。杜莹莹会把您所不知道的这个人的情况告诉您的。

爸爸读信时，身子东倒西歪，两只脚不断地变换位置才保持住站立的姿势。现在他心里充满可怕的感觉。尽管他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但现在不是弄清原因的时候。他就象疯了一样飞快跑出大门，一路好几次撞在门框上、走廊的墙壁上、楼梯的栏杆上；然后他站在漆黑的街心放声呼喊。这声音在静静的深夜分外地响--

“小慧，小慧！你在哪儿，你快回来呀！快回来呀！”

六

第二天的清早。

北方的晚秋难得有这样好的天气。天上无云，象无风的海面，蓝得那样纯净和深远。

阳光充满天地之间。鸟儿一群群在天空飞，翅膀闪着光。清爽的风把太阳的暖意送到所有打开的窗子里。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是不是春天抢先地回来了？

今天，天没亮，整个城市就被雷鸣般的鼓号声惊醒。人们都起了早，兴致勃勃地从家里走出来。很快，大街小巷聚满了准备游行的队伍。红旗和

人混成一片。没有人来调动，没有人统一组织，也没有人下令，游行到处开始了。

今天是已经公开了的秘密正式公开的第一夫，是历史性的大喜日子，是全民族欢天喜地的一天。中华大地又一次象重新获得解放那样，自由自在地大口呼吸着……

常鸣穿着一身平平整整的蓝制服，推一辆擦得挺干净的自行车正从院里往外走。车上电镀的部分都在愉快地闪着光亮。车把正中插一杆自制的苇子秆儿的三角形红色小纸旗。

他上衣的领扣儿扣着，显得很郑重。里边的衬衫露出一圈雪”白的领口。他眉宇间分外舒展，身上带一种如释重负一般的异常畅快的情绪。

他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圆胖脸儿、梳短发的姑娘。这姑娘看看门牌，又打量一下他。便问：

“请问你是常鸣吗？”

“是呵，你是谁，有事吗？”他答道，并莫解地瞧着这左眼有点斜视的姑娘。

“我叫杜莹莹。你记得十年前我借给你一件绿褂子穿。那次你……。

“记得。”常鸣立即回答道。他记得这件十年前的事就象记着昨天的事一样，“你……”

“白慧托我给你捎来一封信。”她说，从制服上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常鸣。

常鸣显出一阵轻微的激动。他忙支好车梯，接过信看，没有信封，只是张白色的信纸折叠成一个十字花）L的菱形的小纸块。头一次，白慧给他的信，就叠成这个样子。他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信笺，一边问：

“她回来了吗？”

杜莹莹没说话。常鸣发现杜莹莹的双眼哭过似的，眼皮都红肿起来了。常鸣感到事情有些不好，便问：

“怎么？”

“白慧失踪了！”

“失踪？”常鸣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响，脸上充满惊讶的表情，“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的事……”

“怎么会呢？为什么？为了什么？”

“你看看这封信吧！也许在这上面会告诉你的。她以前跟我说过，她对你……说真的，她对你……”杜莹莹哽咽了，泪水从红红的眼眶里重新涌出来。

常鸣急切地看着这张信纸。原来上边只有不多的几句话。

常鸣：

你一共两次没有原谅我。我知道你现在仍然不能原谅我，我也决不请你原谅我了！

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两句心里的话。因为我再不用顾虑

你看过信会怎样想……我多么爱你！原来--如果没有那

桩事--我可以成为你的爱人，但由于受了骗子们的愚弄

却成了你的仇人。我无限痛恨他们，也恨自己。等我明白

过来、甚至早在我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是一种罪过时，就已

经晚了，不可挽救了。我为什么不能象你一样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生活，我却不能。我原来也可以做一个好人呀！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生活呀！只可惜，恐怕直到现在，你并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我的心……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你了。这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早已分开了。而且早在我们没认识之前，事情就埋藏着这些后果。我毫不怨怪你。我只感谢你救过我。我对不起你。而且直至现在还爱你……当然说这些都没用了。

祝你幸福吧！常鸣。象你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一切都会是幸福的。

我全向你表白了。别了！

白慧

常鸣看到这儿，双手把信纸蒙在了脸上。他浑身猛烈地打颤，痛苦地低叫着：“其实，其实我心里早就原谅你了……”他悲哽得再说不出声来。

杜莹莹抬着滚圆的小手抹眼睛。

忽然，常鸣扬起痛楚的脸直对着杜莹莹：“你说，她会到哪里去？！她在哪里？”过度的激动和痛苦使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失常。

“我哪里知道。她爸爸和几个朋友、同事直找到今早也没找到。我就怕……”她的口气有些绝望，“可能是……”她心里有个可怕的估计，不忍说出来。

“不！”常鸣冲动地、甚至有些严厉地说，“不会有别的可能！我，我去找她！”他把那张抓绉了的信纸往兜里一塞。猛地踢开车梯，双手一推车把，腾身上了车，刹那间冲出大门。

“你到哪儿去找她？你知道她在哪里？”杜莹莹跟着跑出来，在后面叫。

此时，常鸣已经急渴渴地往街心驰去，一边还回过头叫着：

“她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把她追回来！”

看他那样子，真象要一下子奔到天边似的。但哪里是他的目标呢？杜莹莹眼瞧着他的身影在远处的游行队伍中间消失了，心中一片茫然。

常鸣骑车在大街上飞驰，在游行队伍中穿梭。这时，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大街上人流如潮水般地激涌着。朗朗的笑声、愉快的议论声、激愤的口号声和震动人心的锣鼓声汇成强大的轰响。仿佛长久压抑在火山口里的灼热的岩浆爆发出来了，火辣辣地喷射出满天奇异的光彩。游行的人群热情地举着毛主席、周总理的画像。

常鸣在街心疾驰着，穿过一处处红色的火样的旗丛。旗光映红了人们的笑脸！爆竹飞升到无限开阔的天空中炸开。一些游行队伍正在演出活报剧，用怪诞的装束和脸谱化了的角色极尽丑态，挖苦那四个已经被历史所唾弃的小丑和罪魁，为胜利的人民增添喜悦和兴致。

常鸣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寻找那个失掉了的人。他每一分钟都没有松懈追赶的速度，焦灼地四处张望。跃动的人群往来不绝，使他眼花缭乱。他的前车轮箍不时碰到人身上。他不断地道着歉说：

“对不起，我有急事……我……”

凡是给他的车碰了的人，却都一概对他摇手，笑咪咪地表示毫不介意。幸福者的心是宽容的；似乎在今天，可以原谅的都该原谅了！

常鸣感到自己这件事与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普天同庆的情景太不相称

了！他多么希望立即找到白慧，把她拉到这儿来，和这千千万万再一次获得解放的人们一起庆贺、一起欢跃、一起尽情地喊出心里的歌儿一般的声音……

他整整找了一个上午、心中怀着炽烈的渴望，不知穿过多少街道，走过多少地方，而白慧仿佛一只飞去的鸟儿，无影无踪。天地这么广阔，她究竟在哪里呀！当常鸣清醒地发现他寻找的目标是渺茫的时候，无望而颓丧的感觉便沉重地爬上心头，热烘烘的情绪冷却下来。他已经十分疲乏了。

这时他正停车在一个空地上。对面是东大河的大湾渡口，一个圆形的大钟远远地竖立在那里。他恍惚觉得这个不常来的偏远的地方在他的记忆中占什么特殊位置。跟着明白了——这正是白慧第一次约会他的地方。那一次他没来。但事后，每当他给失去的爱情折磨得痛苦不堪时，便独自一人跑到这儿来，沿着高高的堤坡走一走，排遣郁结心中的怅惘与苦楚。他的幸福好象从这儿断绝的，现在却又偶然地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呢？

他茫然地朝渡口走去，在大钟下放了车。一个人登上堤坡，心里痛悔地叫着：

“那一次，我本来可以挽救她的。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

宽坦的河湾就象一幅长长的画卷在他眼底展开了。远处迷蒙的景物，阳光下白得耀眼的大河，河面上飞翔的水鸟……忽然他的双眼睁得极大，仿佛发现他失落已久的极珍贵的东西那样，眼睫毛禁不住狂喜地震颤起来。他完全意外地看见在前边堤坡下退了潮的黄沙地上，站着一个姑娘。那正是白慧呀！

沙滩上印着一大片清晰的流连徘徊的足迹，白慧站在中间。离她几尺远的地方，大河的激流在翻滚喧腾。风正吹着她的头发、衣襟和裤脚。她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望；孤零零地，只有一条灰色的影子躺在她的足旁。常鸣觉得，她好象是被那几个魔鬼卷起一阵邪风抛到这荒凉的河滩上。魔鬼们是不会对她负责的，而我们的党却要对她负责。今天呀！党、祖国、民族已经从魔鬼的践踏下被挽救出来。它面前展现一片无限美好的锦绣前程，它大有希望，它已经在新的长征中迈起雄健的步伐了。而我们向前的每一步，都应当是充满崇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无论是对祖国、对党的事业，还是对每一个人……那就要张开温暖的怀抱，伸出有力的手，把白慧这样的青年人从那条走不通的、彷徨痛苦的歧路上拉回来。帮助她把过错化成教训，用以明辨、警戒、抵抗将来可能重来的邪恶；鼓舞她满怀信心地生活下去……就这样，常鸣踩着坚实的步子，一步步下了堤坡，朝白慧走去。

白慧扭头看见了常鸣！在沙滩上这对情人之间，时间好象只停留下片刻。忽然白慧转过身，她好象终于找到了出路。一条洒满了光、无限宽广的路。她摆脱开刚才的一切，带着一股热切的冲动，甩着两条胳膊，满脸流着热泪，朝常鸣跑来了，跑来了……

1978 . 7--8

于天津睦南道 77 号

